

中国天主教 的过去和现在

ZHONGGUO
TIANZHUYIAO
DE GUOQU
HE XIANZAI

顾裕禄 著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B022

74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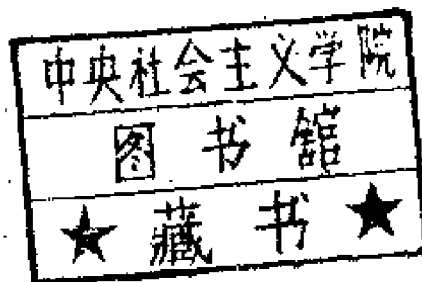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

DH82/04

顾裕禄 著



200131008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方小芬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

顾裕禄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诸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9,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

ISBN7-80515-326-4/B·17

定价 2.00元

是非善恶从头说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代序

罗竹凤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从原始的萨满教到世界三大宗教，几乎什么都有。汉民族人数最多，而信仰宗教的人却最少；在50多个少数民族中信仰宗教的几乎占多数，有的宗教甚至同民族密切揉合，渗入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成为民族凝聚、联系的纽带，例如伊斯兰教就具有这种特点。

比较完整的宗教形态，只有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所谓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从外国传来的。基督教又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也称耶稣教），多与西方殖民背景有关，因此很长时间被人们称为“洋教”，在信仰、教义、礼仪、生活方式等方面是同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格格不入的，因而相互矛盾和隔阂也特别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相当于临时宪法）里就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历次《宪法》也都沿习不变而且更加完备。由于中国不信教的人口占多数，更由于宗教处于唯物主义思潮的汪洋大海中，再加执行宗教政策屡有失误，主要是来自“左”的思想、路线的干扰，单从某些人的主观愿望出发，企图用行政手段促使宗教迅速消亡，这在广大人民特别是信教群众中往往造成不良影响，

以为宗教总是要被消灭的。其反拔作用必然产生一种受压抑的心理，有的甚至惶惶不可终日！几十年来的经验反复证明：这样作不仅是无效的，反而会刺激教徒的宗教感情，产生离心作用，变成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唯一正确的作法，只能是认真、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正当的宗教活动予以保护，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最大力量。对宗教信仰者，只能要求他们“爱国爱教”，在现世爱祖国，同时也爱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并使教会不断纯洁，不再受外国势力和野心分子所利用。

宗教徒能够“爱国爱教”，就证明宗教政策已经发挥了它的威力；反之，也说明工作不到家，应当认真反思。是真正的教徒，他必然爱教并受宗教信仰规范和宗教道德所制约；但作为宗教信徒，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又不能不履行全体人民的共同职责，这就是爱国守法。事实证明，爱国爱教是并不矛盾的，处理得好，可如鸟飞鱼游，悠然自得。如果硬要说只准爱教不准爱国，那是死胡同一条。除了自找烦恼之外，又有什么好处呢！

不信教的人在中国既然占多数，就有一个多了解点宗教的问题存在。如果毫无所知，信与不信者之间必然会产生隔膜；多了解一些，就会缩短差距，在共同的事业方面携手并进。你想知道宗教么？应当多涉猎有关书籍，获得一些初步知识。对于天主教来说，顾裕禄同志写的这本《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便可起这种“登堂入室”的作用。

中国天主教是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传入的，主要在明万历年间。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主权完整的独立国家，可以自由行使权力。常言说得好：“入国问俗，入乡问禁”，利玛窦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作到了3条（即所谓“利玛窦规矩”）：

1. 尊重中国固有的礼教，准许教徒祭祖拜孔；2. 结交上层儒士、官员，由上到下，争取打开局面；3. 以当时的先进科学成果为皇朝服务，如舆地、历法等等。这样做，果然取得了成效，使天主教在中国站住脚，并逐渐传播。

后来发生了所谓“礼仪之争”，以法国传教势力为首的传教士改弦更张，破坏了“利玛窦规矩”，强制中国教徒不能祭祖拜孔，并得到当时几个教皇的支持，最终发出了“禁约”，因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清康熙晚年和雍正朝即下令禁止外国传教士活动，并驱逐出境。在天主教看来，这是遭受了极大挫折，然而却正是“咎由自取”。

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门户，侵略所及，使中国受到的都是屈辱和压迫。清王朝在失败之后，同各帝国主义签订了许多投降卖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其中又多把“传教权”作为内容之一。从此以后，伴随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帝国主义势力日益扩展和渗透，而天主教也变成它们手中的侵略工具了。一直到解放前夕，天主教的教权完全为外国传教士所操纵，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处于无权状态，只好俯首贴耳地受他们摆布。如果有敢于谈论和参加反帝爱国的教徒，便要受到“绝罚”，而“绝罚”对于信徒来说，正如一个人被宣布死刑一样可怕！这大约可以说是中国天主教的第二阶段吧。至为平常的道理可以充分说明：国势凌弱，宗教也必然处于“附庸”状态，而不可能挺起胸脯来自立自主。难道这是中国天主教徒们和神职人员甘愿忍受的屈辱么？

1949年全国解放，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蒋家王朝彻底崩溃了，帝国主义也被陆续赶走了。但是天主教的反动势力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立即挑起了

不再供给辅仁大学任何经费的弊端，以为这样就可以迫使中国人民和天主教徒屈服。经过一场较量，我国政府收回了辅仁大学的教育权，归自己办理，并且由天主教知名学者陈垣担任校长。

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天主教爱国的教徒与梵蒂冈所控制的外国传教士经过无数次的较量，终于割断了与梵蒂冈的政治、经济的关系，并取得了自选自圣主教和办教的主权，而成为中国天主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

以上算是中国天主教的第三阶段。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和变化，决不是天主教徒们都能了解底细的，更不是—般人所知道的。顾裕禄同志的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大家看过以后，不禁会发出感叹：“原来如此！”

这是一本以史实为基础的通俗读物，从明清一直叙述到现在，主题极为明确：中国天主教究竟走过了一条什么曲折的道路，而解放之后“善”与“恶”的斗争又是多么错综复杂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虽然是一本通俗读物，却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比较严密的科学论证。它从实际出发，全面而又客观地叙述了历史的真相和演变，令人心悦诚服。

明末爱国科学家、最早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徐光启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不管对于天主教徒也好，宗教研究工作者也好，推而广之以至研究哲学、历史学的人们也好，如果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可以保证一定是“开卷有益”的。

前 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对宗教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也活跃起来了。从近几年见之于书刊的有些研究宗教问题的文章中，笔者感到有一个卓见颇值得重视，就是在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上，主张“从实际出发，联系中国的现状，研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宗教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是新课题，在以往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有从实际出发，对我国宗教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确切可靠的材料，在事实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才能取得较正确的认识。

笔者曾较多接触天主教实际。解放前，中国天主教的基本状况是：它完全受着外国势力的支配。解放后，天主教爱国人士和广大教徒开展爱国运动，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终于把外国势力支配的中国天主教改变成为我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中国天主教的这个巨大变化，是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50年代前期，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国情和我国宗教的历史、现状，制订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力支持并帮助天主教人士和广大教徒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调动了天主教界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不幸在十年动乱中，我国天主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也受到冲击，损失很大！最近

几年，党和政府拨乱反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天主教界团结努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一正义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天主教不是我国固有的宗教。它什么时候和怎么会传入我国的，又是怎么发展的？外国势力是怎样支配它的，中国教徒怎样处于无权和受压迫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反帝斗争中天主教徒的表现怎样？解放后爱国的天主教徒怎样取得了摆脱外国势力控制的胜利，又怎样独立自主自办着教会，以及当前他们又怎样在为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等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些问题，将使我们看到：中国天主教状况发生根本变化，是得来不易的；天主教徒能为祖国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也是值得庆幸的。我们应该用新眼光来看待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我国教徒以及他们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

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笔者不揣简陋，试写了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供诸同好。引玉之砖，尚祈赐教为感！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罗竹风、陈一鸣、阮仁泽、浦作、余青、傅克勇、王宏逵、张志群、肖志恬、刘建、龚方霖、瞿明明、袁蕴常同志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汤履道、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陆薇读、顾梅青，上海天主教神父范良佐、汤孝昌的关怀、鼓励和帮助。特别是罗竹风、陈一鸣两位老同志和王宏逵同志对二、三稿的修改给予宝贵的指导。在资料搜集方面，管理上海天主教图书室的顾依英修女给予不少方便。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目 录

前 言.....	1
一、天主教的传入.....	1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1) 景教不是天主教(2)	
元朝方济各会士来到中国(3) 明末罗明坚、利玛窦进入	
中国内地(4) 利玛窦留居北京(7) 徐光启信天主教的过程和	
特点(9) 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11)	
李之藻和杨廷筠信天主教的特点(12) 明末天主教徒的宗教	
信仰和宗教生活状况(14)	
二、发展的第一阶段.....	25
崇禎帝起用汤若望(26) 汤若望向宫廷传教(26) 南明传	
教士的小插曲(27) 顺治帝与汤若望(29) 汤若望案及其	
剖析(31) 各地传教士递送广州(32) 康熙恢复使用有专	
长的传教士(32) 康熙帝与南怀仁等(33) 中国主教罗文	
藻和中国神父吴渔山(35) 反对“利玛窦的规矩”的传教	
士(37) 教皇派使看来中国(39) 康熙对传教士政策的改	
变(40) 雍正下令禁止传习天主教(40) 处理外国教会、	
外国传教士和我国关系的历史经验(42) 雍乾嘉道四朝传	
教士和天主教徒状况(43)	
三、发展的第二阶段.....	51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上海(51) 传教士在《北京条约》	
中文约本中私加进“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53)	
孟托斑与北京南堂的重开(54) 教案的最根本起因(55)	

义和团运动后天主教的发展(57)	中国神父、修女及其传教方法(57)	教会学校中的传教活动(60)	天主教孤儿院、施诊所等和发展教徒的关系(61)	“打官司教”、“娘子教”和“传代教”(63)	
四、外国势力的控制					66
主教在教会中的地位(66)	外国人充当中国主教的历史(67)				
一百多个外国主教(69)	中国教徒处于无权和受压迫的地位(72)				
五、爱国思想和爱国表现					78
爱国思想较薄弱的原因(78)	传教士对教徒爱国活动的压制(79)				
英教之和马相伯(81)					
六、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天主教					88
天主教内出现严重反共现象的原因(88)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梵蒂冈的对华政策(89)				
梵蒋正式建交(90)	史贝尔曼插手支配中国天主教会(91)				
葛礼耕和华理柱(92)	于斌协助蒋介石打反人民内战(94)				
“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罪恶活动(96)	外逃和“撤退”(97)				
散布共产党“灭教”等谣言(99)					
七、解放初的基本状况和变化					106
解放初中国天主教内复杂状况举例(106)	政府对天主教工作的开展(114)				
反帝爱国运动的掀起(116)	黎培里等对教徒爱国运动的破坏(119)				
驱逐黎培里(120)	决定性的胜利(122)				
八、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建立					135
走爱新中国的道路(135)	倡议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37)				

周总理和天主教人士的第二次谈话(138) 皮漱石总主教的
鲜明爱国立场(139) 发起人会议(140) 毛主席说：“可以
团结起来了！”(141)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正式成立(141)

九、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145

对梵蒂冈历史真相的认识(145) 成都主教区实现自选主
教(147) 汉口武昌两主教区自选主教实现自圣(148) 痛斥
庇护十二1958年的反动“通谕”(151) 走在独立自主自办
教会的道路上(152)

十、深刻的教训…………… 156

十一、我国天主教界正沿着50年代开创的道路

继续前进…………… 162

党和政府对天主教工作的恢复(162) 跟上60年代新形势
(167)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教务委员会的成立(168) 反对
梵蒂冈对邓以明的非法任命(169) 开办神哲学院(171) 出
版经书和刊物(171) 习仲勋副委员长的讲话(172) 为两
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174)

结束语…………… 179

后 记…………… 185

一、天主教的传入

天主教在什么时候传入我国？是唐朝，元朝？还是明末？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认为须先弄清楚基督教（拉丁文Christianismus）和天主教（拉丁文Ecclesia catholica）的关系，弄清楚天主教和传入我国的基督教另外几个教派的区别。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天主教是基督教几个大教派中的一个教派。基督教是公元1世纪产生的脱胎于犹太教的一个宗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历史渊源关系，在经典方面有所因袭，如基督教的《圣经》中的《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然而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宗教。

基督教产生后曾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迫害。这状况至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开始发生根本变化。4世纪末，基督教已不但从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受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宗教变成了主要是统治者利用的宗教，而且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经过几个世纪特别是成为国教后的发展，基督教的分布范围已达欧洲西部、北非西部、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北非东部。欧洲西部和北非西部的教会，经典、教父著作、礼仪等，使用拉丁文；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和北非东部的教会则主要使用希腊文。罗马帝国设立东西两都和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酿成的东西教会的分化日益加深。1054年两教会正式分裂。分裂后，原西教会自称“公教”，

即天主教；东教会自称“正教”（拉丁文Orthodoxa），即东正教。

5世纪时基督教内出现了一个被自称“正统派”斥为“异端”并加以迫害的聂斯脱利派（拉丁文Nestorianism）。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又从天主教内产生丁与罗马教皇相抗衡的“抗罗宗”（英文Protestants），即“新教”。新教也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在外文中，基督教和基督教各个教派各有专名，但在我国，由于新教俗称耶稣教，又称基督教，基督教一词遂产生了两种涵义：一、指世界性公认的基督教各派总称，二、指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弄清楚在我国基督教一词有上述两种涵义是十分重要的，不然的话，就难说清楚它们各自的历史。

历史上基督教不止分成上述四个教派，还有别的教派，但传入我国的是这四个教派。四个教派中，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人们通常称之为基督教三大教派，聂斯脱利派则是一个较小的教派。这些教派在教义、教仪等方面有同有异，但在教会组织关系上都各自为政，门户之见很深，且又各以基督教正统自居。^①

景教不是天主教

上述基督教四个教派中最早传入我国的是聂斯脱利派，即我国历史上所称的“景教”。1625年（明天启五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②本世纪初又从敦煌石室中发现景教中文经手抄本，证实景教在唐贞观年间由叙利亚人阿罗本等传入我国。后因武宗下诏灭佛，“祆教景教遂亦联带波及”^③，传入我国的基督教这一派一时在中原灭迹。

天主教内曾有人把景教说成就是天主教，从而把天主教传入我国的历史追溯到唐朝，^④这是张冠李戴。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天主教是基督教的又一个教派，景教不是天主教。

元朝方济各会士来到中国

天主教内有一种称作“修会”的组织，参加者是天主教徒中矢志守贞的男女出家人。最初的“隐修院修会”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隐修院内。13世纪产生的“托钵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则到外面活动，有的会士并出外传教。

元朝方济各会士来到中国。因此，说天主教在元朝传入，亦无不可，但必须指出，元朝在汉人中没有天主教徒。

13世纪上半叶蒙古西侵所到之地，如中亚多聂斯脱利派教徒，俄罗斯、东欧有基督教各教派的教徒。他们中有些人被虏或随使节来到了当时蒙古的都城和林。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作使者到和林，企图向大可汗贵由传布天主教，徒劳而返。贵由在给柏朗嘉宾带回的复教皇书中说：“尔来书云：朕宜领洗信从基督。朕可告尔，朕不知为何而应领洗。”^①柏朗嘉宾以后来到和林企图传布天主教的使者，也同样失望西归。

元朝建立后，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奉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于1294年来到北京。从他1305年写给欧洲同会修士的第一信中可以看到：他初到北京时，聂斯脱利派教徒在皇帝前说他是“奸细”、“巫人”、“骗子”，“如此诽谤五年之久”，最后由于聂斯脱利派教徒中有人“忏悔”，皇帝才知道他“清白无罪”，是受“诬陷”，于是将诬陷者“逐放”。之后，他在北京“建一教堂”。在1306年的第二信中，孟德高维诺说，1305年他在大汗宫门前“又建一新教堂”，“可容二百人”，两教堂“均在城内”，他“每星期轮流至一教堂主持祭奠”。^②孟德高维诺发展的教徒中有汪古部（在今河套五原县包头镇诸地）高唐王阔里吉思，原是

聂斯脱利派教徒，改信天主教后“率大部分臣民皈依天主教”^⑦，但他去世后，这些人又成为聂斯脱利派教徒。除此以外，孟德高维诺在第一信中说：“据估计，在此经我施洗者约六千人”，在第二信中说：“自我来契丹国鞑靼地，^⑧已为数于人施洗”，^⑨两个数字不完全一致。可见关于孟德高维诺发展教徒的确切数字，当难认定。

1307年，教皇格来孟五世任命孟德高维诺为北京总主教，并派方济各会的七个主教来中国。这七个主教中只有三人到达北京。他们给孟德高维诺行了“祝圣”礼。这三个主教后来都相继到了泉州，并都在那里去世。孟德高维诺于1328年卒于北京。

在我国历史书上，聂斯脱利派也好，天主教也好，元时都被称为“也里可温”。据我国史学家陈垣考证，当时“也里可温皆色目人”，“现尚未发现”汉人“为也里可温者”，^⑩就是说，元朝在汉人中既无聂斯脱利派教徒，也无天主教徒。

元亡，也里可温绝迹于汉人地区。

明末罗明坚、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

明末传教士来到中国，和元朝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代背景是不同的。15~16世纪，传教士到海外，是奉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派遣。葡、西是欧洲第一批殖民主义国家，又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天主教会势力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向海外开拓有着双重推动力：既是进行殖民扩张，又是为发展西方天主教会势力。它们派遣传教士，也是为了达到这双重目的。因此，不管传教士的主观动机怎样，客观上都有着这个背景。

1510年葡萄牙占领果阿后，企图在东亚追求政治、经济利

益的胃口越来越大。它以果阿为根据地，略取马六甲，并继续东向。与此同时，它伙同教会派遣传教士到印度。当时西方天主教会内派遣传教士最得力的是耶稣会。耶稣会是1534年由西班牙军人出身的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创立的一个新修会，其目的是企图在宗教改革运动后重振天主教势力。1541年，罗马教皇保禄三世和依纳爵·罗耀拉应葡王若望三世的请求，派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到东亚传教。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首批会士之一。他从里斯本乘葡船到印度，后又到日本。1552年来中国。他到了上川岛，无法进入广州，不久病死在这个小岛上。

葡萄牙占领澳门后，从里斯本启程的耶稣会士中有的也到那里，并建立了住院。来到澳门的耶稣会士分三种：第一种，留在澳门；第二种，准备去日本；第三种，准备进入中国内地。

澳门是一个很小的半岛，它有一条狭窄的土腰和陆地相联。澳门葡商获得在限期内进入广州贸易的机会后，中国南大门实际上已有所开放。1578年，耶稣会“印度和日本教务巡回使”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i）去日本时，在澳门耶稣会住院差不多住了一年。他研究中国的情况，研究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新方法，最后作出了准备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要“中国化”，要“学习中国语言文字”^⑧的决定。有的教会史书把这个新决定称为“范礼安计划”^⑨。为实施这个计划，他写信给果阿的耶稣会印度省省会长，请他派一个能胜任这一使命的耶稣会士到澳门，后者选中了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1579年7月，罗抵达澳门。

罗是意大利人。到了澳门后，他向已去了日本的范礼安函请“派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做他的同伴”。^⑩范礼安同意

了，从日本写信给耶稣会印度省省会长，命利玛窦前往澳门。利接到命令，中止了最后一年的神学学习，^⑭于1582年4月26日从果阿乘船启程，8月7日到了澳门。到澳门后，他“埋头书案，一心学习中文”^⑮。

罗明坚遵照范礼安的指示，比利玛窦早学中文二年。有的教会史书说他在二年内“已经学会一万二千个中国字”^⑯。这可能有点夸张，但可以看出他已学会不少。从1581年起，他利用每年春秋两季葡商至广州城下贸易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到广州。当地官员“因为见到一个外国人洞悉本国的语言文字，一举一动，都很文雅，很有礼貌，对罗司铎^⑰破格相待，别人在谒见时，全是俯伏跪拜，却允许他在谒见时，能够站立”^⑱。通过多次到广州，罗明坚认识了一些地方官员，为他进入内地创造了条件。1582年12月，他携带了当时中国还没有的时钟等物品，到肇庆拜见总督陈瑞，被安排住在天宁寺。住在天宁寺时，他探询到了想得到“一间小屋”，先要“换上中国衣服，变成中国皇帝的子民”，于是一面上书陈瑞，表明自己愿意“改著僧众服装”，一面秃头，剃须，披上袈裟，“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式样”。^⑲几个月后，由于陈瑞去职，罗明坚回到了澳门。陈瑞去职后，继任者是郭应聘。他得知罗明坚“有种种奇物珍品可为献礼”^⑳，遣人请罗明坚到肇庆。这第二次到肇庆，罗明坚就带了利玛窦同来，来时两人都穿了僧服。1583年9月10日，他们到了肇庆，以“仰慕中国政治昌明”为辞^㉑，求得肇庆知府的允准，在肇庆居住，造了一所取名“仙花寺”的有上下二层的住院。为造这住院，罗明坚曾回澳门向葡商筹款。葡商资助，是他们经济来源之一，另一来源是葡王的资助。

利玛窦留居北京

1588年，罗明坚奉范礼安之命，去欧洲请求教皇遣使来中国。回欧后，他到了罗马。那时，教皇西斯笃五世刚去世。这个教皇去世后，^①继承教皇像走马灯：乌尔班七世在位仅17天，格列高利十四世在位10个月，英诺森九世在位2个月。罗明坚看到请教皇遣使来中国的事无望，未再来中国。

罗明坚返欧后，肇庆“仙花寺”才完全由利玛窦主持。1589年，新总督刘节斋决定买下“仙花寺”，并同意利玛窦的请求，让他去了韶州。在那里，利玛窦造了一所住院，这所住院是平房。

1594年，范礼安派郭居静(Lazaro Cattaneo)^②到韶州，做利玛窦的助手。次年，利玛窦留下郭居静，自己离开韶州北上。在离开韶州时，他为迎合儒士的心理，脱去僧服，改穿儒服。后来，利玛窦又在南昌、南京建立了住院。随着这些住院的建立，又有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③、苏如望(Joao Soeiro)^④、罗如望(Joao de Rocha)^⑤、庞迪我(Didago de Pantoja)^⑥等进入中国内地。

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后，用馈赠三棱镜^⑦、日晷仪和传入世界地图^⑧、数学等欧洲科学文化知识的方法，取得一些儒士和地方官员的好感和帮助，先后建立了韶州、南昌、南京住院。但他知道，在中国，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批准，他们这些已进入内地的传教士，是立足不稳的。因此，他一直寻找着上北京“进贡”的机会，希望通过“进贡”求得皇帝允许他们留居中国。按照正常程序，进贡要通过礼部，这对利玛窦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不通过礼部，就只有走太监的门路，通过太监把贡品送到皇帝手里。1598年，他和郭居

静第一次到北京，由于没有走通太监的门路，“进贡”的计划失败了。1600年，他由庞迪我作伴再次到北京，走通了太监的门路，贡品送进了内廷。从史学家罗光（台湾天主教内的总主教、辅仁大学校长），主要根据利玛窦意大利文原著材料撰写的《利玛窦传》中，可以看到万历帝对贡品中的两座大小时钟和西琴十分喜爱。“两架自鸣钟最使皇上惬意，钟针随滴答之声移动，准时当当报鸣，神宗皇帝喜为天下奇物。”^②“万历帝因见西洋人贡献的西琴，愿听西乐。四个乐使便来向利玛窦请教。利神父自己不习弹琴，但是他曾叫庞迪我从郭居静学琴。郭神父擅长弦奏，庞神父因此学会了调弹弦琴。乐使来学乐，利玛窦便派庞迪我和乐使同赴宫中。”^③利玛窦“所贡的西洋珍奇物品，得到皇帝的欣赏耽玩，因此得以在京师安身”^④。

时人王应麟撰利玛窦碑文，称利玛窦“进贡”后，万历帝“召见便殿”。但利玛窦自述，“他不召见神父们，而是代之以派了他的两个最好的画师去画两个神父详尽的等身像，然后把画像拿给他看。中国人并不擅长画肖像，但这次他们画得相当好。皇帝一看到这些画像就说道：‘嗨！嗨！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撒拉逊人。’”“随侍在皇帝身边的太监告诉他，他们不是撒拉逊人，因为他们吃猪肉。”^⑤我国有些史书上称万历帝曾召见利玛窦是以讹传讹。高龙鏊《江南传教史》说得对，利玛窦“从未得到皇帝的召见”。利玛窦虽然没有面见万历帝，但在万历帝的默许下能留居北京，这无论对他来中国后的社会地位来说，对他在中国传教的条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他留居北京之前，信天主教的人很少，^⑥1596年他进入内地13年之后，不过“100多个”^⑦，特别是在职的官员和有影响的儒士中还没有一人信天主教。他留居北京后，教徒人数就增加较快，“1603年，差不多有500个；1605年，有1000多；1608

年，有2000多。”^⑧官员和儒士中也开始有了天主教徒。

徐光启信天主教的过程和特点

明末官员和儒士中第一个信天主教的，是上海人徐光启。徐是科学家。对他信天主教，可能有人感到奇怪。其实，科学家中有宗教信仰者，是常见现象。同是科学家，但在哲学思想上，以至在社会观点方面，却未必相同。时至今日，西人信教的科学家还不少。徐光启信天主教，是不奇怪的。不但不奇怪，而且笔者认为他信天主教有着如下独特的原因：

徐光启生于晚明之世，是个有抱负的人。他从事科学研究，关心国家命运，看到国家存在着危机，立志为强国富民做一番事业。他不是保守的，是求进取的。但是明朝的闭关政策，使徐光启这样的有志之士能从哪里去找除儒家思想之外可学习、可吸收的新东西呢？

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用的方法是传入欧洲一些科学文化知识。他来到中国后，徐光启还不知道有其人。后来他看到赵可怀、吴中明翻刻的《山海舆地全图》，知道了把这欧洲世界地图传入我国的是利玛窦，开始产生了对利玛窦的仰慕之心。1600年春，他在南京与利玛窦相晤。经过一席谈话后，他认为利玛窦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⑨。

徐光启和利玛窦初次会晤之前，于1595年途经韶州时见过郭居静。1603年，他回上海路过南京时，用八天时间研究了利玛窦写的结合某些儒家思想、否定别的宗教的天主教教义书——《天学实义》^⑩，向罗如望请求领受洗礼^⑪。罗如望同意了，给他付了洗。徐领受洗礼时，取“圣名”保禄^⑫，故天主教内常称他为“徐保禄”。

从徐光启写的《跋二十五言》，特别是他上奏万历帝的

《辨学疏稿》看，他是从有益于“忠孝”、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为善去恶”的一般伦理道德意义上理解天主教的。他认为天主教教义“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②。他又认为天主教“一切戒训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而古来帝王圣贤的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佛教则“其言似是而非”，因此他的结论是：天主教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③当然，徐光启对天主教的这些理解是不全面的，但其原因主要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徐光启信教时所看到的天主教是利玛窦等几个传教士和《天学实义》等天主教书本。他并不了解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天主教会和欧洲殖民势力侵占的各殖民地的许多实际状况。他对中世纪的天主教史也几无所知。他只是从利玛窦等几个传教士的讲述中求得对天主教的认识，他的认识不可能不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盲目性。例如：他认为“彼西洋邻近三十余国”；因为奉行天主教，“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封疆无守，邦君无姓，通国无欺谎之人，终古无淫盗之俗，路不拾遗，夜不闭关，至于悖逆叛乱，非独无其事，无其人，亦并其语言文字而无之，其久安长治如此”^④。显然这是他出于对传教士的轻信，把欧洲中世纪各天主教国家简直看成了理想世界。指出徐光启对天主教认识的片面性和所以产生这片面性的原因，是必要的。但话必须说回来，徐光启信天主教是出于他主观上认为天主教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信天主教是选择了一种在他看来可以“补儒易佛”的新东西，而不是逃避现实，趋向消极。这是徐光启信天主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徐光启信天主教的另一个原因，是利玛窦对儒家思想的适

应和调和。原来利玛窦进入内地后，继续刻苦学习中文，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了较深的研究，同时继续研究中国的风俗人情。通过这些研究，他感觉到要在中国传布天主教，对佛教思想可以碰得，对中国文化，对儒家思想则万万碰不得。利玛窦估计到这一点，是他比后于他14年来到中国的、曾一度持相反意见的龙华民高明之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利玛窦知道尊重中国文化，知道如果他要儒士背弃儒家思想而信天主教，不要说不可能有那个儒士会相信，他自己也难在中国立足。他僧服穿了12年之后，终于脱去僧服，改穿儒服，变“西僧”为“西儒”，无非是为了取得儒士的好感。正因为如此，他在《天学实义》中，把天主教信仰的至高神——天主，独创地解释成就是儒家经典中的“上帝”。他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⑩徐光启改信天主教后对中国文化的感情一如既往。利玛窦把天主解释成就是儒家经典中的“上帝”，这对徐光启信天主教就不发生困难，而且具有民族色彩。

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徐光启一面向传教士学习教义，同时又向他们学习欧洲科学文化知识。1604年他考中进士做了京官后，向利玛窦学习并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在明末那时候，一个不懂外文的中国人，要翻译外国的数学著作，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利玛窦来中国时，带着他在罗马学院（即今罗马额我略大学）读书时老师克拉维乌斯（Clavius，我国有的著作中称“丁氏”、“丁先生”）的欧几里得讲义。他曾向愿意向他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讲解欧几里得。他们中有的学懂，有的学不懂。徐光启向利玛窦学习时，年已45岁。他是

学懂的一个，并不怕困难，决心翻译此书。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生动地叙述了他们两人合作翻译的过程。开始利玛窦向徐光启“述此书之精，且陈翻译之难及向来中辍状”。徐光启回答说：“吾先正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今此一家已失传，为其学者皆暗中摸索耳。既遇此书，又遇子不骄不吝，欲相指授，岂可畏劳玩日，当吾世而失之。呜呼，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正是徐光启的这一决心深深感动了利玛窦。他写道：“先生勤，余不敢承以怠。”^⑧于是两人一个口传，一个笔受，“反复撮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稿”^⑨。1607年春，《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⑩阮元《畴人传》中说：“明代算学陵替，习之者鲜。”反映在历法上，大统历屡发生错误。在这情况下，《几何原本》的引进，对当时已落后于欧洲的我国数学起了推进作用，这功绩是徐光启的，但和利玛窦也是分不开的。

徐光启和利玛窦经常相聚一堂的日子不长。就在两人合译成《几何原本》的这一年，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他扶柩南归，回上海守制。三年后重返北京时，利玛窦已病逝。此后，徐光启继续向其他传教士学习欧洲科学知识，如向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⑪学习水法，向汤若望(Adam Schall)^⑫等学习欧洲历法，同时向他们继续学习教义。他对天主教信仰进一步加深，终其生是一个笃信的教徒。

李之藻和杨廷筠信天主教的特点

徐光启信教，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布关系很大。他之外，和天主教的传布也十分有关的信教官员，是李之藻和杨廷筠。这两人信天主教又有不同于徐光启的特点。

利玛窦留居北京十年。这十年间，京官中和利玛窦交往最密切的是李之藻。他甘当利玛窦的学生，学习欧洲数学、天文知识。他翻译《同文算指》、《圜容较义》、《浑盖通宪》、《乾坤体义》等，还刻版《坤輿万国全图》。李之藻和利玛窦的友谊是相当深的，但一直未信天主教。利玛窦是1610年5月去世的。在利去世前不久，李之藻忽患重病，并已立了遗书。这时，利玛窦“力劝其立志奉教于生死之际”^⑧。李听劝，从利玛窦手中受了洗礼，取“圣名”良。在重病中信教，是李之藻信天主教的特点。从他后来写的《读景教碑书后》^⑨一文中“我辈不出户庭，坐闻正真学脉，得了生死大事，不可谓全无福缘者”这句话看，天主教的“常生”，即人死后将来会“复活”这一信条对他的影响似乎特别深，这可能和他重病中信教有关。

杨廷筠原好佛，是明末有影响的佛教徒中弃佛而信天主教的第一人。他也是在北京认识利玛窦的，曾向利学习几何，但没有学懂。他也听过利玛窦的宣教，当时未信。1611年，李之藻信教才一年，丁父忧，告归。他请了郭居静、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⑩到杭州家里，为其父举行天主教追悼仪式。杨廷筠也是杭州人，和李是好友，这时闲居在家。他到李之藻家吊唁，见到了郭居静和金尼阁，于是请两客人到自己家里。一个佛教徒请神父到家，表明杨廷筠心已倾向天主教。他从郭、金学习教义，并请求领受洗礼。但他是有所侧室的，天主教主张一夫一妻，不准纳妾。因此，对杨廷筠来说，要领洗入教，不但须弃佛，还须弃妾。在他未弃妾之前，郭、金不答应给他付洗。一定要弃妾，然后才能领洗入教，这是杨廷筠没有想到的。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之藻。丁志麟《杨淇园超性事迹》记述在这一事上杨、李二友的一问一答，可使人们看到杨

廷筠信天主教的特点。杨对李说：“泰西先生乃奇甚。仆以御史而事先生，夫岂不可，而独不能容吾一妾耶？若僧家者流，必不若是。”李回答说：“于此知泰西先生，匪非僧徒比也。”李还率直地向杨指出纳妾是违反天主教戒规的，劝他放弃带妾入教的侈想，说：“君知过而不改，从之何益乎！”杨听了李的劝导，“屏妾异处，躬行教规”。郭居静和金尼阁于是同意杨的请求，并由郭居静给他付了洗，取“圣名”弥额尔。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是进士，用现在的话来说，三人都是有学衔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接受天主教信仰，不同于文化水平较低或缺乏文化的人。他们经过对天主教教义教规的一定研究而信教，表明在他们看来天主教有可信之处。唯其如此，他们信教以后，把传教士引进家乡，劝化自己的亲友和乡人信教，在家乡建立教堂^④。上海、杭州的天主教就是这样肇始的。他们还参与了天主教宗教书籍的译著工作，^⑤等等，起了传布天主教的作用。因此，教会史书上把他们称做中国天主教的“三柱石”。

天主教，作为一种宗教思想意识，和中国传统思想有很大差异。徐光启等接受天主教信仰，是利玛窦传教方法的成功。这传教方法，概括地说：一是随风随俗，使中国天主教适应中国的国情；二是从上层打开缺口；三是学术传教，介绍欧洲科学文化知识。故我国历史学家一般都称天主教是利玛窦传入的。

明末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状况

天主教的主要经典是《圣经》^⑥。四世纪以前，《圣经》有“各种不同的版本”^⑦，以后天主教长期使用的《圣经》，是译自希腊文的“通俗本”（拉丁文：Vulgata）。元朝天主教一

度传入中国时，孟德高维诺在他写给欧洲的信中说，他“用蒙古语译成新经全部及圣咏^④”，但“译本之遗稿，已无从查考”。^⑤明末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从罗明坚、利玛窦起，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有的能用中文写书，^⑥但他们没有把《圣经》译成中文。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译的《圣经直解》含有《圣经》部分内容。^⑦徐光启等知识分子教徒向传教士学习欧洲科学文化知识，但未曾向他们学习外语，因此，这些知识分子都未曾自己直接研究《圣经》，他们对《圣经》部分内容的了解，是通过外国传教士作中介。

天主教最基本的教义是4世纪形成的信条，即：“天主三位一体”，“第一位父”，“第二位子”，“第三位圣神”；“父化成天地”；“子降生成人”（即“生于童贞女玛利亚的耶稣”），“受难”，“被钉死于十字架”，“复活”，“升天”；“末日审判”；“相通功”；“罪之赦”、“常生”等。这些信条，明末天主教徒已全盘接受。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讲述的个别知识分子受洗礼的仪式看，新教徒在受洗礼时要诵读一篇预先写好的皈依声明。如早于徐光启认识利玛窦而迟于徐光启受洗礼的瞿太素，1605年3月16日在南京耶稣会住院的教堂内受洗礼时，朗诵了他写好的皈依声明。声明中有这段话：“至于有关天主教各端信道，虽然我不能明白其伟大崇高的奥义，但其所告诫的，我全心全意谦卑地服从，我伏求天主圣神光照我，启迪我，使我领会其真谛”，就是他全信天主教信条的表示。^⑧

天主教信条是教义的核心，但不是全部教义。从明末中国教徒写的一些宗教著作看，他们在天主教知识方面的造诣已相当深。如杨廷筠《代疑篇》中已涉及到有关弥撒等的教义。

天主教的十诫，在罗明坚著的刻于1584年的天主教第一部

中文教义书——《天主圣教实录》中是：一、“要诚心恭敬天主，不可祭拜别等神像”；二、“毋呼天主名而发虚誓”；三、“当守瞻礼之日”；四、“当爱亲敬长”；五、“毋乱法杀人”；六、“毋行邪淫等事”；七、“毋偷盗诸情”；八、“毋诽谤是非”；九、“毋恋慕他人妻子”；十、“毋冒贪非义财物”。^⑤其中第六诫包含不准纳妾。因此，有妾的人要信天主教，必须弃妾。明末天主教徒，为守十诫，无妾者不纳妾，有妾者与妾分居，这在一定意义上倡导了一夫一妻的良好风气。

明末教徒的宗教生活，是过“瞻礼”^⑥，望“弥撒”^⑦，办“神工”^⑧，领“圣体”^⑨，病危教徒领“终傅”^⑩，按天主教仪式进行丧葬^⑪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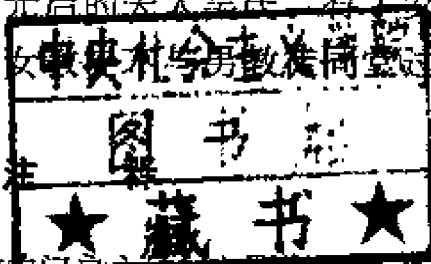
天主教的“弥撒”一般是在教堂内举行的。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初来时，在他们的住所内布置一“小堂”。在没有住所的地方，他们住在教徒家里。有的教徒在自己家里也布置一“小堂”。有了教堂，神父可以做“弥撒”，教徒可以望“弥撒”。神父每天做“弥撒”，教徒不一定每天望“弥撒”。从现在可以找到的一些文字材料看，明末教徒在“主日”（即星期天）和“大瞻礼日”望“弥撒”。当时教徒望“弥撒”，“跪拜终事，寂不闻声”^⑫。

基督教各教派对圣经中记载的耶稣的生母玛利亚的看法不同，如新教看得较平淡，天主教、东正教则非常看重，称之为“天主之母”、“圣母”等；敬拜的仪式也十分突出。利玛窦等初到肇庆时，在住院的“小堂”内挂的就是“圣母抱小耶稣像”。以后利玛窦在北京成立了“圣母会”。中国天主教徒敬重“圣母”，从天主教一传入就开始了。

还有，基督教各教派中，有的敬礼“圣像”，有的反对敬礼“圣像”。天主教是敬礼“圣像”的一个教派。“圣像”主

要放在教堂中，也放在教徒家中。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可以看出，明末最早的新教徒已在家中放“圣像”。

中国封建社会中，男女之间的界限是很严的。因此，明末有个女子入教和入教后如何过宗教生活的问题。最初的情况是：利玛窦等传教士发展了个别男教徒后，再通过男教徒发展女教徒。一般是丈夫信教后劝妻子或母亲等信教。中国第一个有影响的女教徒，就是徐光启的夫人吴氏。有了女教徒，然后由女教徒发展新女教徒。女教徒过宗教生活。



①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的分立之先，主要表现在过去近千年和近400年的互相排斥。如天主教称东正教为“裂教”，称新教为“拆教”等等。本世纪上半叶，新教中有人提倡基督教“合一”。天主教鼓吹“合一”，始于60年代初教皇若望二十三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公会议”。这一会议举行期间，成立了天主教进行“合一”活动的工作机构，邀请东正教等派“观察员”参加。1964年1月，教皇保禄六世去耶路撒冷与东正教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德纳高拉斯相会，次年12月7日，两方宣布废除1054年分裂时互相施加的“绝罚”。近几年来，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和新教教会人士也颇多接触。如1983年12月11日，他对罗马一个路德教会进行访问，参加路德教堂的“礼拜”，路德是新教创始人，1521年被教皇“绝罚”。现在海外有些天主教书报杂志上对东正教，新教的称呼已改口，如称东正教为“分袂的弟兄”，称新教为“离家的弟兄”。

②景教碑出土时间，说者不一，也有说天启三年，或天启三年至五年。

③冯承钧《景教碑考》第70页。

④1644年（明崇祯17年）杭州天主堂梓邛耶稣会传教士阳玛诺著的《唐景教碑颂正途》一书。书中说：“据碑考年，当时圣教在唐，约二百载。”天主教自称“圣教”。“圣教在唐，约二百载”，就是说天主

教在唐朝已传入中国。1885年《益闻录》446号刊载的《读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书后》一文的作者说：“予读碑颂之文，非天主教莫属”，也还是把景教说成就是天主教。1905年北京救世堂印行的樊国梁《燕京开教略》甚至说景教碑是“罗马圣而公会之传教士所立”。这些把景教说成就是天主教的错误说法，曾在天主教内长期流传，直到本世纪90年代，有的天主教知识分子还喜欢自称“景教后学”。

⑤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30页。

樊国梁《燕京开教略》此句是：“大教皇劝吾蒙古君民信从天主，领洗入教，朕不知蒙古君民何故宜出此。”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是：“再尔劝我蒙古君民进教领洗，朕不知何故宜出此，甚无谓也。”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中则是：“尔之来书，谓朕及臣民须受~~改教~~，朕可简略告尔，朕实不解，为何必须如此也。”

⑥【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95~208页。

⑦同上。

⑧同上。

⑨《陈垣学术论文集》第87页。

⑩高龙髯《江南传教史》(Augustinus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石印本，第1册卷1第21~22页。

⑪嘉禄·圣福亚《利玛窦神父的一生》(Charles Saint-Foi; Vie du R. P. Ricci)第52页。

⑫克鲁宁著，思果译：《西泰子来华记》第24页。

⑬耶稣会神父都经过四年学习神学的阶段，利玛窦，意大利人，生于1562年10月6日，1571年8月15日入耶稣会，1572年起，他在耶稣会开办的罗马学院读哲学和神学。1577年他还在读神学时，因耶稣会印度省需要增加传教士，奉耶稣会总会长派遣，前往印度。他先到里斯本，学习一年，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等一行向葡王塞巴斯第盎“辞行”，

葡王“命传谕,这班传教士的供应,着由内库支給”(裴化行著,王昌社译:《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1册第31~32页)。3月29日,他们从里斯本乘“圣类思号”船出发,9月1日到果阿。他先在果阿教希腊文,后又至柯钦教书。成为神父后,回果阿读第四年,即最后一年的神学。

⑭罗光《利玛窦传》第38页。

⑮裴化行著:《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189页。

⑯神父(拉丁文Pater),中国天主教内又称司铎,耶稣会士大部分是神父,小部分是修士,罗明坚是耶稣会神父。

⑰裴化行著:《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189页。

⑱同上书,第208~211页。

⑲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172页。

⑳据利玛窦自述,1583年9月10日,他随罗明坚到了肇庆后,立刻被带到知府官署谒见知府。他们跪在知府前,知府问他们是谁?从什么地方而来?他们通过自己的译员回答说:他们是钦崇一天主的宗教人士,仰慕中国政治昌明,由极远地方航海而来,途中共历三、四年之久。他们来到中国,只望能得到一块远离市廛及俗务的地方,建一陋寓和一朝拜天主的小教堂,以终其生(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记》,1978年法文新版,第219页)。对利玛窦所说的“仰慕中国政治昌明”,裴化行在《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中解释说:“这一句话,除去明瞭‘明代’情形的,一定要感到惊异:因为按当时的规律,只有三种人,能进入中国内地:第一,在职的公使;第二,伴随公使而来的商人;第三,仰慕中国的文化政治而来的外人,并可得到居留权。司铎们所引用的就是这第三种名称,因为除此以外,无法令他们得到内地的居留权,他们又小心不令他们的朋友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是有传教的心意。”(该书第242页)

㉑郭居静,意大利人,生于1580年。1588年由里斯本乘葡船东来,次年抵果阿。1594年到澳门,学习中文。进入内地后,传教于韶州、南京、上海、杭州等地。1640年1月19日去世。葬于大方井墓地。

⑳龙华民，意大利人，生于1559年。1597年从澳门来到韶州。他的传教方法与利玛窦不同。天主教传入后关于“天”、“上帝”和“天主”名字问题的争论，是他第一个挑起的。1654年卒于北京。

㉑苏如望，葡萄牙人，生于1566年。18岁入耶稣会。初学毕，至果阿读神哲学。1595年经澳门至南昌。1607年卒于南昌。

㉒罗如望，葡萄牙人，生于1568年。1598年从澳门到韶州，后至南昌。利玛窦去北京时，至南京。1623年歿于杭州，葬于大方井。

㉓庞迪我，西班牙人，生于1571年。1599年来华。1600年，随利玛窦到北京。1611年和另一耶稣会传教士熊三拔奉命修正历法。1616年沈澹上《参远夷疏》后，于次年被遣回澳门。1618年卒于澳门。著有《七克》等。

㉔一种能分散光的玻璃制品。由于当时我国对光的物理知识很有限，那些看到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的人，误把这一威尼斯制造的玻璃品视为“无价的宝石”。

㉕历史上我国学术界所称的“利玛窦世界地图”，不是利玛窦自己的创作，而是他“从欧洲人的地图上抄下来，再照中国人的嗜好加以修改过的”（裴化行《利玛窦和中国的科学》，《新北辰》1935年第10期），当时的名称叫做《山海輿地全图》。1584年由肇庆知府王潘第一次刻印。此后二十年中，吴中明、冯应京、李之藻、李应试等翻刻的，都以王潘原刻为蓝本。现梵蒂冈等处保存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是李之藻刻本。利玛窦进贡的《万国图》，是西班牙王腓力二世的宫廷地理学家奥尔旦利乌斯的《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 di Abramo Orterio）。明末我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所知不多，还不知道五大洲等等。利玛窦传入欧洲新的地理知识，大大打开了当时中国人的地理眼界。

⑳罗光《利玛窦传》第119页。

㉑同上书，第120页。

㉒高龙磐《江南传教史》第1册卷4，第451页。

㉓《利玛窦中国札记》下册，第406页。

⑳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60页。

㉑同上。

㉒徐光启《跋二十五言》，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第86页。

㉓《天学实义》经澳门耶稣会批准后，1603年于北京正式梓行。当时天主教称“天学”、“西学”、“道学”等。“天主”这个称谓，经教会正式定名后，《天学实义》被改为《天主实义》。

㉔天主教称“洗礼”为“七圣事”之一，即“圣洗圣事”。领受了“圣洗圣事”即成为天主教徒。“洗礼”有一定的仪式，主要由神父注水于受洗者的额上，同时口诵“洗礼”经文。

㉕天主教规定，受洗者在受洗时须取一“圣人”的名字，作为“洗名”，又称“圣名”。天主教内被列为“圣人”者很多，保禄即其中之一。据《圣经》记载，保禄于“耶稣复活”后成为“耶稣的弟子”，天主教内称“宗徒”。保禄，拉丁文作Paulus，基督教新教内称“保罗”。

㉖徐光启《跋二十五言》，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第86页。

㉗徐光启《辨学疏稿》（梵蒂冈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件），《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一）》第23～25页。

㉘同上书，第25～26页。

此段文字，自1898年上海慈母堂印行李林编《徐文定公集》后，几种徐的文集“不仅未作详校，且均有删改”（方豪语）。如王重民辑校的《徐光启集》作：“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久安长治如此”，少了50多字。

㉙利玛窦《天主实义》，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1935年第6版，第25页。

㉚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徐光启著译集》五。

㉛同上。

㉜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凡十三卷，前六卷讲平面几何，后七卷讲数论、立体几何等。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于此书，覃精已久，既

为之集解，又复推求续补凡二卷，与元书都为十五卷”（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徐光启译前六卷毕，很想继续译下去，但可能由于译以后各卷的难度较大，利玛窦未同意，因而终止了。1652年，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与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约续徐、利二公未完之业”（李善兰《续译〈几何原本〉原序》），续译完《几何原本》后九卷。

④熊三拔，意大利人，生于1575年，1606年来华，径赴北京，从利玛窦学习中文。1611年曾参加修历，但为时不长。1617年，万历帝采纳沈淮等驱逐传教士的建议，被押解出境。1620年卒于澳门。著有《泰西水法》、《简平仪说》、《表度说》。

⑤汤若望，德国人。魏特《汤若望传》称他生于1602年6月1日。1618年随同金尼阁自欧来华。1620年7月22日抵澳门。1622年从澳门进入内地。曾在陕西西安传教。1630年奉召至北京，入徐光启主持的为用西法改进中国历法而开设的历局。1666年8月15日卒于北京。

⑥三德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向达校本）第19页。

⑦李之藻受耶稣会传教士阳玛诺等的影响，误把景教看作是天主教。

⑧金尼阁，法国人，生于1577年3月3日。1610年秋抵澳门，翌年春至南京，从王丰肃、郭居静等学习中文。1612年，龙华民派他回欧向罗马教皇“面呈教务，兼上各项请求”。1614年冬，金返抵罗马，完成了龙交给他的任务后，遍历意、法、德、比等国。1618年4月，第二次离欧来华。同来的有邓玉函、罗雅各、汤若望等。金返欧时曾将利玛窦所撰意大利文《中国札记》译为拉丁文，并加入两章，记述利去世后丧葬诸事，书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记》（*De Chritsiana Expetitione Apud Sinas*），1615年在欧洲出版。重来中国时，带来“西书七千部”。北京原北堂图书馆的西文藏书有属于“七千部”的图书。1628年11月14日卒于杭州，葬于大方井。

⑨天主教堂有“公堂”和“私堂”之分。“公堂”即是一般的天主教堂，“私堂”如教徒家中的小教堂。徐光启、杨廷筠等在家乡建立的小教堂属于“私堂”一类。

④从徐、李、杨参与译著的宗教书籍看，他们对天主教知识的造诣已相当深。如由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的《灵言蠡勺》，是论述天主教所称“灵魂”的著作。又如杨廷筠写的《代疑篇》是中国天主教徒自著的第一本教义书。此书用问答体裁，几乎论述了所有天主教基本信条。

⑤天主教《圣经》包括《古经》和《新经》。《古经》即《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为基督教所继承。《新经》即《新约》，包括《四福音》、《宗徒大事录》、《宗徒书信》、《默示录》等，基督教各教派都以《圣经》为经典，但在卷数上不尽相同，尤其在解释上更有诸多分歧。这些不同也就是这些教派在宗教信仰上除相同处之外的不同处。除《圣经》外，天主教还把称为“圣传”的教义奉为和《圣经》有同样的价值。

⑥海脱令著、王维贤译：《天主教史》上册第111页。

⑦由150篇诗歌组成，分为五卷，是《古经》的一部分。

⑧《华译圣经考补遗》，《圣教杂志》1923年第11期。

⑨阳玛诺，葡萄牙人，生于1574年，1901年至果阿读神哲学。曾在澳门教授神学六年。1611年入内地。到过韶州、南雄、北京、南京、松江、上海、杭州、福州、宁波。他所译的《圣经直解》之最大特色为有索引。有人称“中文书有索引当始自此书”。他译的另一本《轻世金书》，文体艰深。1659年殁于杭州，葬于大方井。

⑩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记述的在受洗礼时诵读受洗者本人写的皈依天主教声明的知识分子有两人，一是李经试，洗名保禄，二是瞿太素，洗名依纳爵。《中国札记》原文是意文。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译自英译本，对照法译本，不尽一致。瞿太素皈依天主教声明中的这句话，是笔者根据法译本，参照中译本重译的。

⑪在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上叶流行于教徒中的用语体写的中文教义书《盛世危言》中，天主教十诫在字句上已改为至今沿用的字句：一、“钦崇一天主万有之上”；二、“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三、“守瞻礼之日”；四、“孝敬父母”；五、“毋杀人”；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盗”；八、“毋妄证”；九、“毋愿他人妻”；十、“毋贪他人财物”。

①天主教把一星期七天都称为“瞻礼日”；星期天称“主日”，星期一称“瞻礼二”，星期二称“瞻礼三”，星期三称“瞻礼四”，星期四称“瞻礼五”，星期五称“瞻礼六”，星期六称“瞻礼七”。又把一年内的许多日子定为“耶稣圣诞”、“受难”、“复活”、“升天”、“圣神降临”和敬礼“圣母”、“圣若瑟”、各“宗徒”、“圣人”、“圣女”的“瞻礼日”，并规定：凡“主日”和“耶稣圣诞”等四个“大瞻礼日”，教徒须去教堂过“瞻礼”，即望“主日瞻礼日”和“圣诞”等“大瞻礼日”的弥撒。

②天主教称神父做“弥撒”为重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教徒去教堂参加这一宗教活动称“望弥撒”。

③天主教称教徒向神父告“罪”为办“神工”。

④天主教称神父在做弥撒时念“成圣体经”的“祝圣”的面饼为“圣体”；又称“圣体”即耶稣。领“圣体”即教徒从神父手中领受这种称为“圣体”的面饼。

⑤神父在行此宗教仪式时在病危教徒和四肢上傳“圣油”，故称。

⑥天主教徒追悼亡者的宗教仪式，主要是请神父为亡者举行“追思弥撒”和请神父至墓地念经。

⑦杨廷筠《代疑篇》，《天主教东传文献》第568页。

二、发展的第一阶段

天主教传入我国后的发展似可分两个阶段：明末清初是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后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的发展有继承性，但又有很大的区别。兹先试述其第一阶段。

据教会史书中的数据材料，1610年利玛窦去世时中国天主教徒是2500人，至1700年则已是30万人。从2500人增加到30万人，是一个不小的发展。发展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明末崇祯帝和清初顺治、康熙两帝，由于客观需要，采取了使用有科学专长的传教士的政策，而传教士则遵照“利玛窦的规矩”传布天主教，中国人中遂不断有人信教，教徒人数逐渐增加。

利玛窦去世后，由于南昌、南京、北京、杭州等地建有耶稣会住院，同时这四地和上海、山西、陕西等地都有第一代天主教徒，传教士得以不间断地从澳门进入内地。这样，中国天主教从一开始就有着这一历史特点：它既有中国天主教徒，又有外国传教士，而且外国传教士在教内居主导地位。当时，有的官员是反对这些外国传教士留居中国的。如沈淮著《破邪集》并上《参远夷疏》，力主驱逐传教士。万历帝曾采纳这些官员的主张，于1617年下令，将在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和在南京的王丰肃（Alphonsus Vagnoni）^①、谢务禄（Alvarus de Semedo）^②一并押解出两京，不准逗留内地。万历帝去世后，1622年，沈淮又一次发难，并把矛头直指庇护传教士的徐光启等。但是，明末大统历多次发生错误，因此经徐光启等推荐，崇

祯帝终于起用能以西法改进中国历法的汤若望等传教士，沈潜等的盲目排外主张教使用有科学专长的传教士的政策所代替。

崇祯帝起用汤若望

汤若望和同来的邓玉涵 (Joham Terrentius)^③ 以及后他四年来中国的罗雅谷 (Giacomo Rho)^④ 都是通晓历法的专家。耶稣会派他们来中国，是实现利玛窦提出的计划。原来利玛窦“利用葡人为通俗用的历书”^⑤ 看出明历法有错误，曾计划用介绍西法以改进明历法的方法，使传教士能在中国长期立足下去。但他自己缺乏历法专业知识，故一再寄信欧洲，请求“遣派一两位做‘天文学’的司铎或修士，来到北京”^⑥。但在利玛窦生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专家被派来中国。直到金尼阁返欧后再度来华时，才带来了汤若望等历法专家。

1629年6月21日日蚀，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互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⑦。崇祯帝于是下决心用西法。他接受徐光启等的推荐，起用邓玉涵，邓病故后又起用罗雅谷、汤若望，从事修历工作。

汤若望等从事修历工作后不久，徐光启于1633年与世长辞。在徐去世前，杨廷筠于1627年，李之藻于1630年先后谢世；而罗雅谷也于1638年作古。在徐等去世后，天主教继续有所发展，汤若望利用崇祯帝对他修历和铸炮工作的重视，向宫廷传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汤若望向宫廷传教

1635年，汤若望劝得一王姓太监入教后，“向他授以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使命”，“付与他向宫中妇女施行洗礼之权”，

“令他向她们宣示教义，并且来回传递教士与宫中妇女之间的函件”。1637年，王太监在宫中始劝得一个女教徒。次年，“宫中女基督教徒之数目已达二十位”；1639年，“增加到四十位”；1642年，“增加到五十位”。^⑩不但如此，汤若望还企图使崇祯帝信教。1640年11月，他把两件来自欧洲的有艺术品价值的“天主降凡一生事迹图”和蜡制“三王来朝”^⑪像进呈崇祯帝，并“乘机上书”，“力劝皇上奉教”^⑫。崇祯“命人们把这两件华丽珍品送至宝库中收藏”，以后“曾时常到宝库中瞻仰”，“并且也屡次读了经文与汤若望底呈文”。^⑬这些记载看来未必是向壁虚构。1640年前后，崇祯处于明室危亡之际，他容忍自己宫内有人把精神寄托于天主教信仰，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汤若望企图使崇祯帝信教，目的在于借皇帝的影响发展天主教。这个企图，他没有达到。但是传教士们已能利用天主教传入宫廷的影响，特别是利用皇帝所赐的“钦褒天学”匾额，加以复制，悬挂天主堂中，在各地发展教徒。“崇祯末年，教传十三省”^⑭，“经耶稣会传教士所付与的洗礼次数，在1634年为287次，1637年为4000次，1638年为3504次，1639年为5480次，1641年为5400次，1643年为4824次”^⑮。按照传教士统计洗礼次数的惯例，这些数字当包括垂死儿童和垂危病者的洗礼数。其中有多少成年人新教徒，很难确定。但天主教传入宫廷的崇祯最后十年，中国天主教徒人数不断有新的增加，上述统计数字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证据。

南明传教士的小插曲

明清易代之际，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瞿纱微（Andreas Xavier Koffler）、卜弥格（Michel Boym）等则到

了南明小朝廷。

毕方济是意大利耶稣会士，1613年到北京。曾至上海、松江和河南等地传教。他交际很广。1644年崇祯帝自尽后，弘光曾起用他。弘光灭亡后，隆武也曾起用他。隆武灭亡后，他到了广州。

1646年11月，由裨被拥立称帝，建元永历。永历小朝廷中有担任要职的天主教徒瞿式耜、焦璠、庞天寿等。瞿，常熟人，洗名多默，“永历用他做宰相”^⑨。焦，南京人，洗名路加，隶瞿麾下。庞是崇祯帝宫监，洗名亚基娄。教会史书称，永历曾遣庞天寿偕毕方济至澳门，“商议借兵事”，葡“遣兵三百名，带大炮数门，来桂林助战”。^⑩瞿纱微就是这队葡兵的随军司铎。1647年3月，清兵在破肇庆取梧州后进攻桂林，不下，收队东去。瞿式耜收复不少失地。12月，永历回桂林。1648年3月，“清兵又来攻桂林，永历仓猝奔南宁，留瞿式耜与焦璠独守桂林。清兵环攻多日，仍未能胜，卒为守城兵击退。”^⑪《明史》对永历获悉这一胜利捷报有记述：“时，王驻南宁，式耜遣使慰三宫起居，王始知式耜无恙，为泣下。”^⑫此后永历朝曾一度出现较有利的形势，版图据有两广、两湖、江西、云贵七省。正是在这时候，葡兵退回澳门后留在桂林的瞿纱微把天主教传入南明宫廷，永历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新生太子慈烜都从他手中受洗入教。瞿纱微给王太后取洗名“赫肋纳”^⑬，给永历王子取洗名“公斯当定”^⑭，寓有企图通过南明宫廷信教，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扶植基督教的历史在中国重演之意。王太后等受洗后，于1648年10月，遣庞天寿携礼物至澳门“求弥撒”，这是为了“感恩”。澳门耶稣会方面对王太后等信教十分重视。他们幻想着永历能逐渐恢复明朝江山，“乃替明廷筹划，遣使赴欧，朝见教宗，转往欧洲各国，

向各国求援”^①。教会历史著作津津乐道的王太后上教皇书和致耶稣会总会长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王太后采纳了遣使赴欧的计划后，庞天寿愿奉使前往。前者以其年高，不允。当时南明官员中的天主教徒是庞和瞿、焦三人；传教士是毕方济、瞿纱微、曾德昭、卜弥格四人。卜是波兰人，1629年入耶稣会，1643年自里斯本启程东来。1646年，他抵达海南岛。1649年，毕方济在广州去世。曾德昭派卜弥格到肇庆。

“于是出使教廷一事，也由卜弥格担任了。”^②1650年11月，卜弥格自肇庆首途返欧。未几，清兵自全州进，桂林大乱。瞿式耜独守不去。清兵入，劝降，瞿不屈，遂被杀。次年清兵破广州，永历西奔。瞿纱微欲前往追随，大约在桂黔交界处，为清兵所获。清兵劈其首而死。卜弥格于1653年春抵罗马后，直至1655年12月始获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复书。1653年3月，他从里斯本搭船动身。1658年抵暹罗。这时两广已入清军手中，无法复命。翌年，病死于交趾。1661年南明亡。天主教传入南明宫廷，卜弥格充明使出使教廷，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不过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顺治帝与汤若望

明亡后，天主教于清初有进一步的发展，和顺治一开始就起用汤若望十分有关。

顺治起用汤若望，也是出于修历的客观需要。“顺治元年（1644年）8月朔，日蚀。上遣大学士冯铨，同内大臣等，督率汤若望暨钦天监监正戈承科等，各带自推之日食图表，登台凭验，验得西洋新法，密合天行，而旧法大统历差二刻，回回历差四刻”，新皇朝乃决定“行用新法”。^③当时顺治帝还年幼，朝廷的实际统治者是摄政王多尔衮。他任命汤若望掌管钦

天监。1645年冬，汤“以修补新历全书告成，恭进御览”^②。他作出了成绩，在朝廷的地位步步升高，任钦天监监正一年多后，加太常寺少卿衔。1651年多尔袞去世后，顺治亲政，诰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1653年，“上赐汤若望号通微教师”^③。1657年，“上授汤若望通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④。1658年，“诰授汤若望光禄大夫，并恩赏若望祖先三代，一品封典”^⑤。

顺治对汤若望恩礼有加，除了修历的客观需要外，我认为下面一事也十分有关。

顺治亲政时还不足13岁。他有着青年人的求知欲。他有许多不懂的事情和需要了解的情况，要向汤若望请教。他师事汤，惯以“玛法”相称。“玛法”是满语尊师之称。他亲临汤的住所。“1656和1657两年之间，皇帝竟有二十四次，临访汤若望于馆舍之中，作较长之晤谈”；“他在汤若望馆舍中的行动，完全和一位朋友到了他的朋友底家里一般”^⑥。“在他们那时常会聚的时机里，聪明的、求知若渴的皇帝学子，要求汤若望对于一切可能事件的解答，譬如：日食与月食之学理，彗星或流星等问题，再就是物理的问题，和关于这一位或那一位官员的问题。汤若望寻常是按照东方习俗，交盘双腿坐于皇帝旁边的一个坐垫上的，因为把腿伸出，是人们视为失礼不敬的。有时因坐地时间过久，他的两腿竟至麻木失觉，然后皇帝就亲助他起立，支扶着他，一直等到唤进来的仆人搀扶他走到门口。在门口皇帝还在去者身后，良久站立目送。……甚至他曾多次被召入皇帝寝殿，当在皇帝晚间已躺在床上将要休息时，他命他的玛法坐于他的床底旁边，汤若望便屈身向床上和年轻的皇帝谈话。”^⑦

在我国各封建皇朝的盛世，皇帝的向背有着多么大的影

响：顺治把汤若望看作是这样尊敬、这样信任的师友，影响所及，使其他传教士也沾了汤若望的光。顺治期间，“在外省传教之西士，因汤公之故，亦得平安无事”^②。中国天主教徒人数继明末之后又有新的增加。中国28个地方：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杭州、金华、兰溪、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赣州、广州、桂林、重庆、保宁、武昌、西安、太原、绛州、开封、北京建有天主堂。1636年天主教徒的数目，“是38200”，1650年“竟多到有15万”，1664年，“共计248100人”。^③

汤若望案及其剖析

年未及23岁的顺治去世后，继承皇位的康熙还不足7岁，索尼等四辅政大臣摄政。起初，汤若望在朝中的地位未受动摇，及至康熙三年（1664年），汉官员杨光先向礼部呈递控告汤若望等的状文，汤即成了阶下囚。和他一起下狱的，还有协助他修历的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④和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⑤、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⑥，以及李祖白等五个在钦天监任职的中国天主教徒^⑦。

杨光先控告汤若望等的罪名是：一、“内勾外连，谋为不轨”；二、“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三、“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⑧这三条罪名没有一条能成立。关于“内勾外连，谋为不轨”，可能是出于对外国势力入侵的警惕性。当时中国沿海不平静，欧洲殖民主义者一直窥视着中国。警惕他们可能的入侵，是必要的。问题是没有真凭实据，仅从警惕性出发，就告人“内勾外连，谋为不轨”，这就成了捏造的罪名。天主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与中国传统思想不同的。杨光先维护后者，反对前者，是以一种思想反

对另一种思想，这里不存在谁是妖书谁不是妖书的问题。至于“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则正是杨光先等缺乏科学知识，在历法问题上抱残守缺，盲目排斥外国好的东西的反映。传教士传入比当时中国先进的西法，有利于中国，是根本无罪可言的。

汤若望案经过多次审理，由于宫廷内存在着不赞成惩办汤若望的力量，在判刑问题上一再变更，最后的结果是：1665年4月20日，南、利、安三人被赦免出狱；5月15日，原判死罪的汤若望也获赦免；三天后，李祖白等钦天监五个教徒官员被斩首，汤若望出狱。

各地传教士遣送广州

汤若望等获释后，至1665年7月29日，在各地的传教士26人^⑧，其中耶稣会士21人，多明我会士3人，方济各会士2人，已全部解京。方济各会士2人中，1人甫至京即去世。同年9月10日奉旨，所有这些传教士，除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仍留居北京外，余皆遣发广州。他们被解送到广州后，“留居于城内住院”，“院内为每一教士置一小室，并增设小堂两所”，“教士能在城中街道上行走，惟不得走出城门”。^⑨

康熙恢复使用有专长的传教士

自从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后，传教士全部为朝廷所不容，这是第一次。不过这时间不长。康熙亲政后，重新恢复了使用有历法等专长的传教士的政策。当时汤若望已去世，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留居东堂。这三人中南怀仁是历法专家，但康熙起初还不知道他们中谁通晓历法。1668年12月25日，他派四近

待至东堂，问他们“是否通晓天文历算”？利类思回答，他和安文思“对历算所知不多”，南怀仁“原系攻读这些学科，可以应用”。^③次日，南等被引至宫内。康熙遣内院大学士李蔚等奉旨谕钦天监监正杨光先、监副吴明烜和南怀仁等：“天文象为礼徵，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争竞。孰者为是，即当遵行。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④接着在12月27日和次年2月18日，^⑤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当着康熙特派的官员，进行测算正午时刻的实验。南怀仁的测算，“逐款皆符”，吴明烜“逐款皆错”，杨光先则“不知推算”。康熙用实践的科学方法证明了“孰者为是”后，乃革杨光先、吴明烜职，录用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工作。据《东华录》，杨光先受处分的罪名是：“职司监正，历日差错，不能修理”和“左袒吴明烜，妄以九十六刻推算谓西洋之法必不可用”。不久，康熙又采取了平反汤若望案的措施，李祖白等照原官恩恤。1671年，他下令遣发广州的传教士中“有通晓历法者，起送来京”，其余“归各省居住”。^⑥那时遣发广州的25个传教士中有6个已相继去世。一个叫闵明我（Navarrete）的多明我会士已潜离广州。澳门有一个耶稣会士乘机顶替这个多明我会士的名字进入内地，他就是我国史学界所称的假闵明我（Philipus Maria Grimadi）^⑦。假闵明我通晓历法，奉召与徐日昇（Thomas Peireira）^⑧等一同进京。

康熙帝与南怀仁等

康熙之与南怀仁比顺治之与汤若望有过之无不及。这除了南怀仁“于修历诸事，异常费心”，“制造观象台各种仪器，精工合用”，“又作永年历书，共三十二卷，预推至2000年”，^⑨

是一个重要原因外，下面两事也很有关系。

第一件事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一月初四日，南怀仁奉旨铸造战炮323位”，“二十年八月十一日，炮位告成”，“十月十九日，上率领王公及内大臣等，幸临试放炮场，谕八旗官员，各领炮手放验，俱适中本鹄，天颜喜悦”，“上释御服貂裘，赐南怀仁”。^⑧

第二件事是：康熙“自20岁至30岁，刻意讲求西学，命南怀仁、徐日昇、闵明我三位神父，轮班进讲，殆无虚日”^⑨。南怀仁“给康熙皇帝讲解了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和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最新奇最简要的内容”^⑩。康熙“要学习西洋学理”，徐日昇“用汉语编写了教材，并指导工匠制做各种各样的乐器，而且教康熙皇帝用这些乐器演奏两三支乐曲”。^⑪

康熙厚遇把科学技术服务于中国朝廷的传教士，南怀仁的官衔步步上升，1674年加太常侍卿职衔，4年后加通政司通政使衔，又4年后加工部右侍郎衔。这就客观上为天主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

首先，康熙起用南怀仁后尚未取消的禁教令，实际上已等于一纸空文。遣发到广州的传教士“奉旨归堂”后，“地方官莫不优礼相待，各省封禁之堂，一律交还”。^⑫传教士回到各地后，利用康熙重用南怀仁等的影响，传布天主教，教徒人数进一步增加。

其次，南怀仁用“通晓历法”等名义，在引进了假闵明我和徐日昇等后，又先后引进了安多(Antonius Thomas)^⑬和由法王路易十四正式派遣并予以经济资助^⑭的法国耶稣会士洪若(Joannes de Fontaney)^⑮、白晋(Joachim Bouvet)^⑯、张诚(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⑰等首批传教团。这一法国

传教团于1688年2月7日到京。那时，南怀仁才病故，康熙正需要着新来的传教士。他命安多同闵明我、徐日昇一起搞历法，命白晋、张诚“在京备用”，洪若等三人“听其随便居住”。^⑤于是传教士人数又有了新的增加。

南怀仁去世后，康熙对有才学的传教士的使用有增无已。如1689年5月，康熙命徐日昇、张诚随内大臣索额图等北往尼布楚，参与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工作。康熙对徐、张两人在签订这一条约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肯定的。康熙还把绘制中国地图的重要任务交给了白晋等。

传教士中有长于科学技术者，也有无科技特长的。当时在各地天主堂的传教士一般属于后一种。从1684年和1689年康熙两次南巡时，在南京、济南、杭州等处派随员访问天主堂和接见传教士等情况看，康熙对在北京以外的传教士也相当重视，1692年他正式批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⑥，就是说教徒可以自由地到由传教士主持的天主堂参加宗教活动。康熙从起用有科技专长的传教士到允许传习天主教，是天主教传入后明清之际教徒人数最多的时期。据教会统计材料，1700年，中国天主教徒有30万。

中国主教罗文藻和中国神父吴渔山

明末教徒中还没有出家做神父的，清初才有了几个中国神父。其中有点知名度的，一是罗文藻，二是吴渔山。

罗是福建福安人，吴是江苏常熟人，两人相差十几岁，都生长于17世纪上半叶。当时西班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已从马尼拉进入福建。罗在“十八岁至二十四岁之间”从一个方济各会传教士手中领洗入教后，曾多次去澳门和马尼拉。

1645年第二次去马尼拉后，他在“圣多玛斯学院”内“习拉丁文、西班牙文及哲学，凡两年半”^⑤。一度回福建，他外国传教士的传教助手。后又去马尼拉，入多明我会。1654年7月4日受“祝圣”成为神父。次年多明我会马尼拉省省会长派他“回国传他”^⑥。那时已是清朝。他的足迹，除福建外，还遍历其他好几个省。1685年，他在广州由有主教头衔的方济各会传教士伊大仁（Bernardinus della Chiesa）“祝圣”为主教，是第一个中国人主教，当时称“司教”。他不像西方的主教，也不像鸦片战争后的主教，无主教座堂、主教公署、主教的那套排场。他做主教仅五年多就病故。

吴是清初杰出的山水画家之一。他的一生在入教前和入教后截然不同。入教前是画家，入教后又入耶稣会，成为上海地区第一个中国耶稣会神父，从此不再画画。吴从画家成了天主教徒，但“何年，何人为施洗，记载阙如。”^⑦陈垣据吴“常至兴福庵”，“自康熙十四年后，即不复见渔山有至兴福庵之迹”，称吴入教“当在康熙十四年后”。方豪则称，“渔山乃自幼领洗。”我认为，陈说较有根据。吴40岁后，与在江南一带传教的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鲁日满（Franciscus de Rougemont）、柏应理（Philipus Couplet）交往。他写有一首《颂先师周铎》的诗。从诗句“七载慈祥感下民”可以看出，他曾向这个取中国周姓的传教士学习教义达七年之久。但“周铎”其人史书上无传。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吴年51岁，妻已亡，去澳门入耶稣会初学院^⑧。陈垣据此，称吴入教“必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前”^⑨。1688年，吴由罗文藻“祝圣”为神父。后在上海、嘉定等地传教。

罗无著作传世。但从他去世后吴渔山写的《哭司教罗先生》诗中“当其斋候讲经学，巷拥轮蹄门集履”，“又期勸健崇正

事，秋毫无不贯西史”，“日谈前圣励后修，更将老笔笔于纸”等诗句看，罗深谙教义，能独立向人传授。吴的宗教虔诚与罗相似。他有许多抒发浓厚宗教感情和反映沉浸于传教生活的诗，如：“但愿长年能健牧^①，朝往东南暮西北”，“渡浦渡浦莫迟误，来朝顾病^②浦西路”，收录在《墨井^③诗钞》、《三巴集》、《三余集》。又遗有《口铎》等，是最早的中国神父讲道集。

反对“利玛窦的规矩”的传教士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敬孔”和“祭祖”是两大源远流长的礼仪和习俗。利玛窦适应中国当时的这一国情，对中国教徒参加“敬孔”或“祭祖”，在“敬孔”是“敬其为人师范”、“祭祖”是“尽孝思之诚”的解释下，^④予以认可，不加禁止。因此，当时中国教徒，特别是有政治、社会地位的人信天主教后，在需要参加“敬孔”或“祭祖”仪式时不发生困难，他们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参加。此外，前文已讲过利玛窦还把天主教的信仰对象——天主说成就是儒家经典中的“上帝”。利玛窦这些适应中国当时国情的做法，康熙帝曾称许之为“利玛窦的规矩”。

1631年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第一批三人开始从菲律宾进入了福建。二年后，一个方济各会会士到了山东。1684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也到了福建。这些来到我国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中，一再有人反对利玛窦的规矩，干涉中国教徒参加“敬孔”和“祭祖”仪式。在中国的传教士于是分成两派：一派遵照利玛窦的规矩，一派反对利玛窦的规矩。两派发生争论，但主要争论的地方却在欧洲。这就是天主教史上所称的“中国礼仪之争”。

“中国礼仪之争”形式上似乎是一个天主教神学问题，其实有当时欧洲的背景。16世纪末，葡萄牙已开始走向衰落，西班牙在其“无敌舰队”于1588年被英国打败后，也一蹶不振。17世纪，继葡、西之后成为海上强国、向外追逐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是荷兰、英国和法国。这三个资本主义国家，就宗教而言，荷兰、英国主要是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法国主要仍是天主教。和葡、西关系十分密切的罗马教廷，在法国成为新起的海上强国后，和法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反映在对中国传教问题上，罗马教廷支持法国争夺葡萄牙在中国的传教地盘。

在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之前，在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是受澳门耶稣会遥控的，而澳门耶稣会的上级是果阿印度省耶稣会和里斯本葡萄牙当局。西班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特别是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之后，竭力企图打破以葡萄牙为背景的耶稣会传教士独占中国传教地盘的局面，建立由他们各霸一方的传教地盘。这种争夺表明，他们不是单纯地为了传教，而是背后各有其本国企图谋求的利益。正是这个原因，最初于1635年由以西班牙为背景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向罗马教皇控告以葡萄牙为背景的耶稣会传教士而闹起来的“中国礼仪之争”，经过半个多世纪，一直闹个不停，至1693年发展成为主要以法国为背景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同以葡萄牙为背景的耶稣会传教士之间的攻讦。

1684年来到中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中，有一人是罗马教廷传信部^①任命为“有总辖中国教务之权”^②的主教，名叫陆方济(Francois Pallu)^③。他到福建后不久去世。继承他的，是和他同来中国的同会传教士阎当(Carolus Maigrot)^④。这个后来被康熙帝斥为“文理不通”的法国传教士，于1693年

3月26日俨然以陆方济继承人的名义发出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的“训谕”，并于同年11月10日把这“训谕”送教皇英诺森十二“审阅”。

教皇派使者来中国

1700年，正当“中国礼仪之争”在巴黎和在罗马愈争愈烈的时候，闵明我、徐日昇、安多、张诚为了使欧洲知道中国是如何看待“敬孔”、“祭祖”的，联名请康熙说明这两项礼仪的意义所在。康熙肯定了利玛窦的解释：“敬孔”是“敬其为人师范”，“祭祖”是“尽孝思之念”。^⑩“中国礼仪之争”应该休止了！但是，英诺森十二在位时欧洲在争论着，他去世后继续在争论着。1704年，教皇克来孟十一最后作出了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的决定。在作出这个决定前二年，教皇已派铎罗（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⑪作使者来中国。铎罗来中国，不乘葡萄牙船而乘法“麻肋巴号”（Marie-Jas）军舰。1705年12月4日，他到了北京。康熙召见了。当康熙知悉罗马教皇派他来中国的目的，是要推翻利玛窦的规矩，即下逐客令，命铎罗离开中国回去，同时令传教士“领票”^⑫。康熙亲自明白告诉传教士：“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⑬当时，耶稣会传教士领了票，不领票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徐日昇、安多、闵明我相继去世后，康熙继续使用有历法专长的传教士。领票的传教士照旧居住在各城天主堂。当时有的官员对领票的传教士也有反感。如1711年御史樊祚绍，1717年广东总兵碣石总镇陈昂奏请“禁止”、“禁绝”天主教，康熙都未准。可见当反对利玛窦的规矩的传教士和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问题摆到康熙皇帝面前时，康熙不是一开始就采取禁

教政策的，他曾等待罗马教廷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

康熙对传教士政策的改变

罗马教廷交给铎罗的使命失败后，又于1720年遣使来中国。这第二次使者名叫嘉禄(Carolus Ambrosius Medio-barbus)^⑧。到北京后，康熙召见他多次，并命传教士把他带来的克来孟十一的“禁约”译成中文。康熙看了这个“禁约”后才批示：

“览此告示，只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官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⑨

康熙在位61年。1720年他在位第59年对嘉禄带来的教皇禁令作出上述反应，是他识破了罗马教廷不尊重当时中国习俗，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后，在对待传教士“行教”问题上断然作出的政策大改变。

雍正下令禁止传习天主教

雍正即位初，福建总督满宝奏请“待各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礼部议复：“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伤”。^⑩1724年1月11日，雍正批准礼部的决定。以后他又向在北京通满文的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⑪、冯秉正(de Mailla)^⑫和参加测绘《皇舆全览图》的费隐(Fridelli)^⑬直接说明他所以采取这措施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外国对中国可能引起的扰乱。冯秉正于1724年10月16日从北京寄给欧洲的信中记述了这一谈话。雍正说：

我父皇先皇帝教导了我40年，在我各兄弟中优先选择我继

承他登上皇位。我治国最注意的一条，就是不要丝毫背离我父皇的治国之道。在福建省的西洋人践踏我法律，扰乱我子民，当地大吏已向我报告。事关国家，我应负责予以制止。以前我做太子时可以不闻不问，现在则不能置若等闲。●

你们说，你们的教不是假的，我相信。否则我早已命令尽毁你们的教堂和完全驱逐你们。假的宗教是以道德为护符而以捣乱为宗旨。试想，如果我派一支和尚和喇嘛的队伍到你们的国家宣传他们的教，你们将怎么说？将怎样收留他们？

利玛窦于万历初年来中国。当时中国人的做法，与我不相干。但那时你们的人数微不足道，非各省都有你们的人和教堂。及至我父皇朝，你们到处设立教堂，你们的教也迅速传布。以前我目睹这状况，但未敢一言。现在你们不要想你们能像欺骗我父皇一样地欺骗我。

你们要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天主教徒，我知道这是你们教的宗旨。但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教徒只知道听从你们，一旦有事，他们将惟你们之命是从。这一点现在虽不必虑及，但当千舟万船来我海岸时，必将产生扰乱。

中国北有俄罗斯，不可小看；南有西洋人和他们的国家，也不可小看；西有策妄阿喇布坦（鞑靼君主，八年来向中国发动战争），我要阻止他入内，不使他扰乱中国。沙皇使臣曾请求允许莫斯科人在各省通商，我已拒绝，只允许他们在北京及边境贸易。现在我准许你们在北京和广州居住。你们如有怨言，则北京和广州也不能居住。我不愿在各省有你们的人。我父皇先皇帝屈就你们深入各省，颇为文人学士所不满。我在位之日，将不允许我们古贤所立的法律有任何变更，人们对我也将无非议。将来我的儿子、我的孙子登上皇位后如何做法，是他们的的事；至少我不像万历，不会和他一样做法。

你们切莫以为我是在反对你们或压制你们。当知我做太子时曾帮助过你们。你们当记得你们的教徒家庭中有一家起来反对其不祭祀祖宗的家长，你们感到棘手，求助于我。我使事态平息。现在我所做的，是以皇帝的身份。我惟以治国为务，从早到晚，甚至无暇会晤我的皇子和皇后，终日所晋接者是朝廷当国钧的大臣；我守制三年间，将常如此。期满后仍可像往常那样接见你们。①

雍正这席话是研究他禁止传习天主教的重要文献资料。

处理外国教会、外国传教士和我国关系的历史经验

明末清初传教士来中国，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文化起源很早。我国古代有自己的天文学、数学。造纸、指南针、火药，素称我国三大发明。但是当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来中国的那时候，西方正是资本主义上升，封建主义崩溃，生产力大为发展，科学已开始进入了近代科学的新领域，而我国却仍停滞在落后的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远来我国，虽然有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竭力向海外谋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背景，目的又是传教，但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而言，他们中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传入欧洲科学文化知识，客观上起的积极作用，无论如何是不可一笔抹煞的。

利玛窦等传教士来中国时，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强大的主权国家。外国入侵的危险潜在着，但中国有防御自卫力量。利玛窦等传教士不可能像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那样，享有种种特权。②他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受中国政府的管理。他们可以为中国服务，但不可为有侵略野心的外国效劳。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入华耶稣会士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的有科技

专长。明末崇祯，清初顺治、康熙，使用有科技专长的传教士，是正确的政策。特别是康熙，他是愿意有更多的有科技专长的传教士来为中国服务的。他们把钦天监的要职交给汤若望、南怀仁等，是历史上中国礼遇远来的愿意帮助中国的外国人，包括抱着传教目的而来的有科技专长的传教士的一个实例。

但是康熙最后下决心禁教，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康熙禁教说明：在处理外国教会、外国传教士和我国关系的问题上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内政的可能干涉。一旦外国教会、外国传教士果真干涉了中国内政，对这样的传教士，如阎当之流，就决不能允许他们留在中国。

雍乾嘉道四朝传教士和天主教徒状况

雍正禁止传习天主教后，各地天主堂充公，传教士集中广州，后逐回澳门；但在钦天监任职和在宫廷服务的有专长的传教士仍继续留居北京，南堂、东堂、北堂依然存在，还造了西堂。乾隆时，北京仍有着搞历法、善绘画和懂医学、物理等的传教士。如郎世宁（Josephus Castiglione）^①在内廷作画达50年之久。嘉庆时，在钦天监任职的耶稣会士，因耶稣会解散，由遣使会传教士接替。道光时，钦天监的中国官员“已深知西法、不必复用西洋人，奏奉宣宗谕，停西洋人入监”^②。1837年，钦天监最后两个传教士高守谦（Serra）和毕学源（Pires）一个回欧，一个“因疾致仕”。次年毕去世。北京没有可以合法居留的传教士后，南堂关闭。其余三个教堂则早已相继拆除。

在北京仍有着任职钦天监的传教士时，从澳门潜入内地后，匿居在教徒中的传教士，和他们秘密联系，并在暗中进行传教活动。这些匿居在教徒中的传教士，有的被查获后，以干犯禁

令受到清政府严厉惩处；有的未被发现。据教会史书记述，当时潜入内地的传教士，以江南为“便易”，“因有许多河港，可以以船为家，隐匿其中”。^②这些在北京的传教士和匿居在江南、湖广等地的传教士，把个别中国教徒送到澳门“圣若瑟公学”或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院”^③“修道”^④，使他们成为神父后重新回内地。由于北京的传教士和从澳门潜入内地的传教士以及由他们“培养”的中国神父秘密地进行着传教活动，因此雍正禁教后的一百多年间，虽然天主教徒入数锐减，但天主教仍存在着，一些保持着信仰的教徒，有时仍能参与由潜藏的外国神父或中国神父一般在夜间主持的宗教活动。这些在雍正禁教后世代相传地保持着信仰的教徒，是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发展的信众基础。

注 释

①王丰肃，意大利人，生于1568年。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说他1605年至南京，但他在南京入狱后称1611年3月到南京居住。被押解至澳门后，于1624年改名高一志，重入内地，至山西绛州等地传教。1640年卒于绛州。

②谢务禄，葡萄牙人，生于1585年。1613年至南京。与王丰肃同入狱，同被押解至澳门。1620年改名曾德昭，至杭州，不久去江西、江南，1621年至西安。1637年自澳门启程赴罗马，出席各国耶稣会代表会议。1644年重来中国。1649年至广州。1658年卒于广州。

③邓玉涵，1576年生于康斯坦茨（今联邦德国境内）。是大科学家伽里略的好友。1618年偕金尼阁等自欧来华。1620年到澳门，不久到杭州，住李之藻家，译成《人身概说》2卷。1629年至北京协助徐光启等修历。1630年去世。

④罗雅谷，意大利人，生于1593年。1618年偕金尼阁离欧东来，1622年抵澳门，在澳门两年。1624年至山西绛州等处。1630年至北京协助徐

光启等修历。1638年去世。

⑤裴化行《中国天文学问题》，《新北辰》1933年第11期。

⑥裴化行著，王昌社译：《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2册第265页。

⑦《明史·历志》。

⑧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1册第182~183页。

⑨《新约》称：耶稣诞生后，天上有异星显现，引东方三博士至耶稣诞生地朝拜。

⑩肖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195页。

⑪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1册第191页。

⑫肖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193页。

⑬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1册第196~197页。

⑭肖若瑟《圣教史略》第2册第91页。

⑮同上书，第92页。

⑯同上书，第95页。

⑰《何澧蛟、程式相列传》，《明史》卷二百八十。

⑱君士坦丁大帝之母名赫肋纳(Helena)，天主教称之为“圣后”。

⑲Constantinus，中国天主教的译名为“公斯当定”，即君士坦丁大帝。天主教称他“卒前领洗”，并称他为“圣王”。

⑳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52页。

㉑同上。

㉒黄伯禄《正教奉褒》第1册第23张。

㉓《大清世祖章(顺治)皇帝实录(一)》第257页。

㉔黄伯禄《正教奉褒》第1册第25张。

顺治帝赐汤若望称号原为“通玄教师”。嗣位的皇太子(即康熙帝)名玄烨。据中国古制，玄烨即位皇帝，御名例应避讳。但当时汤若望不能擅自改易先帝赐号，故在康熙帝即位之初，即上疏请示，奉旨以“微”代“玄”，从此便称“通微教师”。

⑳同上书，第30张。

㉑同上。

㉒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2册第277页。

㉓同上书，第274页。

㉔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19页。

㉕德礼贤《中国天主教史》第67页。

㉖南怀仁，比利时人，1623年10月9日生，1641年入耶稣会。1656年来中国。1687年12月26日去世。

㉗利类思，意大利人，生于1606年。1637年来华，先在江南，后去四川传教。1642年安文思亦到四川。次年，张献忠入川，为献忠所获。及献忠败死，为清兵所获，解见肃亲王豪格。1648年被送至北京。1682年卒于北京。著有《超性学要》等。

㉘安文思，葡萄牙人，生于1609年。1640年来华，先至杭州，后入川。与利类思同为张献忠所获，后又为清兵所获。1648年被送至北京。1677年卒于北京。

㉙李祖白，汤若望的学生。入狱时，在钦天监任夏官正。著有《天学传概》。另四个天主教徒是：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恭。

㉚杨光先《请诛邪教状》（杨光先《不得已》方豪藏本影印本），《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三）》第1077、1078页。

㉛据高龙髯《江南传教史》记述，杨光先告发汤若望时，在福建的几个多明我会士“获得北京送来的消息，知案中未提及他们的名字与所在的教堂，因此决定留在福建，销声匿迹”；多明我会中国会士罗文藻“也在禁令之外”。杨光先不知道这几个多明我会传教士，故在福建的多明我会传教士未全部解京。

㉜高龙髯《江南传教史》第2册卷3，第192页。

㉝同上书，第206页。

㉞黄伯禄《正教事衷》第1册第42张。

㉟史式微《在中国的耶稣会老传教区》（de la Serviere: Les anciennes mission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en Chine）第47

页。

④黄伯禄《正教奉褒》第1册第61张。

⑤假闵明我，意大利人，生于1633年。1669年抵澳门。1712年卒于北京。

⑥徐日昇，葡萄牙人，生于1645年。1672年抵澳门。1708年卒于北京。

⑦肖若瑟《圣教史略》第2册第156页。

⑧黄伯禄《正教奉褒》第2册第77~78张。

⑨肖若瑟《圣教史略》第2册第158页。

⑩白晋著，赵晨译：《康熙皇帝》第32页。

⑪同上。

⑫肖若瑟《圣教史略》第2册第154页。

⑬安多，比利时人。1684年来华。1709年卒于北京。

⑭1685年1月28日，法王路易十四签署派遣法国传教士到东方来的敕令，并谕令“每年以9200金元补助在印度及中国的法籍耶稣会士20人”（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2册第269~270页）。

⑮洪若，法国人，生于1643年。1685年从法国布里埃朗脱(Briest)乘船至暹罗。1687年越过澳门而抵宁波。1688年2月7日抵北京。同年5月至南京传教。1699年回欧。次年又率耶稣会传教士8人来华。1703年3月1日自舟山乘英船离华，次年抵伦敦，然后赴法国作“教务报告”。1710年卒于法国。

⑯白晋，又作白进，法国人，生于1656年。与洪若等同时来华。1693年返欧。1699年率耶稣会传教士10人来华。1730年卒于北京。著有《康熙皇帝》(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⑰张诚，法国人，生于1654年。和洪若、白晋等同时是法王路易十四派来的传教士。来华后，致力于学习汉、满文。1707年在北京去世。

⑱黄伯禄《正教奉褒》第2册第87~88张。

⑲《熙朝定案》(寒斋藏本影印本)，《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三)》第1789~1790页。

①《罗文藻》，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2册第147页。

②同上书，第149页。

③《吴渔山生平》，《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册第244页。

④耶稣会规定，入耶稣会，必须先入初学院做初学修士。耶稣会士有神父和辅理修士两种。初学修士志在成为神父的，经初学后，再入文、哲学院和神学院读书，然后受“祝圣”成为神父。

⑤《吴渔山生平》，《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册第244页。

⑥天主教以“羊”比喻教徒，以“牧羊人”比喻主教、神父。

⑦指为病危教徒施行“终傅圣事”。

⑧吴渔山号墨井道人。

⑨肖若瑟《圣教史略》第2册第169页。

⑩“传信部”是“宣传信德部”的简称。天主教称“信仰天主”为“信德”。是罗马教廷行政管理机构之一，专管它所称的“传教区”的教会和教务。17世纪20年代初成立于里昂。“传信部”建立后，擅自把中国划入它所称的“传教区”，并擅自把中国天主教会和教务置于它的管理之下。本世纪60年代曾改名为“宣道部”。现称“万民福音部”。

⑪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27页。

⑫陆方济，法国人，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始人。来华前，曾在越南传教。1684年抵福建，同年10月29日病逝于福州穆永。

⑬阎当，法国人，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铎罗作为罗马教廷使者至北京时，曾召阎当至京。阎至北京后，康熙于1706年7月22日命他往热河行宫。觐见时，康熙指座后四个字，问他认识不认识？阎只认识一字。8月2日，康熙亲笔谕曰：“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3日又谕曰：“谕示多罗（按：即铎罗），颜瑛（按：即阎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后铎罗离北京至南京时，康熙下谕驱逐阎当等出境。

⑭黄伯禄《正教奉褒》载：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治理历法远臣冈明我、徐日昇、安多、张

诚等谨奏，为恭请睿鉴，以求训海事。窃选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虽设立祖先之牌，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位之上，不过抒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①至于郊天之礼典，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即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主者，犹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上所赐匾额，御书‘敬天’二字，正是此意。远臣等鄙见，以此答之，但缘关系中国风俗，不敢私寄，恭请睿鉴训海，远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本日奉御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钦此。”

① 铎罗，1702年7月4日离罗马，先后抵印度、马尼拉。1705年4月2日抵澳门，未入城，5日入广州。在广州“设立传信部在华办事处”（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同年9月9日，经康熙批准后，由广州北上，住北堂法国耶稣会处。康熙曾两次接见铎罗。在第二次接见时，康熙一再盘问铎罗使华目的，铎罗答：“为向皇上问安而来”。1706年8月20日，铎罗离北京，12月17日抵南京。1707年康熙南巡至南京时，铎罗已至广州。康熙以铎罗拒交教皇任命状，命押解澳门。澳门当局将他软禁。1710年6月8日病死澳门。

② 1706年，康熙谕内务府：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用内务府印给发。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

③ 《康熙在苏州谕众西洋人》，《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④ 嘉祿，1720年3月25日自里斯本启程，9月26日抵澳门。10月12日至广州。12月下旬至北京。在北京两个多月。1721年3月3日出北京。同年12月9日由澳门启程回欧，随带铎罗的棺材。

⑤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⑥ 《大清世祖宪（雍正）皇帝实录（一）》第211页。

①巴多明，法国人，生于1665年。是1690年白晋返华时带领来华的10个耶稣会士之一。精通汉、满文，曾担任康熙帝与外国来使谈话的翻译。雍正时曾主持教授满人学生拉丁语的译学馆。1741年卒于北京。

②冯秉正，法国人，生于1689年，1703年来华，是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70年代的一百年间在北京为清廷服务的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耶稣会士之一。雍正下令驱逐在各省的传教士后，他和巴多明等继续居留北京。1748年去世。

③费隐，奥国人，生于1675年，1705年来华，曾在镇江传教。是康熙年间测绘《皇舆全览图》的耶稣会士之一。卒于1743年。

④《耶稣会士书信集选本》(Choix des lettres édifiantes)，1808年巴黎聋哑印刷所版，中国部分第2卷第257~260页。

⑤郎世宁，意大利人，生于1688年。耶稣会辅理修士，以画驰名。1715年12月22日抵京，由在京传教士引见康熙帝，奉命学习中国画。雍正元年，奉召入内廷供奉，住如意馆。乾隆为太子时，常至如意馆观郎世宁作画，对其作品，至为爱好，即位后，仍屡往观赏。1766年卒于北京。

⑥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0025页。

⑦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65页。

⑧意大利人马国贤(Matteo Ripa)所创。马是康熙时罗马教廷传信部派遣来华的传教士。1723年(雍正元年)，他回欧。次年抵意大利。他向教皇及意国王处“奔走八年，方获得许可”，在那不勒斯成立“圣家院”，“培植”中国神父。1732年成立。1688年12月7日为意政府没收。

“自开办至停办，共历一百三十六年，中国学生共达一百零六人”。(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⑨天主教内一个教徒要成为神父，须经过“修道”的过程。教徒愿做神父，经有关教会人士考察，认为其做神父的意愿系“来自天三”(天主教术语称有“圣召”)，始可入修道院。“修道”过程主要是学习天主教官方神哲学。

三、发展的第二阶段

清采取闭关政策。这一政策，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又一个兴起，这些国家生产力大大发展，科学技术先进，经济基础雄厚，军事力量强大，不断向外掠夺的国际形势下，显然只会导致中国的落后，无力抵御列强的入侵。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关闭着的大门终于被轰开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都把中国作为肥肉，企图吞下它。外国的军舰驶进了中国的港口，商人、传教士陆续不断地来到了沿海城市。

传教士纷至沓来，天主教又发展起来，中国天主教发展的这第二阶段，是明末清初第一阶段的继续，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这第二阶段中，传教士不再像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受中国政府的管理，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各受其本国政府的保护，并依仗他们本国政府迫使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处设立教堂、修道院和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等，用各种方法传布、发展天主教。这第二阶段的发展是从上海开始的。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上海

鸦片战争，英国首先入侵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法国接踵而至，攫取侵略利益。1844年，它派遣的使臣拉萼尼（Lagrené）在停泊于广州黄埔的法国巡航舰“阿基米德”号上，与清两广总督耆英签订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这个条约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

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拉萼尼是法国天主教的一个政界人物。《黄埔条约》签订后，他得寸进尺地要求耆英奏请道光帝弛禁天主教。耆英果然照办，“上书具奏，旋于是年11月间，奉御批，依议施行。”^①1846年2月20日，道光发布“上谕”：“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②在清政府弛禁并准发还旧天主堂后，首先依仗英、法势力在中国地方官员面前耀武扬威起来的，是原潜藏在上海的受罗马传信部指挥的传教士罗伯济（Louis de Besi）和1842年来到上海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Glaudius Gotteland）等。

前文讲过，雍正禁教后仍有传教士从澳门潜入内地，潜藏在避过官府耳目的教徒中。罗伯济1834年至澳门后潜入湖广，又从湖广来到江南。1840年，罗马教廷传信部无视中国主权和清政府禁令，擅自任命他为“首辖”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的“南京教区”的“署理主教”。他潜藏的地方是靠近黄浦江的金家巷。当南格禄等从澳门乘一艘英国三帆船“马斯登”号，于1842年5月7日到被英国攻占的定海时，他派三名教徒“前往迎接”^③。7月11日，南格禄等到达扬子江口。此日，他们登上一条由几名教徒驾驶的小船到金家巷，和罗伯济汇合。

南格禄等到上海，既不同于明末利玛窦到肇庆，须求得肇庆知府允准，才能留居，更不同于雍正禁教后的160多年从澳门潜入的传教士，一旦被发现、拿获，就要按触犯清政府的禁令受到严厉制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黄浦江畔的英租界范围已经圈定”，英美两国商人“在上海城垣之外盖起了洋行洋楼”，“这些英美商人的和平入侵对改变天主教主教神父们的处境影响越来越大”，“从此以后，至少在上海

附近”，罗伯济、南格禄的行迹“不必再躲躲闪闪了”。④

1846年8月，罗伯济和已被任命为上海耶稣会会长的南格禄“决定要求上海地方官员先发还上海城内天主教堂和旧教产”⑤。他们委派新到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士梅德^⑥尔(Mathurinus Lemaître)具体经办这件事。梅靠了英领事阿礼国(Ratherford Alcock)等的帮助，终于向上海地方官员强索得了董家渡、洋泾浜、石皮弄三块土地。接着，南格禄又在徐家汇徐光启的几户信教后裔中得到了一块土地。有了这些土地后，南格禄造了第一所徐家汇天主堂，罗伯济和他的继承人赵方济(Maresca)在董家渡造了“主教座堂”。1851年、1853年，这两个教堂相继落成。上海又有了天主教堂，是鸦片战争后天主教重新发展的开始。

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文约本中^⑦加进 “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

拉萼尼达到了迫使清政府弛禁并发还旧天主堂的目的，但传教士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几个通商口岸，不能赴内地，因为道光1846年的“上谕”同时规定：“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⑧

1852年法国传教士马赖(Chapdelaine)擅自潜入广西西林。1856年2月，当地政府把他逮捕法办。这一年的10月，中国水师在“亚罗”号船中逮捕海盗。英国驻广州领事硬说这船是英国船，进行干涉。英、法以这两事件为借口，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军把战火烧到京津。1858年5月，清政府被迫分别同俄、美、英、法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同法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列入了法国长期来梦寐以求的派遣传教士入中国内地的条文。该条约第十三款中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

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⑦ 1860年10月、11月，英、法、俄等国又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当时担任翻译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在北京条约的中文约本上私加进‘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替后来天主教会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伪造了条约根据”^⑧。

孟托班与北京南堂的重开

在法国的“保护”下，继上海之后，天主教在北京也重新开始发展。19世纪30年代末，北京已没有外国传教士。从澳门潜入的、主要在西湾子等地秘密进行传教活动的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孟振生（Mouly）于1856年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北京主教”后，一直无法进入北京。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侵入北京后，孟振生等于这个月的23日“来至法国大营”^⑨。孟充当了英、法侵略军和恭亲王之间的联络员。在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法侵略军中将司令官孟托班（Monlauban）决定在已关闭了20多年的南堂，为侵略军阵亡士兵举行“追思弥撒”。当时南堂一片荒芜，部分屋面已损坏，铁十字架已被拿走。孟托班“派一队工程兵，带了必要的工具，在四十八小时内把教堂装修就绪”，在他下命令后“不到两小时”就送回来的原来的十字架，“重新放到了教堂顶上”，还“放上了钟”。^⑩ 29日，孟托班“由全体幕僚和一大群军官陪同坐着轿子进入南堂”^⑪，由一个法国“随军神父”举行弥撒，孟振生的助理主教主持“追思礼”，孟自己“讲道”。他在“讲道”中，“用热烈的言词，感谢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对宗教的支持，感谢法国将军

率领军队一直打到北京”^②。南堂为法侵略军阵亡士兵举行“追思弥撒”的这一天，就是这个教堂重新开堂的日子。因此，孟振生还举行了开堂仪式。仪式最后，他唱起了“祝祷保护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的“圣歌”。^③在孟托班直接插手和支持下，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孟振生不费吹灰之力，重开已封闭了20余年的南堂。这一事实表明：外国侵略魔爪伸进中国，传教士也开始在中国飞扬跋扈，清政府已丧失管理天主教事务的主权。

教案的最根本起因

随着上海、北京两地天主教，一南一北，重新开始发展，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教士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各地。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有法国耶稣会、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又有意大利方济各会、米兰和罗马外方传教会，西班牙多明我会和奥斯定会，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德国圣言会等等修会和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明末清初没有也不可能有外国修女来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修女也开始来到中国。如法国仁爱会修女到了宁波、上海、天津、北京，法国拯亡会修女到了上海。这些法、意、德等国的传教士在中国有各自政府的“保护”，享有特权，是和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的最大不同点。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虽亦有葡萄牙“保教权”的“保护”，但葡萄牙的“保教权”在澳门可以实施，在内地就等于零，是绝对无法实施的。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教士最先都受法国“保护”，后来，法国的传教士有法国“保护”，意、德等国的传教士有意、德等国“保护”。传教士受他们本国“保护”，不受中国政府管理，享受特权，他们中有些人就有恃无恐地干出了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所不

可能干的事。我国近代史上，有的传教士要求和帮助他们本国侵略中国。例如，“在越南被法国亡国以后，驻在云南的法国主教，也曾写信给法国政府，要他们的政府派出兵来占领中国。”^④不少传教士凭借特权，欺压中国人民，强买强占土地，包庇入教莠民，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无可否认的、不能不加以谴责的事实。

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主观动机，往往是出于传教热忱，但在政治上大都站在侵略中国的各自政府一边，加上他们中有的还直接参与他们本国侵略中国的活动，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民各种形式的反抗。许多教案就是这样酿成的。教会史书常把教案的发生归咎于中国人民，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我们不否认，当时中国社会情况复杂，部分人有盲目排外倾向，不少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对西方文化抱有偏见；也不否认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又发展起来时，有些地方流传的诸如“剜眼剖心”等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对有些教案的发生有关。但是，无稽之谈总是无稽之谈。如果不是由于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以他们本国政府为后盾，凭借不平等条约，干下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事，已激起民众的公愤，那些无稽之谈是不会那样流传的。传教士有侵略中国的外国为背景，政治上站在侵略中国的外国一边，有的传教士帮助外国侵略中国，这才是教案的最根本的起因。特别是教案发生后的以下两种情况：一、传教士向他们本国在中国的公使告状，他们本国在中国的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的淫威，满足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道歉赔款，捕杀无辜；二、传教士的本国政府以教案为借口，出兵中国，夺取和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更加大大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义和团运动后天主教的发展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摧毁了许多地方的外国传教士势力。八国联军把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后，吓破了胆的清政府采取保教政策，三令五申地命令地方政府保护传教士和教堂，地方政府也制订了具体保护办法，如袁世凯于1901年在山东发布了《保教简明章程》。章程共10条，其中四条是对地方上不发生反对传教士和教堂的官员给奖，否则受罚的办法，如：“凡有境内教堂教士，责成该文武地方官员随时妥为照料保护，倘有焚抢扰害重案，除撤任留辑外，定即遵旨从严惩办”，“凡有境内教堂教士，各该地方官、各防营员弁认真照料保护，一年以内相安无事者，各记大功三次，三年以内相安无事者，汇案给奖”。^⑮因此，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比以前更加趾高气扬了。20世纪开始，天主教的发展大大超过了19世纪下半叶。首先，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的教堂，都用中国的赔款（庚子赔款和地方赔款）重新造了起来，并增加了许多新教堂，同时更多的外国男女传教士来到中国，更多的天主教学校、医院、孤儿院等开办了起来，全国各地教徒人数骤增。据教会统计材料，1889年中国天主教徒有542664人，到了1909年增加到1210054人。^⑯

中国神父、修女及其传教方法

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也曾企图培养中国神父作他们的助手，但那时候他们能够培养中国神父的条件十分有限。明末，只有中国教徒，没有中国神父。清初，中国神父屈指可数。雍正禁教后100多年间，虽然在北京任职钦天监的传教士和从澳门潜入的传教士通过多种方法培养中国神父，但人数也极少，

且和潜藏的传教士一样，只能在暗中传教。鸦片战争后，情况迥异。外国传教士正式开办了培养中国神父的修道院。如南格禄等到上海后，即于1843年开办了一个修道院。又如孟振生从南堂移居北堂后，把原在安家庄的秘密修道院也迁到了北堂。从1853年起，中国天主教开始有了从这些修道院培养出来的中国神父。这些中国神父，一般都生长于虔诚的教徒家庭，入修道院学习拉丁文，又学习天主教神哲学、教律学和其他作为一个神父必须具备的宗教知识，时间约十年。这样一个学习过程，也就是欧洲一些国家天主教神父的学习过程。据教会统计材料，1889年中国神父人数是“329人”，1909年增至“631人”。④“自1900年至1910年，平均年增20人”；“自1920年至1930年，年增45人”；1930年中国神父的人数已是“1433人”。⑤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神父在天主教知识方面的造诣，不下于西方国家的神父。举两个例子：一、19世纪末，中国天主教内流传的中文教义书，主要是一些重印的明末清初传教士写的书，如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艾儒略的《万物真原》、庞迪我的《七克》、南怀仁的《教要序论》等。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教徒的主要宗教读物已是中国神父写的教义著作和文章了。以上海天主教为例，《圣心报》、《圣教杂志》等教会刊物上的教义文章，教会学校中的教义课本如《高中教理讲义》等作者都是中国神父。二、《圣经》的中译本也在本世纪上半叶由中国神父逐渐完成。首先，李问渔“撰新经译义四卷，宗徒大事录一卷”，肖若瑟“译圣经四卷，发行于张家庄”，马相伯将拉丁文《新史合编》译出，“复引伸其义，颜名曰新史合编直讲”。⑥以后，肖若瑟“复译诸宗徒书信及若望默照经，与前译新经合订之，名曰新经全集”。⑦40年代后几年，北京天主教“上智编译馆”的中国神父着手进行了《古经》中的《梅瑟五书》、

《圣咏集》、《智慧书》等中译本的出版工作。中国神父自己撰写天主教教义书和翻译《圣经》表明，他们研究天主教经典，已可不通过外国传教士的中介。

天主教内要成为神父，须入修道院；要成为修女，则须入修女院。一些外国女修会的修女来到中国后，除了在她们的女修会内吸收中国修女外，还办了一些中国女修会。如仁爱会、拯亡会、方济各会等女修会的修女来到上海后，都各自设立了会院，并在会院内设立初学院。要成为这些修会的修女的中国女教徒，分别入这些修会的初学院。除了这些外国女修会的中国修女外，还有中国女修会的中国修女。在中国的各种名称的外国女修会最多时约有50个^①，各种名称的中国女修会也有几十个^②。19世纪下半叶，中国修女的人数比中国神父少，20世纪上半叶则超过中国神父的人数。1901年，中国修女的人数“共350人”，1930年，“有2835人”。^③中国修女有的读过小学，有的读过中学。她们既在学生时代学过教义，又在女修道院进一步学习教义。和神父相比，她们几乎只差没有学过拉丁文和没有正式学过天主教神哲学，对天主教的许多知识不下于神父。

天主教神父、修女在成为神父、修女时都须宣誓“守贞”。神父无妻，修女无夫，他们都无子女，工作、生活等一般都由教会安排。有了中国神父、修女后，领导权在外国传教士手中的教会把他们中的大部分分派至各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当时外国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常用的方法之一，是在天主堂内开“保守班”。中国神父、修女照搬外国传教士的这个方法。前上海天主教会的主要刊物《圣心报》1908年第10期上登载的徐州教务报道一则，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神父、修女通过“保守班”发展教徒的实例。该报道说：“本省徐州府八县一州，十数年前教友无人，今领洗者23037名，保守者33974名，男学共370，

女学共124。凡保守者先在本庄学堂内，学会十端要经，并粗知要理，然后到各司铎所设之保守学内，另行学习。冬时男女各两班。春天同。每班约20人。各将所学经言，所听道理，男者日日到司铎前，女者到献堂会先生（按：即献堂会修女）前，背诵复讲，不稍宽假，与小學生无异。学习时，在堂偕老教友并学生等同念经文。……保守者约习20天左右。择其优者，先领洗，次日领圣体而散。余则暂留，必待其功课有所把握，乃与之付洗。一班去，一班来。本年只算大人领洗，有2956人之多。”这则报道中有一点没有说，就是当时这样的“保守班”是免费供应膳食的。“保守班”免费供应膳食，是天主教过去有“吃教”之称的原因之一。

教会学校中的传教活动

办学校，对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是根本不可能的。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所到之处设立的教堂旁边，附设小学，在有的城市中开办了一些中学。本世纪初，在上海开始有了第一所天主教大学——震旦大学。20年代，又开办了两所天主教大学，即北京的辅仁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30年代，上海又有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天主教教会学校，不但收教徒学生，也收非教徒学生，不过小学和中学，男女不同校，女学则兼收女生。外国传教士办学校的目的：一是培养为在华外国势力和教会的各机构需要聘用的中国知识分子；二是传布天主教。这些教会学校，都由神父、修士、修女管理。“他们在小学和中学的教学中设置宗教课程。天主教教会大学的课程中不设宗教课，但在课程之外有宣讲宗教的活动。教徒学生必须学习宗教课程。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中的虔诚教徒，一般就是在学生时代学习教义较用功的教徒，因此他们也具有天主教的许

多知识。非教徒学生虽不学习宗教课程，但学校中的神父、修士、修女非常注意对他们施加宗教影响。在小学内，他们对非教徒学生施加宗教影响的方法，是吸引学生参加宗教歌唱等活动，使他们逐渐对宗教产生兴趣，然后对他们讲解教义，使他们在对宗教产生兴趣的基础上进而对学习教义产生兴趣，并产生入教要求。^④但是教会小学不吸收非教徒学生入教，因为学生年龄尚小，受家长保护。教会小学中的神父、修士、修女看到有入教要求的非教徒学生，就设法使他们读完小学后入教会中学读书。教会中学的神父、修士、修女对非教徒学生施加宗教影响的方法，主要是吸引他们听神父讲解教义。对教会大学中的非教徒学生，则吸引他们研究哲学。天主教大学中许多教授是外国传教士。有些非教徒学生和这些学有专长的传教士朝夕相处，产生较深厚的师生友谊。他们向传教士从哲理上探讨天主教教义后，接受天主教世界观，要求入教，和明末清初有的知识分子所以接受天主教信仰，原因是相仿的。这些大学中的非教徒学生入教，当时教会刊物上几乎都加以报道。有的教会史书中并记录了部分统计数字。以辅仁大学为例，罗光主编的《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中有两个数字：一、在1937年至1945年间，“计有83名，其中包括10位讲师和助教领受了圣洗”，二、在1945年至1949年间，又有“95位学者受洗”。中国天主教高级知识分子教徒，世代教徒家庭出身的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在天主教大学读书或教书时从非教徒成为教徒的知识分子，个别的是原基督教新教徒改信天主教的分子，如1946年任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公使”的吴经熊就是。

天主教孤儿院、施诊所等和发展教徒的关系

开办孤儿院、施诊所等，也是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徒人数增

加的一个原因。外国传教士把他们开办的育婴堂、孤儿院称作“慈善事业”。其实，送进育婴堂的婴孩，在被付洗后，绝大多数都死亡。教会育婴堂死亡率高的事实，有的教会人士也不能不承认。如专门刊载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书信、文章的《中国通讯》1903年4月号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婴孩的死亡率是骇人听闻的”。为了推卸责任，育婴堂的主办人制造了一个所谓“只救灵魂、不救肉身”的宗教借口。这是徒劳的！他们没有给最起码的营养、照顾和医疗，致使许多本来可以养大的婴孩也死亡了，这责任他们是推卸不了的。

传教士办的育婴堂，一般是孤儿院的一部分。育婴堂内婴孩大部分死亡，很小一部分侥幸长大。因此孤儿院的儿童，从育婴堂长大的也是一小部分。在旧社会，有的父母由于贫穷把几岁的孩子送进孤儿院，女孩送进女孤儿院，男孩送进男孤儿院。送进孤儿院的儿童中，如父母是教徒，他们已是受过洗礼的小教徒，父母是非教徒，则在送进孤儿院后受洗礼，也成了小教徒。这些孤儿长大后，结婚成家，就成了孤儿院出身的教徒。1930年天主教孤儿院有“375所”^②。天主教徒中，孤儿院出身的教徒有相当比重。如闻名全国的上海徐家汇天主堂的教徒中，圣母院孤儿院的孤女，土山湾孤儿院的孤男，结婚后生子育女，居住在五埭头和堂街西等处的约占四分之一。

传教士开办的有的教会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病人，特别是他们开办的施诊所，更为不少在旧社会无钱就医的贫苦病者，不分教徒和非教徒，施诊给药，治愈了不少人的疾病。有的非教徒病者，一方面亲身受到教会施诊所的好处，同时又受到天主教宣传的影响，信了天主教。如《圣教杂志》1932年第2期的一则报道说，在上海杨树浦一隅，“工人患病者，以

窘于资，无处求医”，方济各会修女“施诊给药”，“每日踵门求治者，有五六百人之多”，虹口天主堂“有神父前往讲道”，非教徒因而信教的“为数不鲜”。

“打官司教”、“娘子教”和“传代教”

教徒们自己也承认的“打官司教”和“娘子教”，也是教徒人数增加的原因。“打官司教”在明末清初是不可能设想的。利玛窦到中国后在公堂上对地方官员双膝下跪，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传教士在中国会比地方官员更神气。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神气起来了。1899年清政府批准的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数条》中第一条规定：“主教其品位与督抚相同，应准其请见总督”；“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铎准请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④。可见，19世纪末，传教士已和中国地方官员平起平坐。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传教士更是飞扬跋扈，一张名片，地方官不敢不买帐。他们不分是非曲直，为教徒包打官司。有的非教徒，为了求传教士包打官司，就入教。“打官司教”就是靠传教士打赢官司而入教的教徒。松江一带民间谚语有：“不打官司不入教”，指的就是这一种入教的教徒。不过，这种教徒在中国天主教徒中的比重是极小的。他们打赢官司，有的本来不是理屈，有的是理屈。对那种明明理屈而靠外国传教士打赢官司，正直的天主教徒也是不赞成的。

天主教会在教徒婚姻问题上有一条规定：教徒不可与非教徒结婚。一个非教徒男子欲娶教徒女子为妻，或者一个非教徒女子愿嫁给教徒男子，都必须入教，然后才可结婚。“娘子教”就是指为娶教徒女子而入教的教徒。

一个家庭有了第1代天主教徒后，其后代也就成为教徒，

这叫做“传代教”。天主教会规定，父母信教，子女生下后，在3至8天内即须受洗礼，成为小教徒。20世纪10~20年代后，中国天主教徒人数的增加，主要靠“传代教”。四十年代后几年，中国天主教徒号称300万，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家庭信教而从小受洗入教的教徒。

注 释

- ①肖若瑟《圣教史略》第2册第241页。
- ②《教务纪略》卷首第3张。
- ③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47页。
- ④同上书，第55页。
- ⑤同上书，第84页。
- ⑥《教务纪略》卷首第3张。
- ⑦《天津条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7页。
- ⑧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82页。
- ⑨《燕京开教略》下篇第28张。
- ⑩《八里桥伯爵孟托班将军回忆录》(Souvenir du général de Montauban Comte Palikao)第367页。
- ⑪《北京传教史》(A. Thomas,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下册第393页。
- ⑫同上书，第399页。
- ⑬拉丁原文：Domine salvum fac Imperatorem nostrum Napoleonem.
- ⑭赵雅博《以往传教方法之检讨》，1983年5月6日《公教报》(香港)。
- ⑮1901年3月29日《汇报》。
- ⑯茅承勋《1889年至1909年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1911年1月号。
- ⑰《远东近十年圣教进步表》，《圣教杂志》1912年第2期。

⑩丁汝仁《全国教务情形之回顾》，《圣教杂志》1931年第5期。

⑪《华译圣经考》，《圣教杂志》1923年第8期。

⑫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各地的外国女修会有：仁爱会、圣保禄雅脱修女会、加诺撒仁爱修女会、拯亡会、包底欧主顾修女会、方济玛丽传教修女会、多明我修女会、加尔默略圣衣修女会、安老会、圣神婢女会、^⑬加拿大圣母始孕无玷会、玛利诺外方传教修女会、山林圣玛利主顾会、包勒杜玛利若瑟修女会、勒乃维尔天神母后会、罗马圣乌苏拉联合会、圣若瑟小姊妹会、南林劳来笃修女会、母佑会、奥斯定传教修院、加拿大宝血会、奥斯定第三会教学修女会、君主仁爱会、方济医院服务修女会、圣高隆庞传教修女会、美国比资圣若瑟修女会、圣母赎虏会传教修女会、加罗萨圣母会、耶稣圣心修女会、救世主修女会、巴尔玛乌苏拉圣心修女会、卢森堡方济第三会仁爱会、奥斯定重整会修女会、永久朝拜方济修女会、北美仁爱修女会、圣十字架修女会、圣方济沙肋诺修女会、奈莫圣母修女会、圣心传教修女会、赎罪仁爱修女会、美国本笃修女会、嘉布遣第三会圣家会、门斯得圣母始孕无玷修女会、耶稣孝女会、善牧会、忧苦之慰修女会、圣体修女会、圣若瑟修女会、圣母无原罪灰衣修女会等。

⑬中国修女会有：献堂会、圣母圣心修女会、圣母无原罪修女会、圣妇亚纳修女会、圣家修女会、圣母善导修女会、圣道贞女会、圣心女儿会、圣若瑟女儿会、圣方济各圣心会、圣妇依撒伯尔修女会、圣女婴孩耶稣德肋撒会、圣若瑟善功会、宝血会、圣母传教会、圣心婢女会、圣三传道会、显主会等。

⑭丁汝仁《全国教务情形之回顾》，《圣教杂志》1931年第5期。

⑮同上。

⑯黄伯禄《正教奉传》第169张。

四、外国势力的控制

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经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极不正常的状况。旧中国时代，中国天主教虽然有了近300万教徒、数千名中国神父和中国修女，但教会的领导权却一直在国外主教手里，教会和教务都受他们的支配。这些外国主教把中国教徒看成是他们的“教民”，要中国教徒完全服从他们。中国天主教成了外国势力支配的宗教。要认识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如实地指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主教在教会中的地位

天主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主教管理主教区的制度。

天主教内有两种人：一种是在俗的教徒，一种是出家的修道人。在出家的修道人中又有神父和从神父中产生的主教。天主教称主教、神父有“神权”，是在俗教徒的“神长”，在俗教徒当受他们的管理。为实施这种管理，天主教有地方性的主教区的设立。主教区的最高管理人就是主教。主教区下面是教堂区。教堂区是教会的基层单位。教堂区的管理人是主教委派的本堂神父。本堂神父管理自己教堂区的教徒。每一个天主教徒都有自己所属的教堂区。这样，主教就能通过各本堂神父管理整个主教区的教徒。

天主教是从欧洲传入我国的。在欧洲，主教管理主教区内的神父、教徒，是普遍现象。主教在教会中有这样的地位，因

此欧洲历史上对主教的任命问题，国王和教皇之间曾发生冲突。国王要他所要的人做主教，教皇也要他所要的人做主教。其实，教皇也是主教，不过他是罗马的主教。起初罗马主教和别地方的主教，地位相仿。天主教教会人士写的教会史如海脱令《天主教史》中也这样写着，“在最初几世纪”，“‘教宗’（按：即教皇）二字也不是一个专用名词”，“人们有对也称各种圣职人员为‘教宗’。”^①后来由于政治和历史等原因，罗马主教的地位日高，权势日甚，超过了其他许多地方的主教，教皇成了罗马主教的专称。因此历史上究竟从那个时候起有后来所称的罗马教皇是难以认定的。8世纪，由于法兰克王丕平的“赠礼”，教皇拥有了史家一般称之为“教皇国”的领土。有了“教皇国”后，教皇在“教皇国”内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又把其教权统治伸向欧洲各国。教皇把教权统治伸向欧洲各国，主要就是规定主教“必须由教皇任命”。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垄断主教的人选，“任命”忠于他的人做主教。对此，有的国王竭力抵制，因为他们也要忠于自己的人做主教。罗马教皇与欧洲国王在这方面的争夺曾十分激烈。随着历史的发展，教皇的权势下降。在任命主教问题上，所谓“必须由教皇任命”在欧洲早已大致演变为实际上由政府决定或同意后再由教皇形式上“任命”而已。

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教都是本国人。如法国的主教都是法国人。但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就不是这样。从明末至解放前的近四百年间，中国天主教内的绝大多数主教却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外国人充当中国主教，是外国势力控制中国天主教的反映。

外国人充当中国主教的历史

葡萄牙占领澳门后，教皇格里高利十三适应葡王的需要；

于1576年宣布成立澳门主教区。澳门主教区属果阿总主教区。果阿总主教区原是果阿主教区。果阿主教区是葡萄牙于1510年占领果阿后，形式上由教皇宣布建立的主教区。果阿主教区和澳门主教区的主教，都是葡王决定的葡国人。澳门主教区建立时，教皇竟把中国、日本、越南都划入澳门主教区。^①当罗明坚、利玛窦进入内地时，澳门主教区的主教是葡萄牙耶稣会士贾南罗（Corneiro）。但那时他根本不可能以主教身份进入内地。

明末，内地传教士中没有主教。17世纪80年代，有主教头衔的传教士进入内地。当时葡萄牙已衰落。罗马教皇为了从支持葡萄牙转而支持法国对中国派遣传教士，宣布在中国建立不受制于葡萄牙而受传信部管理的所谓“宗座代牧区”（即主教区），并“任命”了若干“宗座代牧”（即主教），其中陆方济进入了内地。陆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始人。1683年8月12日他“初入中国，带布神父两位至台湾沙岗登陆”，“在台居留五个月”。次年1月14日，陆等“由台湾乘船赴厦门”，“登陆后赴福州等地”。10月29日，他“病逝于福州穆永”。^②教皇在中国设立“宗座代牧区”和“任命”陆方济等“宗座代牧”是企图把教权统治伸向中国。陆去世后，和他一起来中国的阎当于1688年继承他做“福建主教”。此人是最惹怒康熙的、反对“利玛窦的规矩”的传教士之一。1706年，康熙下令把他驱逐了出去。

教皇在中国建立“宗座代牧区”后，由于葡萄牙反对，又出尔反尔，建立南京、北京两主教区。“1690年罗马宗座与葡国政府同意拟定澳门、南京、北京三主教座由葡国政府建立而维持。”^③南京、北京两主教区的主教是罗文藻和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伊大仁。前者在任南京主教区主教那年去世，后者任北京主教区主教后常住山东临清。1721年他在临清去世时，康熙

为了不许教皇干涉中国内政，已开始采取禁止天主教的政策。

雍正禁教后的100多年间，潜藏的传教士中有数名主教。他们中有的受到清政府严厉制裁，有的长期潜藏着。如南怀仁（Laimbeckhoven）^④潜藏在浦东汤家巷等处教徒间达27年之久。供职钦天监的传教士中也有主教，如毕学源。但他们都不可能公开主教身份，而只能在躲过清廷和地方官员耳目的条件下，进行很有限的秘密传教活动。

鸦片战争后，当外国传教士又不断地来到中国之际，“教皇国”在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中领土尽失。1870年9月，在保护罗马的法国军队撤离后，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教皇庇护第九“在古城墙上悬挂白旗，表示投降”^⑤。“教皇国”成为历史名词，教皇退居梵蒂冈。对教皇来说，这是继宗教改革运动后的又一沉重打击。同时，欧洲一些国家的天主教会的教权统治，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内反教权力量的冲击。和中世纪相比，教皇和欧洲天主教会的教权统治已江河日下。但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失去了独立和主权的完整，教皇摆出唯我独尊的架势，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又一个主教区，“任命”了一个又一个由各修会和外方传教会决定的外国主教，这就形成了外国势力控制中国天主教的局面。

一百多个外国主教

上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上半叶的100年期间，西方的许多修会，如法国的耶稣会、遣使会，意大利的方济各会，西班牙的多明我会、奥斯定会，德国的圣言会，比利时的圣母圣心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等等都派传教士来到中国。此外，还有荷兰、爱尔兰、加拿大的一些修会和美国玛利诺会等派来的传教士。“他们的人数，1900年，有886；1910年，有1391；1920

年，有1364；1930年，有2068。”^④ 随着派遣传教士来中国的外国修会和外方传教会越来越多，教皇设立的主教区和“任命”的属于这些修会和外方传教会的外国主教也越来越多。他们是外国人，但却都怡然自得地称“中国主教”。本世纪20年代初，教皇庇护十一^⑤派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⑥来中国任“宗座驻华代表”^⑦时，中国天主教徒有2056338人^⑧，中国神父有963人^⑨，但没有一个主教是中国人。1924年，教皇庇护十一“敕令”刚恒毅召开“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⑩。参加这个会议的49个“中国主教”中，47个是法、意、西、荷、比、德等国人，只有2个称“监牧”的主教是中国人。这2个中国主教，一个是会议前5个月，另一个是会议前10个月，由梵蒂冈教廷匆匆宣布“任命”的。至1926年才又增加了4个称“代牧”的中国人主教，上述两“监牧”也升为“代牧”。这一年，他们同在罗马受“祝圣”。这6个中国人主教所管理的都是不重要的主教区。

据1934年《圣教杂志》第1期至第12期连续刊载的《全国各教区简史》，各外国修会和传教会传教士中产生的外国主教管辖的以地名命名的主教区如下：1. 主教是法国耶稣会会士的：献县、南京（包括上海）；2. 是法国遣使会会士的：北京、天津、南昌、余江、赣州、宁波、杭州；3. 是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的：沈阳、吉林、成都、重庆、打箭炉、叙州、宁远、广州、汕头、北海、云南、贵阳、南宁；4. 是法国方济各会会士的：烟台；5. 是法国圣母二心会会士的：海南岛；6. 是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的：益都、威海卫、太原、榆次、西安、三原、同州、汉口、老河口、黄州、长沙、衡州；7. 是米兰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的：汉中、南阳、卫辉、开封、香港；8. 是意大利耶稣会会士的：蚌埠；9. 是意大利慈幼

会会士的：韶州；10. 是意大利遣使会会士的：吉安；11. 是意大利方济各特规会会士的：兴安；12. 是意大利印五伤会会士的：易县；13. 是巴尔玛方济各沙勿略会会士的：郑州、洛阳；14. 是德国圣言会会士的：兖州、青岛、兰州、信阳；15. 是德国方济各会会士的：济南；16. 是德国本笃会会士的：依赖、延吉；17. 是德国多明我会会士的：汀州；18. 是德国嘉布遣会会士的：佳木斯、平凉；19. 是德国救世主会会士的：邵武；20. 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会士的：西湾子、热河、绥远、宁夏；21. 是比利时方济各会会士的：宜昌；22. 是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的：福州、厦门、福宁；23. 是西班牙耶稣会会士的：芜湖、安庆；24. 是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的：归德、常德、澧州、岳州；25. 是西班牙方济各会会士的：延安；26. 是美国玛利诺会传教士的：抚顺、江门、嘉应；27. 是美国方济各会会士的：桐村、武昌；28. 是美国苦难会会士的：辰州；29. 是美国多明我会会士的：建宁；30. 是荷兰遣使会会士的：正定、永平；31. 是荷兰方济各会会士的：潞安、朔州；32. 是荷兰圣母圣心会会士的：大同；33. 是加拿大耶稣会会士的：徐州；34. 是加拿大桂盘克传教会传教士的：四平街；35. 是加拿大斯加包志勃来斯会会士的：处州；36. 是爱尔兰高龙庞传教会传教士的：汉阳、南城；37. 是瑞士白冷传教会传教士的：齐齐哈尔；38. 是奥国方济各会会士的：永州。主教是中国人的以地名命名的主教区则是：集宁、赤峰、保定、安国、宣化、赵县、永年、临清、阳谷、汾阳、洪洞、周至、凤阳、海门、雅州、万县、南充、蒲圻、台州。

1946年，教皇庇护十二宣布成立所谓中国天主教“圣统制”，但是在20个总主教中17个是外国人，在近140个主教区的主教中110多个是外国人，^②而且仍属于有“殖民部”之称的

“传信部”管理。“圣统制”换汤不换药，对中国天主教徒难道不是一场骗局吗！

中国天主教徒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但外国主教把中国教徒看成是他们的教民，要中国教徒完全服从他们。他们说是，中国教徒就不能说非。一件事情，他们说可以做，中国教徒才可以做；说不可以做，就不可以做。总之，政治立场和是非好坏，都要以他们所说的为标准。旧中国时代，外国主教管理的主教区，无异是一个“独立王国”。当时，中国各地天主教的一个普遍现象是：那个外国主教、神父所在的天主堂，就挂那个外国的国旗。解放前，中国天主教是外国势力控制的宗教；这是洞若观火的历史事实。

中国教徒处于无权和受压迫的地位

天主教为外国势力所控制，并被利用为侵略中国的工具，那末又如何看待中国天主教徒呢？他们是不是“二毛子”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天主教徒中确有人认贼作父，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这种教徒是“二毛子”，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但他们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教徒（包括中国神父），并不是“二毛子”，他们在教内处于无权和受压迫的地位。不妨看一下近百年来中国天主教徒的结构：

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重来中国时，在明末清初传教士发展过教徒的地方，有些地方已没有教徒，有些地方还有着保持天主教信仰的教徒，他们大多是农民和渔民，过着贫困的生活。外国传教士重来中国后，这些教徒就是中国天主教中所称的“世代老教徒”，是近百年来中国天主教徒的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各地发展的新教徒中，大多数也

是一些穷人。他们中有些人从教会得到一些施舍，但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从传教士办的男女孤儿院中长大的男女教徒，在近百年来中国天主教徒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结婚成家离开孤儿院后，一般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他们的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一般都读不起书，长大后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

近百年来中国天主教中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经过雍正禁教后100多年，官员中早已没有天主教徒。有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中也没有天主教徒。教徒中还可以说有一定的文化的，主要是潜藏的外国传教士通过秘密方法培养的中国神父。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重来中国时，这样的中国神父约80人左右。^③ 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遣使会传教士和圣母小昆仲会^④ 修士等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开办的学校和修道院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的成为神父，有的辅助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神父的传教活动，有的在一些外国机构中任翻译等。本世纪上半叶，各地天主教会男女中学共有200多所，又有上海震旦、北京辅仁、天津工商三所教会大学。从这些教会学校中培养出来的教徒知识分子，知识面较宽，且有科技、医学等方面的专长。他们中不少人在教会医院工作，但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病人。又有不少人在教会学校中任教，主要也是向青年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

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中到外国留过学的，一部分是曾去罗马传信部大学、耶稣会额我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读哲学、教律学、神学等等的中国神父，一部分是曾留学法、比等国的教徒。他们的人数约数百人。这部分人中的情况不一，但多数也是有民族意识的；其中有的在解放后对推进天主教爱国运动

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天主教徒中有经济实力的人物，始自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其中较闻名的，如上海的朱志尧和陆伯鸿，他们一个以办新造船厂，一个以办华商电气公司等而跻身于“实业界”行列。他们和天主教会，和法租界当局在政治、经济上有一定的联系。其他教徒工商业者，一般资本不大。

各地农村中的地主和富农教徒，虽然在中国天主教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他们一般都是当地天主教的台柱。这些人的利益和外国势力控制的教会是一致的。

可见，中国天主教徒中属于劳动群众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占大多数。这些教徒在教会内处于无权和受压迫的地位。举一个例子：在上海徐家汇的一些天主教会机构内谋生的普通教徒，一般不懂法语，但有一句话他们都知道，就是：Allez-Vous en!（即“滚蛋！”）原来在这些教会机构内，外国传教士只要对一个教徒感到不称心，他就会叫你“Allez-Vous en!”为了生活，他们一般常小心翼翼；对外国传教士毕恭毕敬，不敢有所冒犯，但内心是有不平和不满的。不能把这些教徒和“二毛子”划等号。

注 释

①海脱令著、王维贤译：《天主教史》上册第49～50页。

②包万才《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大事录》，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133页。

③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28页。

④南怀仁，奥国人。与康熙时主持钦天监的南怀仁，中国姓名相同。1760年潜入江南，1787年在汤家巷（属上海南汇县）去世。

⑤海脱令著 王维贤译：《天主教史》下册第513页。

⑥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96页。

①刚恒毅，意大利人，1876年生。1921年受“祝圣”为主教。1922年9月12日由威尼斯乘船来华，11月8日抵香港，始宣布已由教皇庇护十一委任为“宗座驻华代表”。1923年1月抵汉口，7月移居北京。五年后购道兹府为“宗座驻华代表公署”。1932年回意大利。1958年去世。

②梵蒂冈向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遣的使节称大使或公使，向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遣的代表称“宗座代表”。

③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154页。

④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81页。

⑤1924年5月16日至8月12日在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和洋泾浜天主堂举行。

⑥1946年4月11日，教皇庇护十二“颁发”所谓“成立中国教会圣统体制诏书”，成立“20个总主教区”及每个总主教区“所隶属的各个主教区”，这些主教区和主教姓名及国籍如下：

绥远穆清海（比）、宁夏王守礼（比）、西湾子石德懋（比）、集宁樊恒安（华）、沈阳（缺）、抚顺林化东（美）、热河南阜民（比）、吉林高德意（法）、四平街石俊声（加）、延吉白化东（德）、赤峰赵庆化（华）、佳木斯兴光启（意）、林东赵玉明（加）、齐齐哈尔胡干普（瑞士）、哈尔滨祁高德（国籍不详）、北平田耕莘（华）、安国王增年（华）、赵县张弼德（华）、景县凌安澜（奥地利）、正定陈启明（华）、顺德葛乐才（波兰）、献县赵振声（华）、宣化王振仁（华）、保定张弼德（华）、天津文贵宾（法）、永年崔守恂（华）、永平刘士杰（法）、大名查宗夏（匈牙利）、易县马迪儒（意）、济南杨恩赉（德）、烟台杜坤安（加）、周村杨光被（美）、沂县万宾来（德）、曹县何方济（德）、青岛（缺）、阳谷牛惠卿（华）、兖州舒德禄（德）、益都狄嘉略（意）、临清杨恩赉（德）、威海卫路道宜（意）、太原李路加（意）、汾阳刘锦文（华）、潞安康济民（荷）、朔县俞广仁（德）、大同邓维道（荷）、榆次富济才（意）、洪洞韩廷弼（华）、绛县孔昭明（荷）、西安万九楼（意）、凤翔王道南（华）、汉中孟守道（意）、

三原班锡宜(意)、延安易兴化(班)、周至高正一(华)、兴安方(名
 不详,意)、同州穆继文(意)、兰州濮登博(德)、秦州(缺)、平
 凉高金鉴(班)、西宁夏思德(德)、新疆卢斐德(德)、南京于斌(华)、
 海门朱开敏(华)、上海惠济良(法)、徐州邵林歌(美)、安庆梅耿
 光(班)、蚌埠赵信义(意)、芜湖蒲庐(班)、屯溪扶直义(班)、
 开封阳霖(意)、郑州丁玉守(意)、驻马店袁庆平(华)、归德陈明
 理(班)、洛阳巴友仁(意)、南阳南岭梅(意)、信阳张维笃(华)、
 卫辉林栋臣(意)、新乡米干(美)、重庆尚维善(法)、成都骆书雅
 (法)、康定华郎廷(法)、嘉定邓甘霖(华)、宁远包明扬(法)、
 顺庆王文成(华)、万县王泽溥(华)、汉中罗锦章(意)、汉阳高尔
 文(爱尔兰)、宜昌顾学德(意)、圻州佳格理(意)、老河口费乐理
 (意)、施南顾学德(意)、武昌郭时济(美)、蒲圻(缺)、沙市狄
 隆(美)、襄阳易宣化(华)、随县龚成德(爱尔兰)、长沙兰泽民
 (意)、常德王德纯(班)、衡州柏常青(意)、沅陵欧克澜(美)、
 澧州马国珍(班)、宝庆龙博义(匈牙利)、湘潭佳索理(意)、岳州
 高凤翔(班)、永州德志恒(意)、南昌周济世(华)、赣州和若望
 (美)、吉安梅雅宜(意)、南城利伯高(爱尔兰)、余江光一幸(美)、
 杭州梅占魁(法)、宁波戴安德(法)、台州胡若山(华)、丽水杜绝
 蒙(加)、福州赵炳文(班)、厦门茅中砥(班)、福宁赵炳文(班)、
 建瓯谷源真(美)、邵武王峻德(德)、汀州雷斯基(国籍不详)、广
 州巍畅茂(法)、香港恩理觉(意)、嘉应福尔德(美)、江门柏增
 (美)、澳门罗若望(葡)、北海祝福(法)、韶州欧尔额(意)、汕
 头和敬谦(法)、海南德文斌(法)、南宁沈士杰(法)、梧州曹(名
 不详,美)、桂林罗(名不详,美)、贵阳兰士谦(法)、安龙贾禄(法)、
 石阡包美德(德)、昆明德为能(法)、昭通(缺)、大理徐司庆(法)。

⑬台湾天主教会出版的四卷本《天主教史》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
 天主教在中国的情形”一章中称：1842年，“在全国有多少位神父？因
 为只能在地下潜伏工作，所以很少；据估计大概有国籍神父80上下，外
 国传教士在60、60之间。”

④1717年，法国神父尚巴纳（Champanat）在法国创立“圣母小昆仲会”。以“管理中小学校教育事业，栽培青年学生，收容失学儿童”为宗旨。会士称“修士”，“不晋铎品”（即不成为神父）。1893年该会修士开始来华。前上海中法中学、汉口法汉中学、重庆明诚中学和山东烟台的一所教会中学，都是他们管理的教会学校。

本册书“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

五、爱国思想和爱国表现

在我国近代史上天主教徒的爱国思想、爱国表现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部分教徒爱国思想较薄弱；二、有的教徒也在不同程度上克尽爱国天职；三、有的天主教人士有突出的爱国和抗日表现。

爱国思想较薄弱的原因

活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有爱国思想，才可能有爱国行动。天主教传播的思想不是单一的，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从旧中国时代外国传教士向中国教徒传播的思想看，他们传播厌弃现世的思想比较突出，如把现世说成是不可改变的“苦世界”，要教徒“忍受”，等等。的确，在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里，被压迫人民饥寒交迫，过着非人的生活，但这些苦难决不是命定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苦难的阶级根源正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推翻这三座大山，就能消除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创造幸福生活。今天许多天主教徒已从亲身的体验中认识这些道理，但在解放前能认识到这些道理的教徒还不多。当时相当一部分教徒，正是因为遭受着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又认识不到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和消除它的道路，听到传教士关于苦难的说教，相信今世受苦可以换取“后世偿报”，于是对苦难抱忍受态度，甚至把忍受“现世痛苦”看做是“做补赎”、“立功劳”的一种机

遇，而把幸福的希望完全寄于死后“上天堂”。他们对苦难抱忍受态度，怎么会起来反抗阶级压迫呢？

外国传教士散布的崇外亲外思想，在部分教徒中也相当严重。也许有人会问：外国传教士也不是说他们“爱中国”的吗？怎么会要中国教徒爱外国呢？不少外国传教士口头上说“爱中国”，是事实。但口头上说“爱中国”是一回事，行动上是否真爱中国是又一回事。口头上说“爱中国”不等于就是行动上爱中国。请看，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受人欺侮，有那个传教士起来反对过他们的本国对中国的侵略呢？传教士在政治上大都站在侵略中国的他们本国一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有人竟帮助他们本国侵略中国的原因。例如有的传教士充当他们本国侵略军的翻译，向他们提供有利于侵略中国的情报。这难道是爱中国吗？不少传教士振振有词地为他们本国侵略中国作辩护，如把侵略说成是为通商，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等等，他们要中国教徒对他们的本国感恩戴德。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如名闻遐迩的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从前每年7月14日，教堂内外挂满法国国旗，举行庆祝法国国庆的盛大宗教活动，成为那里的教徒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一个教徒，如有崇外亲外思想，他会投袂而起，参加中国人民的反帝行列吗？

传教士对教徒爱国活动的压制

教徒毕竟生活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有些教徒对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苦难也并不麻木。他们看到中国人民起来斗争，内心也感到激动。笔者曾访问过一位现已八十二岁的教会人士。据他回忆，当年鼓舞中国人民反帝斗志的那首“打倒列强”的歌曲，教会学校中的教徒师生也常放喉高唱。但是，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教徒控制甚严，他们最怕的是中国教徒也起

来反帝。教徒中有人响应各界号召，参加爱国集会或游行，他们就用“高压手段”，绝对不准参加。尤其毒辣的是：他们给起来反帝的教徒随意扣上“反对神长”的宗教大罪名，用最严厉的宗教处罚“绝罚”予以惩处。当时一个教徒，如被他们处以“绝罚”，后果很难想像。有些教徒怕教“绝罚”就不敢起来反帝，有些教徒起来了，但在教会内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如1919年6月天津教徒发出《为外交泣告教中人书》后，在中国天主教内有较大影响的教会刊物——《圣教杂志》编者以“公教友^①之热心救国”为题加以报道。报道中赞扬该书“太旨系鼓吹教友，速起救国”^②。事隔一月，《圣教杂志》编者的态度大变，发表“特别声明”^③，指责发出该书的天津教徒“借题发挥，攻击教中神长”。为什么先是赞扬后又变为指责的呢？从“特别声明”中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是因为天津教徒在《为外交泣告教中人书》中公开反对外国在中国有“保教权”，击中了传教士的痛处。于是他们摆出“神长”架势，通过《圣教杂志》编者的“特别声明”，把天津教徒“指斥保护传教之某国”说成是意在“诬蔑神长”，“使教徒起与神长为难”，“或竟背教，或成裂教”，并威胁说，教会对这种印刷品“定有禁止专律”，“印刷、发行、分送及阅看”，“应得神罚^④处分”。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像天津教徒那样，召开“讨论挽救青岛外交等事”的教徒大会，成立天主教“救国团”，加入天津绅商学教四界联合会，向全国各地教徒“发出传单及宣言书”，并到社会上作爱国讲演，是空前的创举。^⑤但由于被加上了“攻击教中神长”的宗教罪名，“应得神罚处分”，天津教徒这一可贵的爱国盛举，以后变得无声无息。在外国势力控制的教会内，中国教徒爱国正气抬不起头有如此之甚者，岂非教徒一大痛心事！

英敛之和马相伯

在中国天主教徒中树立了爱国榜样的，有北京的英敛之和上海的马相伯。

英敛之是满族人，和马相伯是好友。论年岁，马比英长28岁，但在两人书信来往中，马常称英为“大哥”。可见马相伯很尊敬英敛之。据英自述，他是22岁时信天主教的。从他所著的《万松野人言善录》和马相伯为此书所写的序看，他对明末入华传教士写的一些天主教哲理著作进行研究后，认为这些书籍所讲的，“与世间词章、考据、名教、象数诸学，有天渊之别”，是“身心性命之源、诚正修齐之本”，“实在是不错的”，因而信了这个教。

英敛之成为天主教徒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敢于以教徒身份公开揭露外国传教士的劣行。这在当时中国天主教内几乎是独一无二的。1917年6月，英敛之著的《劝学罪言》发表了。其中有些话表明他对外国势力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不正常状况是痛心疾首的。他气愤地写道：“法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法，意德等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意德”，“演出形迹，使其人竟如虎依，使其教竟同罪藪”。又写道：“前岁比国被德残毁后，该国枢机主教某公^⑤，发出勉励国民书一篇，反复譬喻，谆谆以爱祖国为训，至理名言，无论有识无识，莫不感痛。至于我国宣道者，从未闻有提及爱国者，或有之，吾未闻也。岂圣教道理，独于中国教民，当使之爱外国乎，真欲索解人而不得矣。”^⑥这些话，把要中国教徒也爱他们本国的外国传教士的真面目淋漓尽致地刻划了出来。对此，他的好友马相伯大为兴奋，给他写信说：“读所赐《罪言》，尤不胜快慰！快人快语，实快我心！”^⑦但有两种人不高兴：一是外国传教士，对英敛之作出

了“警告”，二是个别只知盲目服从外国传教士的教徒，“劝他要谦逊，要忍耐，要听神长的命，不应指出长上之非。”^④在这些人的“警告”和规劝面前，英敛之毫不动摇。他又发表了一篇《复友人驳〈劝学罪言〉书》，不但对外国传教士的劣行作了进一步的揭露，而且深刻地指出了有些教徒对外国传教士盲目顺从的原因。他写道：“反对学问之事，吾处自上至下，几有一德同风之概，缘居上峰者既非本国人，脑中每横亘一中国野蛮之见，既属野蛮，安有学问之可言，教民视外国神父主教如天神，其所好所恶，皆奉为模范，故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潜移默化。”又写道：“至于国际的凭陵，种族之畛域，党派之攻击，皆牢不可破。其违反诫命，拂逆人情之事，欲毕述之，穷年莫竟。总之此辈所挟持者，唯一势力权位之见，竟有明目张胆向华铎^⑤宣言者，云：‘若无我等，尔辈皆饿死矣。’所以华铎蹙蹙如犍下驹，悵悵如丧家犬，忍气吞声，震慑失措者比比然也。总之绝无公理之可言。谁使吾国不能强盛乎？然则圣教会果有国势盛衰、种族强弱之别乎？此吾所以竟敢以公理为争，而绝不认吾辈生就永当居于奴隶地位也。”^⑥英敛之有着敢于反抗外国势力把持中国天主教和歧视、压迫中国教徒的坚韧不拔精神，有着主张中国天主教应由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自办的强烈愿望。这是他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表现。但那时候，国家处于多难之秋，中国天主教徒是无能力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的。1926年，这位与马相伯齐名的爱国天主教徒带着他未能实现的希望与世长逝，当时年纪还不足60岁。

马相伯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著名的抗日救亡爱国者，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是江苏丹阳人，生于雍正禁教后仍保持天主教信仰的一个世代教徒家庭里。1840年他呱呱坠地时，正是近代中国遭到外来侵略、炎黄子孙被奴役、被欺侮、被蹂

躏的苦难的开始。因为父母都是教徒，他小时就被付洗成了“洗名”为“若瑟”的小教徒。中国天主教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知名度较高的爱国人士中自幼领洗入教的，可算他是第一人。那时耶稣会传教士已重来江南，创立了第一所教会学校——“圣依纳爵公学”，即后来的徐汇中学。1852年，也就是这所教会学校创办的第二年，马相伯才12岁，独自从家乡来到上海，进了这所学校。他从学生时代勤奋地向学有专长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灵德蕊 (Angelus Zottoi) ⑩ 等学习拉丁文、法文、数学、天文学，并学习宗教知识，是他所以成为堪与徐光启齐名的中国天主教徒的重要原因。他在“圣依纳爵公学”整整度过了十年寒窗。接着入耶稣会，又经历了耶稣会规定的要成为一个耶稣会神父须“初学”又须读文哲学和神学的各个阶段，于1870年受祝圣成为神父。成为耶稣会神父后的马相伯，曾先后在宁国、南京、徐州等地度过短暂的传教生涯。1872年至1874年，他主持“圣依纳爵公学”的校务。1875年，他自动离开耶稣会。离开了耶稣会的马相伯，一度投身于洋务运动。他在社会上崭露头角，逐渐有了名声。后来他又“摆脱官场”，重新回到教会。天主教神父须立誓守“独身制”⑪。马离开耶稣会后，娶了妻，生了子，有了家。因此当他要重新回到教会时，必须对违背“独身制”进行宗教忏悔。据说，他作了这一忏悔。重新回到教会后的马相伯，是一个不可再做弥撒的神父⑫。教会安排他住在上海天主教机构——土山湾孤儿院的一座楼上。

1898年，维新派主要人士梁启超，通过法驻华公使毕盛 (Pichon) 转请驻上海的“江南传教区主教”倪怀纶 (Garnier) 授命马相伯在北京开设一编译学堂。倪对这一请求迅速作出了反应。他授权马相伯按照梁启超的意思办。马相伯接受了这任

务，但提出编译学堂要设在上海。毕盛与倪怀纶关于这件事的书信往返是这一年的七、八月间。到了9月，慈禧把光绪软禁起来，维新失败，梁启超去日本。10月，清政府取消开设编译学堂的计划，并由主管教育的官员通过上海法国领事把这决定通知了上海教会当局。1902年末和1903年初，在南洋公学任职的蔡元培开始独自一个人到土山湾马相伯住处跟马学习拉丁文，后来又介绍了20多个南洋公学学生来学习。马相伯的住处容纳不下这些学生，他请求教会予以协助。那时倪怀纶已去世，江南传教区主教是姚宗季（Paris），耶稣会会长是丁绍明（Louail）。他们拨出徐家汇天文台旧址作为校舍，又派南从周（Perrin）和惠济良（Augustin Haouise）两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担任教师。这样马相伯创办成了5年前未创办成的学校。他给这个学校取名“震旦”，寓有对中国的未来寄予无限希望的深意。

震旦学院重学生自治，开办第二年已声誉大起，不少求学心切之士，不远千里而来，学生人数倍增。1905年3月第3学年开始，学生已有132人。学生主张学习英文。南从周企图控制学校的领导权，坚持外语课以法文为主。双方矛盾激化，学生出于义愤，纷纷离校。马相伯也离开震旦，不久另创复旦。

马相伯致力于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日益赢得人们的尊敬。随着年龄日增，他的声望也日重。“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的许多抗日言论^④，在各界人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他已是90多岁高龄的老人，人们尊称他为“爱国老人”。

马相伯敢于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如1936年7月12日《救亡时报》发表他的谈话中有这样的话：“日本只有8000万人，而中国有4万万人，日本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五倍大的中国，碰到只有五分之一的日本侵略，竟不敢出来

抵抗，这叫做‘缩头乌龟’。可是做缩头乌龟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人民要出来抵抗，政府还要压迫呢！”还说：“日本人在天津已经直接压迫人民的爱国运动，我们政府也继续替日本人帮忙 压迫爱国运动，这样的政府，我们没有旁的话可以形容，我们中国政府实在是‘帮凶’。”“中央就好比会长，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锋芒直指在日寇步步进逼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

马相伯和沈钧儒、黄炎培等交往甚密。1935年上海文化界人士组织救国会，马相伯德高望重，被公推为救国会领袖，发出的通电等均由他领衔。接着，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常务委员。沈钧儒和“七君子”中的其他成员开展救亡运动，得之于他的帮助颇大。马相伯在土山湾孤儿院的住房有一个特点，就是和孤儿院的其他部分完全隔开，从底层到第三层有专用的直达电梯上下，因此外人未经主人许可是进不去的。沈钧儒等在被国民党特务追踪监视的日子里，马相伯把自己的会客室，也即饭堂，供他们自由使用，对他们在那里集会起了很好的掩护、支持作用。马相伯积极从事救亡运动的事实表明：他是站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的。

“七七”事变后，马相伯已从上海迁居南京。南京沦陷前，移居桂林。1938年桂林吃紧，又移居昆明。在赴昆途中，因体力不支留居越南谅山。1939年11月4日，他病逝谅山，“临死时还关心着中国战局，弥留之际连连呼着‘消息，消息！’”^⑮

马相伯热爱祖国。面对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他“不辞劳瘁，奔走抗日工作”，“对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进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⑯

他不愧是继明末徐光启之后垂名史册的天主教爱国先驱，是天主教徒学习的光辉榜样！

中国共产党对马相伯先生的评价是很高的。他逝世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曾联名电唁其家属。^⑭解放后，他的灵柩由人民政府自越南迁回上海安葬。他的爱国表率长期来成为鼓舞我国天主教界爱国运动的一面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又隆重地在万国公墓立墓，让人们永远纪念。

注 释

①即天主教徒。天主教自称“公教”，称教徒为“教友”、“公教友”等。

②《圣教杂志》1919年第7期。

③《圣教杂志》1919年第8期。

④指天主教内对教徒的宗教处罚，其中最重的处罚称“绝罚”。

⑤指比利时枢机主教迈尔西爰(Le Mercier)。

⑥英敏之《劝学罪言》第4页。

⑦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第170页。

⑧陈垣《天主教徒英敏之的爱国思想》，《广扬》1951年第2期。

⑨天主教神父又称司铎，铎是司铎的简称。华铎即中国神父。

⑩引自陈垣《天主教徒英敏之的爱国思想》。

⑪ 魏德苾，意国人，1826年6月21日生，1843年入耶稣会，1848年来中国时，年仅22岁。在徐家汇耶稣会住院内学习中文，学习神学。1850年受“祝圣”成为神父，是“圣依纳爵公学”的第一任校长。19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的上海天主教中的知识分子教徒和中国神父，大多是他的学生。他为有志成为神父的中国教徒学习拉丁，用中文撰写《拉丁文规》问世；^⑫又为外国传教士学习中文用拉丁文撰写《中国文学课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这是他在经过30年专心研究中国文学之后写成的巨著。他的这些著作客观上起了交流中西文化的作用。此外，他还写了《真教自证》、《教理简约》等多种天主教中文教

义书。1902年11月9日在徐家汇去世。

⑬基督教产生并有了“神父”、“主教”等称谓的神职人员后，主教也好，神父也好，都是有家室的。从基督教中分出东正教、天主教两大教派后，在东正教内，神父结婚，主教不结婚；天主教内主教、神父都不结婚，且有“独身制”的明文规定。故天主教神父在受“祝圣”时，须立誓“守贞法”，终身不娶。宗教改革运动，从天主教中产生的新教内，主教、牧师都可以结婚。

⑭神父的主要宗教活动是在每天早上做弥撒。神父不可做弥撒，是天主教内的一种宗教处罚。马相伯违反“独身制”，虽经忏悔，但教会仍给予这一处罚。这样的处罚，天主教内称“做补赎”。

⑮马相伯的门人徐景贤编的《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收有马相伯的抗日文章，如《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泣告青年书》、《新年告青年书》、《为抵抗日本第二次进攻华北告国人书》、《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序言》等。方豪编的《马相伯先生文集》收有《国难刍议》、《致冯焕章将军书》等。

⑯余凤《爱国的天主教徒的榜样——记老教育家马相伯的奋斗生涯》，1952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⑰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4月6日短评：《马相伯先生百龄庆典》。

⑱1939年11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唁电全文如下：

“马相伯先生家属礼鉴：马相伯先生于本月4日，遽归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国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庚”

六、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天主教

抗战胜利后中国天主教内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美国势力急剧上升；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追随美国侵华政策，他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黎培里（Riberi）^①和回到南京主教区的于斌等，掀起反共旗帜，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反人民内战。

美国有基督教，又有天主教，但主要是基督教。从抗战前的情况看，中国天主教的一些头面人物和美国的关系还不深。蒋介石是基督教徒。从抗战前的情况看，中国天主教的一些头面人物，如于斌等虽和国民党政府已有一定的联系，但和蒋的关系也还不深。抗战胜利后出现上述现象，原因何在？探讨这个问题，似不能不追溯到稍远一点的历史。

天主教内出现严重反共现象的原因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的头两句话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②这两句话中的“教皇”就是在意大利统一之前拥有“教皇国”领土、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失去“教皇国”领土最后退居梵蒂冈弹丸之地的但仍是世界天主教最高领导人的罗马教皇。

从现象上看，本世纪60年代以来，教皇若望二十三、保禄六世和现任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已不同于他们

的前任。但这里是在回顾过去的历史，必须指出，共产主义诞生后，从良十三到底护十二的几任教皇都是公开反共的。罗马教皇反共的特点，就是利用宗教，以宗教为掩护，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正义”、“公道”的化身。其实他们所维护的是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剥削阶级利益和阶级社会的压迫剥削制度。以教皇为首的“梵蒂冈城国”，在罗马，在意大利，在欧洲，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置正义、公道于不顾，残酷地进行剥削的经济机构。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布，许多国家共产党的诞生，特别是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教皇的反共叫嚣和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良十三的《劳工通谕》（*Reium novarum*）和庇护十一纪念《劳工通谕》四十周年的《四十周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一直是天主教会上层领导的反共纲领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梵蒂冈的对华政策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特别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革命走上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的时候，教皇庇护十一即开始把赌注押在背叛革命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身上。1928年8月1日，他发出“八·一通电”^③，率先承认蒋政权。当时，不少天主教人士曾把“八·一”通电看成是庇护十一、“爱”中国的表示。殊不知庇护十一所爱的是受外国侵略、欺侮的旧中国。请看，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庇护十一为了讨好日本，竟不顾道义，甘冒天下之大不讳，采取了承认伪“满洲国”的政策。^④抗战期间，庇护十一、庇护十二同伪“满洲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如庇护十一于1938年9月10日“在冈道尔夫别墅会议厅中特别接见满洲国特使团”^⑤，又于10月20日致函伪满皇帝溥仪，对后者派“特使

团”访梵“表示深切的感谢”④。庇护十一去世后，新教皇庇护十二也于1939年2月12日写信给溥仪，把“众枢机主教”已选他“登上天主教会的最高宝座”的信息“奉闻于皇帝尊前”。⑤同时，教皇派在中国的“第二任宗座代表”蔡宁（Mario Zanin）于1939年3月14日发出命令，要中国教徒对日寇的入侵“不偏左，不偏右”（nec ad dexteram nec ad sinistram declinantes）⑥，这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教徒听任日寇铁蹄的蹂躏。对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庇护十二虽然于1943年接受他派谢寿康任驻梵“公使”，但无对等的行动。十分明显，日本侵占东北和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后，在梵与日、蒋的三角关系中，梵蒂冈眼睛盯着的，是在反共的幌子下企图独霸亚洲，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日本。梵蒂冈爱的是谁，不是很清楚吗？二次大战后，德、意、日法西斯打败了，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力量空前壮大。在这形势下，在反共反人民的共同基础上，梵蒂冈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进一步火热起来。抗战胜利后，中国天主教被拖上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反人民内战的绝路，原因即在此。

梵蒋正式建交

二次大战一结束，梵蒋关系即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于斌“自旧金山会议⑦回国”，去梵蒂冈“谒见”教皇庇护十二。庇护十二亲自写信，交于斌“带呈”蒋介石。于抵重庆，即向蒋“呈上”庇护十二的亲笔信。蒋“甚为感动”，也“亲笔绘写长函”，“复谢”庇护十二。⑧

第二个例子：1945年10月初旬，蔡宁在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各部重要人员，若外交部，教育部，宣传部等，接触频

繁”。当时蒋介石“适在西康视察”，蔡宁“于双十节，拍电前往致敬”。蒋回重庆后，于10月13日“特邀请”蔡到他家里“会晤”。蒋和宋美龄“殷勤款待，并留总主教午餐”，“膳时请总主教诵经祝福”。^⑪

第三个例子：1946年6月10日，田耕莘^⑫“晋谒”蒋介石“致敬”。他代表教皇庇护十二向蒋“面祝胜利”，又“陈述教廷……谕令教友协助政府完成建国大业”，蒋“深为感谢”。^⑬6月12日，田在南京广播，“勉励教友拥护政府”。^⑭

梵蒋交往如此亲密，如此互送秋波，为正式建交迅速铺平了道路。1946年7月4日，梵蒂冈国务院将教皇庇护十二建立“大使馆”的意图通知国民党政府驻梵使馆。后者“立即电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外交部回示：“先接受公使”。^⑮两天后，即7月6日，庇护十二“下谕”^⑯设立驻国民党政府“公使馆”，并于同日任命黎培里为“第一任公使”。接着，国民党政府也于9月10日任命吴经熊^⑰代替谢寿康为驻梵蒂冈“公使”。

1946年12月，黎培里以“公使”身份来到中国后，在中国天主教内他就是教皇的代表。他俨然以中国天主教的最高领导人自居，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号施令。他宣扬在美国援助下，不顾人民的和平愿望，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蒋介石为“很贤明的领袖”^⑱。1947年上半年他在湖南等地“视察”教务时赤裸裸地供认，他“被教廷派驻中国的使命”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完成”所谓“复兴民族的工作”。^⑲

史贝尔曼插手支配中国天主教会

抗战胜利后中国天主教被纳入美国和梵蒂冈对华政策轨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通过纽约总主教史贝尔曼(Francis

Joseph Spellman) 插手支配中国天主教会。

史贝尔曼是二次大战中和战后“美国海陆空三军宗教总监”^① 1945年12月，教皇庇护十二提升三十二个新枢机主教。美国和意大利一样有四人，超过法国和西班牙，这在天主教历史和美国天主教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史贝尔曼就是这四个美国新枢机之一。在这次提升的枢机中，有一个是中国人，即青岛主教区的主教田耕莘。次年2月18日，教皇在梵蒂冈伯多禄大教堂给各新枢机行授予“枢机冠”（也称“四角帽”）的仪式。史贝尔曼对田耕莘去梵蒂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他让田“乘美海军互克非德号舰”^② 离青岛去美国，再自洛杉矶飞纽约，与他会合，然后两人同机飞抵罗马。田领受“枢机冠”后，在欧洲逗留一个多月，又“飞抵纽约”^③，5月27日，“乘美军部飞机”^④ 返回中国。通过这件事，史贝尔曼在中国天主教内一时名声大噪。

史贝尔曼又是“美国天主教福利会战灾救济会之领导人物”^⑤。他手里有大量美国救济物资。历史上，中国天主教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外国的资助。二次大战中，来自欧洲一些国家的资助已几乎断绝，代之而起的是美国。当时重庆等地天主教已开始接受来自美国的钱和物资。二次大战后，史贝尔曼主持的设在纽约的美国天主教福利会“尽量地给中国运来救济品”^⑥。它设在上海的分支机构——“中国天主教福利会”，“要求各重要城市指派代理，负责接头分派救济品”^⑦。史贝尔曼把美国救济物资往中国天主教内送，也是为了施加美国影响，发展美国势力。

葛礼耕和华理柱

黎培里来中国和史贝尔曼插手中国天主教会后，直接指挥

全国各地天主教并对各地天主教起较大影响的机构，一是南京的梵蒂冈“公使馆”，二是设在上海的“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简称“天主教教务协进会”，英文名称是“天主教中央局”（Catholic Central Bureau，简称C.C.B.）。梵蒂冈“公使馆”的“秘书长”是二次大战中美国随军司铎葛礼耕（Martin T. Gilligan）。此人，据说黎培里也要看他三分颜色，故在当时中国天主教内有“小教皇”之称。“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的“秘书长”是美国玛利诺会（即美国外方传教会）的重要人物华理柱（James E. Walsh）。1918年美国玛利诺会第一批四个传教士来到广东，华理柱就是其中之一。1936年他当选“总会长”，回纽约玛利诺会总部。1940年和1941年间，他曾两次到日本，参与最后没有取得成功的旨在承认日本侵华利益的瓜分中国的美日秘密谈判。^④1948年6月，史贝尔曼第二次来中国（第一次是1945年9月到重庆）。他先到上海，后到南京、武汉、北平。国民党自蒋介石以下的一些军政要人和黎培里、于斌、田耕莘等纷纷举行宴会、欢迎茶会、鸡尾酒会，奉为“上宾”。史贝尔曼利用这些场合，大放反共厥词。如他在北平“应何市长欢宴，席间演说，指中共为恶魔化身”^⑤。史贝尔曼这次来中国，带来了作为随员之一的华理柱。他回美后，华理柱留在上海，由梵蒂冈任命为“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秘书长。梵蒂冈驻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和“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的秘书长都是美国人，再加上美国的玛利诺会、遣使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苦难会、圣言会、水筠会、耶稣会的传教士重新来到了太平洋战争前他们所在的主教区和上海、北京的教会中学、大学，表明美国势力后来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天主教。

于斌协助蒋介石打反人民内战

于斌在抗战期间曾离开南京主教区，多次去欧美，宣传抗日，争取外援。抗战胜利后，他反共故态复萌，不遗余力地帮助蒋介石打反人民内战。

于斌是东北人，1901年他生于黑龙江省兰西县。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入吉林天主教修道院。曾至上海震旦大学读书。1924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吉林主教区主教高德惠（Augustin Gaspais）派送他至梵蒂冈传信大学留学。他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晋升神父。他在梵蒂冈开始认识了一些去意大利“考察”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国民党政府驻意使馆的官员。1933年底他回国后，任“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1935年，南京主教区成立，他被任命为“首任国籍主教”。“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是当时中国天主教内主要的教徒团体。在各地有“分会”。1936年4月，于斌以“总监督”身份到上海。在一次他对“上海公教进行会”成员的“训话”中就这样说过：“现在共产党的危险，较前更加严重了。在一般人看来，他们经过了多年的围剿，已到最后挣扎的地步。不知他们自军事失败以后，变更方略，着力于文化之宣传，照我所知，穷乡僻壤，莫不有他们势力之存在，这较军事是更加危险万分了。而且公教的大敌人，便是共产党，我们当致力于反共的宣传，尤盼望以文化宣传的力量来扑此凶焰，下期总部所编之《新北辰》，当出一反共专号也。”^①这一“反共专号”是《新北辰》1936年第3期，里面虽然没有于斌的文章，但应负出版发行责任的是他。《新北辰》的读者主要是天主教知识分子。这期有多篇反共长文的“反共专号”在他们中的流毒是十分严重的。

抗战期间，于斌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但反共的立场丝毫未变。他在重庆等地向教徒“讲道”时，把“无神”、“唯物”作为攻击目标，就是他坚持反共立场的反映。抗战后期，当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在望时，他已在盘算如何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国共产党了。

抗战胜利后，不少在抗战前对中国共产党尚有距离的人士，由于抗战中看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救中国于危亡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走上了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于斌不是没有走上这条道路的客观条件。他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宗教界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分道扬镳，完全出于他顽固的反共立场。他从重庆回到南京后，成了比在重庆时更亲近蒋介石，更靠拢国民党政府，更参与他们的反动政治的政界闻人。抗战期间，他身披主教红袍，胸挂金色十字，从事抗日活动，曾赢得不少人的好评。回到南京后，为了反共，他混迹于政界，许多人包括有的天主教徒，开始对他侧目而视了。于斌以一个天主教主教而有“政客”、“政治和尚”之称，就是从这时候得来的。

于斌协助蒋介石打反人民内战，突出地表现在：一、曾两次去美国乞求美援；二、担任“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总动员会主席团总主席”和“全国慰劳戡乱将士总会副会长”；三、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和他主办的《益世报》、《益世周刊》等报刊上不断发表反共言论；四、几乎走遍全国天主教主要主教区，在许多教会机构和教会学校中作反共讲演；五、充当伪国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主持伪国大会议，是当时各宗教界中支持召开伪国大最卖力的人物。于斌干下这许多坏事，1949年4月的战争罪犯名单中理所当然地有他的名字。

“公教青年报国团”的罪恶活动

抗战胜利后，在梵蒂冈追随美国侵华政策和美国势力的影响下，中国天主教内有些人支持、协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反人民内战到了什么样的严重程度，还可举“公教青年报国团”的例子：

1946年初在北平成立的“公教青年报国团”的总负责人是比利时传教士雷震远(Raymond J. de Jacher)。中国天主教内过去有两个入了中国籍的传教士，雷震远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叫雷鸣远(Vincert Lebbe)，也是比利时人。按照我国一般取名字的习惯，两人好像是兄弟，其实不是。雷鸣远来中国比雷震远早。^①雷鸣远于1927年入了中国籍，教会内有人竭力吹嘘他“爱”中国，因此有些教徒曾对他产生好印象。雷震远入中国籍，又取了和雷鸣远好像是兄弟的名字，同样有些教徒也曾对他产生较好的印象。

雷鸣远、雷震远曾同一些中国修士，为国民党抗日爱国士兵做过救护工作。这一点是不应抹煞的。但他们同时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作对。如雷震远参加雷鸣远为主任的“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在山西、河北、山东及陇海铁路沿线，刺探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情报，自称这是作‘反共前哨的尖兵’”^②。

雷鸣远在抗战期间去世。^③抗战胜利后雷震远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可以说是继承了雷鸣远的衣钵。和“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相仿，“公教青年报国团”直属国民党“军统局”。^④从1946年到1948年，为了扩大组织与活动范围，“公教青年报国团”先后与国民党当时在华北的最高机关“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北平行辕”、

“华北剿匪总部”取得联系，兼受其指挥及经济补助，并以“民众自卫团”和“青年戡乱救民先锋队”的名义，对外作公开活动。1947年7月，蒋介石发布所谓“总动员令”，雷震远又以“民众建国协进会”的名义，招揽华北各地一些神父参加其反革命组织。下面举两个例子以见“公教青年报国团”所进行的罪恶活动的严重性。

第一个例子：1947年7月，“公教青年报国团”潜伏在正定天主堂的指导司铎杨鸿志和主教陈启明、神父陈道生、石家庄天主堂荷兰传教士罗贯之等，共同策划在正定解放区进行武装暴乱。这个计划经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批准之后，杨鸿志即与赵子云（反动地主还乡队队长）将教徒500余人组成武装还乡队，乘虚占领正定县县城。“他们在盘踞正定的40几天中，连续到近郊的三邱村、大林济、朱河等村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被他们杀害的群众在300人以上。”^⑤

第二个例子：1948年8月10日，雷震远和“公教青年报国团”秘书长刁化仁（军统上校特务，天主教徒）根据正定教区神父吴雅阁的报告，以代电密码报国民党“华北总部”、“军统局北平站”和南京“军统局”本部，说中共中央领导人“于前数日偕干部数十人，抵平山县西北80里郭苏镇北6里许之讲里村，住于该村东北角天主堂内，系一幢瓦房”^⑥。又根据教徒米二海的情报，将平山、郭苏镇、讲里村的机关、工厂、仓库的位置绘成地图，报告国民党“华北总部”，指示轰炸目标。国民党军方即根据他们所指示的目标，派遣飞机滥炸平山，“毁民房700余间，炸死炸伤群众30余人”^⑦。

外逃和“撤退”

中国天主教内小部分人把希望寄于国民党反动派，支持、

协助它打反人民内战，但丝毫挽救不了蒋记反动政权覆灭的命运。1948年冬华北各地相继解放后，他们中有外逃条件的人开始向外逃了。逃得最快的就是于斌。据一位知道当时南京天主教会一些内情的神父回忆，这年10月淮海战役的序幕即将拉开的时候，于斌还拿了国民党政府给他的2万美元“路费”，突然乘美国军用飞机去美国乞求美援，但11月回南京时未提及此行结果，住了1个月就逃之夭夭了。据1949年1月30日一期《益世周刊》登载的“法新社梵蒂冈讯”，于斌于1948年12月14日抵梵蒂冈；他向教皇庇护十二“报告中国战乱中在共产党进攻下之天主教情势”后，“乘机赴美”。⑤

直接参与打反人民内战的“公教青年报国团”的魁首雷霆远，在华北各地解放时已逃至南京。他从南京去了美国。⑥他走后，“公教青年报国团”由刁化仁负指挥之责。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近郊时，刁化仁于1948年12月25日召开所谓“非常时期会议”，决定将“公教青年报国团”改组为“地下工作队”，下设1个联络站、4个大队、17个区队、52个分队，由刁自任“总队长”。联络站设有“站长”和“指导司铎”，各大队也设有“队长”和“指导司铎”。他们分别潜伏于华北各地，在解放后继续进行着反革命破坏活动。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已兵临长江，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行将覆灭。面临大陆解放的形势，梵蒂冈下“训令”，补助“特别经费”，⑦史贝尔曼向外围领导人“致电”，“提出请求”，⑧“撤退”了大陆部分教会人员。如1949年2月15日，上海耶稣会初学院、文哲学院修士50人，由法国传教士山宗泰(Beauzé)和中国耶稣会神父王昌祉率领，“搭乘其将军号轮船，启程赴菲律宾”⑨，行时带走了大批教会藏书。⑩

散布共产党“灭教”等谣言

与上述一些人外逃和“撤退”的同时，黎培里和华理柱等则加强“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为在解放后进行破坏作准备。其他一些敌对分子的活动是变本加厉地制造和散布共产党“灭教”等谣言。解放前夕，在上海天主教内散布这种谣言有一个新特点，就是用解放区的“逃难”神父讲解放区“打倒宗教”、“破坏信仰”等方法来散布这种谣言，当时相当一部分教徒由于盲目地听信了这些谣言，以致在宗教生活中不断加念教会要他们诵念的祈求“消灭”共产党的经文。^④此外，上海天主教内一两个被称为“马列主义专家”的神父到处讲演，散布梵蒂冈的反共谰言，如把共产主义说成是“违反天性”、“破坏伦理道德”、“破坏家庭”等等。受到他们毒害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教徒。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国。抗战胜利后，手斌等又积极协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反人民内战。因此，中国天主教在中国人民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解放后，中国天主教内的爱国先进分子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从一个意义上说，正是为了给中国天主教洗刷这个耻辱。

注 释

①黎培里，摩纳哥人。来华前，曾任梵蒂冈驻东非代表。1951年被我国政府驱逐出境后，在香港逗留十三个月。1952年10月去台湾，设立梵驻台“公使馆”。1959年离台去爱尔兰任大使。1962年任梵驻西班牙大使。1967年12月16日去世。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③原文是意大利文，有中、拉、法、英、德、西、葡、荷等译文。“公教教育联合会”把《公教教育公文》第2号编辑成“教宗必约（即

庇护)十一致中华电”专号,载原文和各译文。1929年1月22日刚恒毅在南京“晋謁”蒋介石时,曾“面呈”该电文。

④1934年2月10日,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为梵蒂冈与伪“满洲国”建交事,访问了伪“满洲国”外交大臣谢介石。事后长春天主堂公布《天主公教会发表书》,正式宣布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东北教会从中国天主教会中划出,成为伪“满洲国”天主教会,并宣布高德惠为梵蒂冈教廷驻伪“满洲国”的“宗座代表”。

⑤《梵蒂冈画报》(意文)1938年9月号。

⑥《巴黎外方传教会杂志》(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Missions² Etrangères de Paris)第18年第206期载庇护十一致溥仪的信,译文如下:

“教皇庇护十一致满洲国溥仪皇帝陛下

祝健康,祝昌盛!

在刚才逝去之九月间,我以对其应有之荣耀,接待了陛下所遣特使韩云阶先生阁下。

陛下派遣特使,并给他带来如此友好的信件,我向皇帝陛下表示深切的感谢。皇帝陛下为宗座的繁荣昌盛,向我亲切地表达良好祝愿,我也向陛下表达同样的祝愿。我还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接受了陛下惠赠的礼品精工玉刻香炉。见此内心的象征,曷胜欢欣。烟香含有祈祷的意义,我衷心为贵国以及全人类幸福、和平、繁荣恳切地所作的祈祷上达于天,一如烟香上升于天主台前。

借此良机,对信仰天主教的信友和教会机构在满洲帝国内享有合法自由,谨向陛下表示我诚挚的感谢。由此,陛下亦可深信——在其他方面亦很清楚地显出——关于爱国和尊敬服从国家权力,天主教友是不甘落在人后的。

此外,尊敬的皇帝,我为皇帝陛下和我最亲爱的陛下人民,祈求全能天主赐以繁荣和幸福。

1938年10月20日,我在位的第17年,

发自罗马近郊冈多尔福。”

⑦《巴黎外方传教会杂志》第18年第201期载庇护十二给溥仪的信，译文如下：

“庇护十二世，借登极之机，通过宗座代表高德惠主教，给皇帝陛下写了如下的信：

致满洲国大皇帝溥仪陛下：
尊贵的皇帝陛下：

祝平安，祝昌盛！

众枢机主教已选我登上天主教会的最高宝座，职责所在，谨以奉闻于皇帝尊前。

首先我要向陛下保证：已故前任教皇对于陛下及陛下人民的敬意，和我的意愿是完全吻合的。

怀着对陛下隆情厚意的信任，我对信奉天主教的信众及其正当的机构，在贵广大帝国内，将续享贵政府法律的垂顾与保护，抱有坚定的希望。至于他们，我充分相信，于理应服从合法政权，于热爱祖国，是不会落于人后的。

祈求全能天主降恩惠于陛下，并赐我们相互的关系，常给人以纯粹爱德的印象。

1939年2月12日，我在位的第1年，发自罗马伯多禄殿近侧，庇护十二世。”

⑧《致可敬中国主教》，《公教教育丛刊》(Collectanea Synodalis)1939年5月号。

⑨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故有“旧金山会议”之称。

⑩《当今教宗与蒋主席互通音问》，《圣心报》1945年11月号。

⑪《蒋主席接见宗座驻华代表》，《圣心报》1946年1月号。

⑫田耕莘，山东省阳谷县人，1890年生。圣言会神父。1939年任阳谷主教区主教。1941年调任青岛主教区主教。1945年12月24日，梵蒂冈教廷选了32个新枢机，他是其中之一。次年任北平总主教。1949年去美国。1959年梵蒂冈教廷“任命”他为“台北总主教”，次年抵台湾。1966

年病老辞职。1967年7月24日去世。

⑬《田枢机晋京拜见蒋主席》，《圣心报》1946年7月号。

⑭同上。

⑮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30页。

⑯教皇庇护十二世设立驻国民党政府“公使馆”的谕文如下：

“教宗庇护第十二世，为制定遗典事，夫罗马教宗职掌基督信友之福利，职务繁重且艰；然其尤注意者，乃于列国之中，设立教廷使馆，以收睦教廷与国家之关系。今教廷与中华民国之联系，已臻设立驻华教廷使馆之境，以谋中华公教会之福利。余因思在此距圣座辽远之中国，设立使馆，时已宜矣。故于周详考虑此事之后，由余自动，按照确定之知识与慎重之计虑，以余之宗座全权，颁布此谕，创驻华教廷使馆而建立之。此创立之使馆，余即授以应有之权力，特权，祭典，豁免，特规。余确信余之决定，于圣座与中华民国之国交，双方共受其益焉。余故钦定此项谕文，坚定有效，永久保留；常生应有之效力。为教廷驻华使馆，现在及将来，永垂为典；如有反此谕令之举，无论系任何人或任何权利所行，知与不知，俱按此谕判为无效之妄举。凡有相反之律例，俱无碍于此谕之效力。此谕。”（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30~231页。）

⑰吴经熊，浙江鄞县人。1901年生。原系基督教新教教徒。1937年11月6日改入天主教。1936年2月6日去世。

⑱《黎公使致中国各教区领袖公函》，《圣心报》1947年3月号。

⑲《黎公使视察湖南》，《盖世周刊》28卷15期。

⑳《史贝尔曼枢机略传》，《圣心报》1948年7月号。

㉑《田新枢机行踪》，《圣心报》1946年3月号。

㉒《参加荣升枢机典礼归来的薛祖恒先生》，《圣心报》1946年6月号。

㉓《田枢机主教荣归祖国》，《圣心报》1946年7月号。

㉔《史贝尔曼枢机略传》，《圣心报》1948年7月号。

㉕《玛利诺会在中国传教史》，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

集》第264页。

⑳同上。

㉑1940年12月，华理柱与美国邮政部长岛卡等人到日本，与日本陆军省军务局的岩畔大佐、井川忠雄开始作“调整美日邦交”的秘密接洽。接着又与当时日本外务省松冈和军务局长武藤进行秘密会谈。1941年4月以后，华理柱再度到日本，给日本政府与美国驻日大使之间进行秘密联络。同年11月离日本时又进见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深入会谈。从华理柱参与草拟的日美谈判《建议草案》来看，其主要内容是：一、承认伪“满洲国”；二、同意日本侵略军得以驻在中国领土上；三、蒋政权与汪伪政权合作，共同反对中国共产党；四、美国与日本共同决定所谓“门户开放”，确保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如果这个秘密谈判的协议最后成功的话，美国就要迫使蒋介石接受这个灭亡中国的协议。

上述华理柱参与的最后没有成功的美日秘密谈判的事实，前美国国务卿赫尔写的《回忆录》和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写的《日美外交内幕》中都有记述。

㉒《史贝尔曼枢机在我国》，《圣心报》1948年7月号。

㉓据1942年6月7日重庆《益世报》登载的《天主教美国在华传教状况》，美国玛利诺会传教士控制的主教区是：江门、嘉应、梧州、抚顺、桂林，美国苦难会传教士控制的是沅陵主教区，美国方济各会传教士是武昌、周村、沙市三主教区，美国遣使会传教士是余江、赣南两主教区，美国多明我会传教士是建瓯主教区，美国圣言会传教士是新乡主教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传教士有的集中在日军指定的集中地点，有的躲藏在日军难以深入的地区，有的到贵阳、重庆、云南等地。日本投降后，他们都回到了原由他们控制的主教区。此外，美国耶稣会传教士开始控制扬州天主教会。

㉔《上海公教进行会二十五年大事记》，《上海公教进行会银庆纪念册》第249~251页。

㉕雷震远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后的次年，即1931年来中国，时年24岁。雷震远后雷鸣远29年，即1930年来中国，时年25岁。

⑫ <“公教青年报国团”是反动的武装特务组织>，1953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⑬ 1940年3月至4月间，雷鸣远被我八路军拘禁。获释后，去重庆。6月24日病死于歌乐山。死前，他给雷震远留下遗嘱说，共产党是“魔鬼”。

⑭ 沈辟<特务头子郑介民>（见1984年11月3日<团结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郑介民）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⑮ <“公教青年报国团”是反动的武装特务组织>。

⑯ 同上。

⑰ 同上。

⑱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注释313”中说于斌在大陆解放时“去台湾，后去美国”，不确。1949年12月于斌去梵蒂冈，又自梵蒂冈去美国后，经常住在美国，有时去台湾。50年代末，他在台湾创办“辅仁大学”，并由教皇若望二十三任命为该大学的“校长”后，才从纽约移居台湾。他在台湾公开讲演中曾自诩：“要讲反共，我们资格最老。”（1959年3月9日“中央社”台北电）1969年，教皇保禄六世提升他为“枢机主教”，1978年8月16日在梵蒂冈参加保禄六世丧礼期间突然病逝。

⑲ 雷震远去美后，到处作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动宣传。自1954年至1964年，他任南越吴廷艳的“特别顾问”，1960年2月6日在纽约去世。

⑳ <梵蒂冈教廷训令大修院移安全区>，<益世周刊>31卷24期。

㉑ <上海耶稣会神学院五十学生赴菲>，<益世周刊>31卷24期。

㉒ 同上。

㉓ 1983年下半年，香港<公教报>连载诸正琰<台北行>，作者记

述了在台湾“辅仁大学”曾访问1949年从上海去菲律宾，现是台湾耶稣会会长的张春申。张向诸介绍该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时说：“在这专门性的神学图书馆中有三分之一的藏书是由上海运去的，其余则在神学院旅菲期购置。以英德法书籍较多。西文部共36000余册，中文部共12000余册。”据此，他们带出去的上海天主教会藏书有16000余册之多。

④《圣心报》1948年4月号登载的《天主教与共产主义》一文中说：“我们该用心祈祷，恳求天主教脱世人，免受共毒的大祸。教宗教我们特地祈求耶稣圣心，消灭共产主义的毒氛，我们该怎样欣勤热切尽好这本分呢？”

七、解放初的基本状况和变化

中国天主教现已成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这是50年代头几年在党、政府和各界人民大力支持下，中国天主教徒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经过艰巨的斗争得来的。回顾这一历程，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解放初中国天主教内复杂状况举例

解放初中国天主教的状况十分复杂。

首先，梵蒂冈驻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黎培里，在南京解放后，继续留在南京。在新中国，他不过是一个摩纳哥侨民，但他竟仍以“公使”身份，代表梵蒂冈，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号施令，反对新中国。解放前，他不遗余力地支持国民党政权；解放后，他又执行梵蒂冈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教徒的爱国运动。

二次大战中和胜利后，西欧几个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有很大发展，教徒参加进步运动的也不少。梵蒂冈对这形势感到十分害怕。特别是意大利，梵蒂冈就在这个国家里面。它害怕更多的教徒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进步运动，对意大利教徒发出了不能加入或赞助共产党和不能阅读共产党的出版物的命令。^①黎培里不准中国教徒拥护中国共产党和阅读解放后出的书报杂志，所用的名义，就是以梵蒂冈代表的身份，向中国各主教区主教转发梵蒂冈对意大利教徒的那个命

令，然后由这些主教再通过神父用口头方式把命令的主要内容下达到教徒。因此，当时许多教徒并不详细知道命令的全文，而只知道教徒“不能拥护”共产党，“不能看”进步书籍和报纸等。黎培里作为一个外国侨民对中国天主教徒转发梵蒂冈这一禁令，是干涉我国内政，对我国教徒走爱国道路设置了一大障碍。

第二，美籍主教华理柱主持的“天主教教务协进会”成了指挥全国各地天主教追随梵蒂冈反对新中国的中心，成了毒害我国教徒政治思想的大本营。解放前在外国主教神父的严密控制下，中国教徒接触不到爱国进步思想。解放后，中国教徒所处的生活和工作等环境和解放前不同了，许多新事物天天在影响着他们，使他们潜在的爱国思想受到了激励。于是“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内敌视新中国的一帮人，挥舞笔墨，写了许多对新中国影射攻击和散布“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等谬论的小册子，在教徒中大量散发。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教徒受这些小册子的毒害，以致人在新社会，但政治思想和新社会隔离。对祖国的巨大变化反应十分麻木，甚至抵触、厌恶。

第三，外国传教士退居幕后指挥。以上海主教区为例，法国巴黎省耶稣会传教士一直控制着它。①1948年主教惠济良死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姚缙唐（Yve Henry）任代理主教。1949年上海解放后，梵蒂冈教廷任命已在南京解放前夕乘飞机去台湾的原南京主教区神父龚士荣为上海主教区主教，并从上海主教区划分出新的苏州主教区和海州“监牧区”，任命龚品梅为苏州主教区主教。由于在台湾的龚士荣坚不受命，梵蒂冈乃于1950年又任命龚品梅为上海主教区兼苏州主教区的主教。龚品梅任主教后，一些不知内情的教徒天真地以为上海天主教已是中国主教在领导了。其实不然。龚俯首听命于外国传教士。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后面主要有两个外国人直接在操纵着他，一个

是被梵蒂冈任命为海州监牧区的“监牧”后仍住在徐家汇的上海耶稣会会长格寿平(Ferdinand de Laetelle)，另一个是掌握上海天主教经济大权的洋泾浜天主堂“院长”才尔孟(Georgius Germain)。二是龚的家庭是川沙县的地主，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一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耶稣会是一个势力几乎遍及世界各地的修会，组织纪律十分严密。它的总部设在罗马，称“总会”，“总会”的负责人称“总会长”。“总会”下的“省会”和“省会”下的各基层组织，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总会长”。此外，耶稣会还有一个特点，凡“四愿”会士都要宣誓忠于教皇。格寿平既忠于教皇，又受“总会长”的领导。据格寿平后来自己供认，解放后，罗马耶稣会的总会长给了他三条“行动原则”：一、“勇敢地对抗”；二、“不要太乐观”；三、“不要失望”。他并对这三条“行动原则”作了解释：“勇敢地对抗”，就是“争取时间，帮助中国神父和教友，使他们像外籍神父一样对抗人民政府”；“不要太乐观”，就是“不要相信人民政府的话”；“不要失望”意即“未来不可逆料，或许有一天人民政府会垮台或有所变动”。格寿平遵照这三条“行动原则”，把上海天主教会拖上了同党和政府相敌对的绝路，并危害全国天主教。

第四，大陆全部解放前夕，中国天主教内有些人去了海外，另有一些人则“逃解放”逃到了尚未解放的城市，解放后，留在那里。如北京还没有解放时，有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神父“逃解放”来到了北京。又如上海还没有解放时，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神父“逃解放”来到了上海。北京、上海等地本来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神父较多，增加了那些“逃解放”来的，人数就更多了。他们人数更多，他们对解放的态度，就更大地影响着北京、上海等地的教徒。

第五，秘密祝圣中国籍主教。自梵蒂冈教廷于1926年祝圣6个中国籍主教后，至1949年解放时，中国天主教一百几十个主教区中仅约30个主教区的主教是中国人。这约30个中国籍主教中有数人已在大陆即将全部解放时外逃，个别的转入地下。1949年后，梵蒂冈任命的中国籍主教，有的公开祝圣，有的秘密祝圣。采取秘密方式祝圣主教，也是为了使秘密受祝圣的主教可以转入地下。

第六，有些天主堂和教会机构窝藏、包庇逃亡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在教堂和教会机构中找到藏身之所的逃亡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以教徒面目为掩护，混迹在教徒群众中。

第七，利用“圣母军”。天主教有个特点，就是把《圣经》中称为“童贞女”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尊为“圣母”，不但常号召教徒对她行“特别敬礼”，还常创立一些以“圣母”为名的组织，吸引教徒参加。解放前中国天主教内较普遍的以“圣母”为名的组织是“圣母会”，参加者称“圣母会友”。“圣母会友”不同于一般教徒的，主要是更多地参加或鼓励他人参加宗教活动。因此，以“圣母”为名的如“圣母会”等组织给教徒留下的印象是，它是为了增加教徒的虔诚。

黎培里等知道中国教徒对以“圣母”为名的组织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因此当他们面对我国解放的形势，要在中国天主教内建立和发展一个受他们指挥、利用以对付中国人民解放的组织时，就引进了1921年创立于爱尔兰杜柏林的“圣母军”。1948年，黎培里等先在天主教有较深基础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建立“圣母军”，同时把“圣母军”总部设在华理柱主持的“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内。“圣母军”总部的负责人是原在汉阳主教区的爱尔兰传教士莫克勤（William A. Mc Guath）。

从1949年2月《圣母军手册》中译本即将出版时黎培里给译者陈哲敏写的“特别祝贺”信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以要在我国解放前夕建立和发展“圣母军”，是因为“能对于任何的社会氛围，如本堂区，学校，工厂，……都无往而不适宜”^③，就是说“圣母军”适宜于到处活动。

由于中国教徒对“圣母”的宗教感情，黎培里等引进正在世界天主教内流行着的“圣母军”，在不少教徒特别是天主教教会大学和中学的青年男女教徒中产生了新的吸引力。加上黎培里等还用参加“传教工作”等宗教字句把他们建立“圣母军”的真正目的掩盖了起来，许多教徒由于主观上为“恭敬圣母”而参加了这个组织。1949年至1950年的两年间，“圣母军”已南至广东、桂林，西至四川，北至内蒙和东北，几乎发展到各地天主教内。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天津和上海。当时天津的“圣母军”分会有6个“区会”，58个“支会”^④；上海的“圣母军”分会有5个“区会”，50多个“支会”。

解放初，在各地原教会学校中的“圣母军”的活动，较普遍的是阻挠教徒学生走向爱国进步。原津沽大学有个参加过“圣母军”的学生有了爱国觉悟后说，津沽大学“圣母军”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有爱国进步倾向的天主教徒。教徒学生中稍有爱国进步倾向的，“圣母军”马上派“团员”（“圣母军”一般人员称“团员”）去扯后腿，叫他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对政治课考及格的或参加政治报告大会的，“圣母军”也马上给予警告或讽刺。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例子。但就从这个例子中已可看出黎培里等所利用的“圣母军”进行着超出宗教范围的活动。

第八，建立“教理小组”。解放后，许多地方的天主教内有“圣母军”。上海天主教内则不但有“圣母军”，并且还建立了取名“教理小组”的组织。它始自原震旦大学。1950年这

个大学的几乎全部教徒学生参加“教理小组”后，又推广到一些教会中学的青年学生和教会医院的知识分子教徒中，政府接办教会学校后，“教理小组”的活动场所，主要转移至伯多禄堂、君王堂等天主堂。这个组织从名称上看，是宗教性的。但其主要活动，也超出宗教范围。例如，它散布“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爱国爱教有矛盾”等各种谬论和所谓“三不主义”，即“不看”共产党的报纸，“不听”爱国言论，“不讲”教会内有帝国主义分子，以致不少教徒由于受蒙蔽而陷入同党和政府对抗的歧途。

第九，制造“教难”气氛。中国天主教内的敌对势力，在解放前用制造和散布共产党“烧教堂”、“杀神父教徒”等谣言，使教徒产生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解放后，教徒看到了党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实。在这情况下，敌对势力又利用教徒的宗教感情，制造“教难”气氛，企图使教徒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产生怀疑，产生不信任感。当时几乎各地教会内都有人以“神长”名义告诫教徒不要相信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因为这政策是“假”的，是“暂时”的，共产党以后还是要“灭教”的。有些教徒看到说这些话的是他们的“神长”，耳朵里一听就进去了。明明他们照常进教堂过着宗教生活，但却忧虑着以后会过不到了。他们有了这样的忧虑，于是又产生趁早多过些宗教生活的紧张心理。如1949年“圣诞节”时，有些教徒由于相信了教会内有人说的1950年“圣诞节”过不着了，1949年“圣诞节”是“最后一个圣诞节”，于是带着十分紧张的心情参加这“最后一个圣诞节”的宗教活动，形成一种“教难”气氛。1950年“圣诞节”，有人又说是“最后一个圣诞节”，产生了同样情况。

第十，散布“变天”思想。解放初，天主教徒中常流传着

一些“变天”谣言，如共产党“党子尾巴长不了”、“八月半蒋介石回来吃月饼”等等。这些“变天”谣言，当时社会上也流传着，但比较隐蔽，而在有些地方的天主教会内则相当公开。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和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天主教内有些敌对分子更是眉飞色舞，以为美国很快会打过来。他们互相把食指和中指伸成西方人表示庆祝胜利的“V”字形示意，以表达他们对美军在仁川登陆的高兴心情。一时间，什么“圣母在南朝鲜上空显圣，美国军队一定胜利”，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什么“天快亮了”等谣言，在教会内一传十、十传百地流传着。当时有些教徒受这些谣言的影响，更不敢靠拢党和政府，不敢走上爱新中国的道路。

此外，不少外国传教士还在暗中进行着收集我国各种情报的帝国主义间谍活动。对这一点，一些并不从事这一活动的教会人士感到困惑不解。在他们看来，凡是传教士就不会进行帝国主义间谍活动；其实，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有的传教士未进行这种罪恶活动，这也是事实；但决非所有传教士都这样。在旧中国时代也好，解放后也好，由于教会在我国分布广泛和易于掩护和活动等条件，传教士接受本国政府和梵蒂冈的任务，进行帝国主义间谍活动，并不是个别现象。传教士中进行这种活动的人，教案后，在罪证面前，他们自己也供认不讳。下面仅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上海耶稣会神学院院长翟光华（Mc Carty Carolus，美籍）在1954年6月29日他签名的认罪书中说：“从1947年秋季到1953年6月，我从事于反对中国的间谍工作。解放前我写了很多有关中国军事、经济、政治、社会的情报，送到国外。我将解放区新建机场的所在地，报告了北京美国领

事馆军官，并又将河北中部详细经济情报，供给了他。解放后我报道了飞机轰炸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害情况，解放军伤兵医院驻地，保卫上海的高射炮阵地，解放军动态，上海物价情况，淮河及运河流域的水利工程情况，水灾风灾情况，以及几年来政府开展各项运动情况，我常在信中用俚语和暗语转送情报。”

第二个例子：抚顺教区玛利诺会会长、代理主教葛怀仁（Joseph Mc Cormach，美籍）在1954年12月25日他签名的认罪书中说：“我来到中国已有29年。中国人民对我一向待之以礼，他们给我在传播福音和从事其他教会工作上以最大的便利，他们信任我是一个只致力于传教并为他们服务的传教士。我带着沉痛的心情承认，我常背弃了他们的信任而作出许多反对中国人民和他们国家的破坏行为，其中包括以下的间谍行为：

1932年我将中日交战中的中国军队情报供给沈阳美国领事。

1947年及48年，我给沈阳美国领事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并详述了东北地形及共产党在北部有大型军火工厂。

我允许属下的一位美国神父经常向沈阳的美军联络团 A. L. G.（美国情报机关）供给军事、经济情报。

1948年我向沈阳副领事提供有关东北部的粮食、煤炭、电力及工厂产量等经济情报。

同年我报告北京美领事馆陆军武官有关共产党如何管理解放了的的城市，并告诉他许多关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的诬蔑性的谣言。

1949年我带一位中国修生去上海美国领事地方，目的在于要他尽其所知地供给情报，诸如共产党如何对待沈阳美国领事

馆人员及有关沈阳解放的军事情报。

1950年我从东北的中国神父那儿得到军事情报，内容是中国军队集中在中朝边境，某地建造飞机场等等。

现在我完全认识到我的这些间谍活动是背弃了中国人民给予我的信任，他们将我当作传教士而承认我，尽一切可能帮助我，然而我不是感激，相反地却危害他们。这是最大的忘恩负义。我利用我传教士的职业便利，为美国领事收集情报，这些都是有害于中国人民的。”

政府对天主教工作的开展

面对中国天主教的历史和解放初的状况，党和政府坚持统一战线，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展了对天主教的工作。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对我国天主教和基督教究应如何认识？是不加区分地把这两个教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还是把我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利用这两个教侵略我国和善良的中国教徒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信奉这两个教有所区分？对这个问题，1950年11月各报转载的《时事手册》第三期上的《对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应有的认识》一文阐述得十分透彻。文章开头就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问题，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即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群众的信仰问题，一方面又是在长时期中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工具来向我国人民进行侵略的问题。我们应掌握这问题的两方面，认识这两方面的联系和区别，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来正确地处理有关宗教问题。”这就说清楚了我国这两个教的最基本状况。文章又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爱国人民并不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应当禁止或排斥的宗教，仅仅反对帝国主义者利用它们的教会来进行侵略”；“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反对侵略争取和平的政治行动上，唯物主义者 and 宗

教信徒却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联合起来”。这篇文章还清楚地指出：“我国一切爱国人民（包括爱国的教徒在内）对待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原则应该是：保护信仰自由，但是在一切宗教中都应该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发展爱国主义的影响，天主教和基督教应当变为完全不受外国挟持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社会活动”；“一切有爱国心的天主教、基督教徒，应该与全国人民站在一起，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间谍活动的阴谋，反对教会中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反动分子，有步骤地实现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逐渐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和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中国教徒自己的事业。对于教会中进行破坏活动与间谍活动的特务分子不论其为外国人或中国人，人民政府当然应该依照《共同纲领》第七条予以坚决的惩处。在这里，自然应该把这些特务分子的反革命活动和宗教问题分别开来，把教会中的特务分子与整个教会、教堂、或教会事业等分别开来，而不要加以混淆。教徒也应把这两个问题认识清楚，不要上了帝国主义挑拨宣传的当，误把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活动认作是压制宗教活动。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活动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与宗教问题完全无关，有爱国心的教徒自应加以热烈拥护。”50年代，天主教的爱国运动成绩显著，和当时政府在工作中有着这些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和方针是分不开的。

50年代政府对宗教界的工作中还有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是：中央领导同志选择对我国宗教问题，特别是对我国天主教、基督教有较深了解的党员干部，把他们调到政府宗教工作部门来担任领导工作。这些同志真切了解我国各宗教的特点，知道在做好教育、团结、争取教徒工作中注意照顾教徒宗教思想感情的重要性，坚决不做伤害教徒宗教思想感情的蠢事。他们和较

早站起来的许多天主教徒真心交朋友，并依靠他们团结广大教徒群众，团结天主教人士，团结中国神职人员和中国修女。那时，政府宗教工作部门的同志和爱国的教徒，关系相当融洽，大家互相信任，彼此尊重，共同商量事情，不因为你是有神论我是无神论而发生齟齬。这就使这些教徒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政府确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不歧视教徒，教徒和共产党员都是中国人，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教徒在新中国是同样有着光明的前途的。他们对走爱新中国的道路更加充满了信心。

反帝爱国运动的掀起

我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掀起，最早是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县中国神父王良佐和500余天主教徒发表宣言，主张“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①。在这之前，还有辅仁大学的反帝斗争。

北京解放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辅大师生员工的政治认识逐步提高。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辅大有了很多进步。但这些进步却被敌视新中国的教会领导方面认为于他们不利，因此，他们用尽一切方法企图阻止这个进步。首先，他们想用减少补助经费的方法来阻碍学校的进步和发展，于1949年将学校的补助费自22万美元减少到16万美元。1950年5、6月间，全体教师员工要求下年度经费早日决定，大家可以安心工作和学习，校长陈垣为此事和教会代表芮歌尼交涉十几次，毫无结果。到了7月14日，芮歌尼给陈垣一封信，说经费有了办法，每年可给14万4千美元；但必须实行4个条件。要承认条件才拿经费，不是友好合作的态度，何况条件中有不续聘五位教员的一条，是侵犯我国教育主权，绝对不能答应的，芮歌尼就声明从8月1日起不给钱了，还发有威胁性、煽动性的传单。因

此7月31日全校开一个大会，反对帝国主义行为的斗争正面接触了。中间经人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借垫8、9两月的经费，学校一切工作照常进行。但是芮歌尼并不死心，却上书周总理，企图越过教育部，又偷偷地在校外另组董事会，企图撤换陈垣校长。这些阴谋，为政府所揭破，9月25日邀芮歌尼在教育部谈话，辅仁事件限月内解决。到9月30日，教育部收到芮歌尼正式答复，接到“教会的最高首长”的回电，“补助费决定停止”。当经教育部报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0月12日明令将辅大接收自办，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垣为校长，负责主持校务。这一措施，得到了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辅大全体师生员工的拥护。10月22日，陈垣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辅仁大学反帝斗争的经过》一文。文中说：“这次事情，他们始终认金钱为万能，以为学校的存在，全靠金钱，而将我们同仁平日的劳力一笔抹煞，又以为有出钱的义务，就要有发言的权利，而不知许他在中国继续办学校，并许他在学校内得设宗教选修课程，就是他们莫大的权利。又以为我政府现在决无力接办这个学校，又存有第三次大战的幻想，所以造成这个结果。我们同仁认清了帝国主义的面目，受不了他们动辄以金钱相要挟的压迫，这回不论是教徒非教徒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像接办大会上说话的徐希德，他是英敛之的老门生，报载他是奉教三十二年的天主教徒，其实他是奉教四十二年的老教徒，他年近六十，在辅仁大学任文牍课长等职已二十余年，他是诚实而进步的教徒，他在教会戴庄师范教过书，好些神父修士都是他的学生，连他也感觉政府如不接办，学校简直没有法子维持，愿意大家团结起来，办好新辅仁。”

王良佐神父等发表爱国宣言，是在辅大师生员工拥护政府接办一个多月之后。宣言在报上发表之后，在教徒中无异响起了

一阵春雷。同年12月19日，归绥市天主教徒也发表了“与帝国主义断绝一切关系”^⑥的宣言。接着，又有重庆、南昌、武汉等地的代主教、神父、教徒相继发表了同一性质的宣言。

王良佐神父等倡议的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天主教人士的爱国运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向应邀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的华北地区天主教人士所作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支持天主教界的爱国运动。周总理说：“宗教界提出来的三自运动是应该提倡的，人民政府定加以支持和赞助。这是宗教界的爱国运动。爱自己的祖国人人有责，包括天主教徒在内。”他还亲切地教导和勉励天主教人士说：“我们要爱人民的祖国，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和反对我们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改我界限必须分清。”又说：“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立者才有前途。中国天主教徒是有能力办好自己教会的。”^⑦周总理生前和天主教人士谈话共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56年接见参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预备会议的天主教人士时。两次谈话都使天主教人士受到很深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是对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最有力的支持。

在党、政府和各界人民的支持下，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进一步开展。1951年初，华北地区走在这一运动最前列的是天津教徒。这年的1月11日，天津市“由于吴克斋先生等积极的发动”^⑧，成立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筹备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天主教徒：“站稳中国人民的立场，拥护共同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各方面的联系，实行中国天主教徒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⑨这一宣言在报上发表后，“各堂口的神长和会长纷纷约请吴克斋先生谈话，中

国神长和大部分教徒认为这个宣言非常正确，主张积极推动这个运动。”^⑩ 吴克斋先生，还有聂闾屏先生，是天津参加1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的天主教人士。他们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回到天津后，更积极地发动教徒签名拥护天主教界的爱国运动。由于吴、聂两先生和筹备会其他成员的努力，签名者日见增多，到4月7日“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正式成立时，签名者“已有一万五千余人”^⑪。这一天的《天津日报》用4、5、6三个版面登载了签名者的名单。当时天津全市天主教徒不到2万人。天津大多数教徒签名拥护爱国运动，对全国各地教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天津教徒起来后，南京教徒也起来了。于斌去美后，南京主教区的领导人是李维光代主教。1951年3月，他和南京教区的神父、修女、教徒793人签名发表联合宣言，主张实行“天主教在中国自养自治自传三大原则”，“反对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坚决与它割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⑫ 教廷就是梵蒂冈。在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的进程中，南京神职人员和教徒勇敢地向当时推行敌视新中国政策的梵蒂冈打响了第一炮。

黎培里等对教徒爱国运动的破坏

正当天主教界爱国运动从川北迅速发展天津、南京等地时，黎培里等为破坏这运动，先后发了三个文件。第一个是所谓“学习参考”^⑬，第二个是所谓“天主教中国全体主教声明”^⑭。在这两个反动文件中，他们散布天主教“超国际”、“超政治”等谬论，百般抵赖天主教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事实，给发起和参加爱国运动的教徒强加上“裂教”和“违反教义与教规”的莫须有罪名，还用心极其险恶地把这运动说成是

“受教外的驱使”。“教外”就是影射党和政府。这两个反动文件由华理柱主持的“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散发到全国各地天主教会，层层下达；在上海主要散发给参加“圣母军”或“教理小组”的教徒和其他知识分子教徒中。他们中有些人从对抗党和政府发展到直接破坏教徒参加爱国运动，与深受这两个反动文件的毒害，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个反动文件是黎培里在南京教徒发表联合宣言当天写给各主教的信。^⑩这个摩纳哥侨民在信中表示他“不能赞同”南京教徒的宣言。正如1951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就此信发表的题为“决不能容忍”的短评中所指出的：什么叫“不能赞同”？就是不同意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不同意梵蒂冈教廷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同意中国天主教实行自养、自传、自治。一句话，黎培里不同意中国天主教的爱国运动。黎培里在信中还把南京教徒的宣言说成是“敌人的诡计”。显然，他说的“敌人”是指包括爱新中国的教徒在内的中国人民和人民政府。

除了上述三个反动文件外，黎培里还派曾在抗战期间去后方因而在四川神职人员中有熟人的、上海教徒家庭出身的中国神父董世祉到四川，在北京神职人员中有熟人的梵蒂冈驻前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的秘书陈哲敏到华北，分别竭力阻止四川和华北的神职人员参加爱国运动。在天津，“圣母军”第三“区会”的“指导司铎”满济世（荷兰籍神父）领导数名“圣母军”主要成员，于1951年5月中、下旬，“秘密向爱国教徒吴克斋等发出恐吓信13封，并购买尖刀，邀集一批地痞流氓，企图暗杀积极进行天主教革新运动的爱国教徒们。”^⑪

驱逐黎培里

黎培里等破坏爱国运动，激起了各地爱国教徒的愤怒。他

们纷纷集会，要求政府驱逐黎培里。南京天主教徒孙持方、汪皓等还致函南京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要求将黎培里赶出中国去。^①上海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教务长杨士达、汇师小学教导主任汤履道等，在1951年6月14日华东宗教事务处召开的座谈会上，²要求政府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出中国，并彻查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②北京8000余教徒（其中包括神父44人）签名要求驱逐黎培里，这年9月2日和5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每一个签名者的名字，声势十分浩大。

1951年6月6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受外国津贴及由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处，召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负责人外侨华理柱等前至该处，“除宣布彻查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决定外，并着令华理柱等即日停止该会一切活动，听候政府传询处理”^③。7月13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保障祖国的主权，保障人民的利益，根据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教徒的正义要求，除将‘圣母军’中的反革命首要分子逮捕外，同时宣布‘圣母军’为非法组织，明令予以取缔”^④。9月4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决定将黎培里永远驱逐出国境”，并由南京市公安局“立即执行”。^⑤次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出中国”的社论说：“天主教徒要求驱逐黎培里的斗争是神圣的、正义的。这是整个中国天主教徒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的开始。在这个斗争中，我国的天主教徒不仅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而且必须学会如何继续与各种伪装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胜利的斗争。黎培里及其爪牙们曾用尽一切方法，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与宗教信仰混同起来，企图挑拨与破坏天主教徒和广大人民及人民政府的团结。但是，我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十分明白和坚定不移的。这就是：对于帝国

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阴谋，必须坚决予以打击；而对于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则予以保障。因此，在这个斗争中，一切守法的天主教徒，都更将进一步懂得在帝国主义控制下，正当的宗教信仰是毫无保障的，而只有在人民自己的政权之下，才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于我国天主教徒来说，今天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必须严格地分清敌我，必须从爱祖国爱人民的立场出发，下定决心，与潜藏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分清界限，并且把他们清除出去。只有这样，才是全国一切天主教徒唯一正当的出路。”这些话大大鼓舞并教育了天主教徒。

驱逐黎培里，是50年代初期中国天主教反帝斗争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但这仅仅是开始。黎培里被驱逐后，外国势力控制中国天主教的局面远没有改变，艰巨的斗争还在后面。

决定性的胜利

外国在华天主教传教士，据1949年《中华全国教务统计》所载，共有5507人。大陆即将全部解放时，少数传教士已离去。大陆全部解放后，部分传教士自动离境，大部分仍在。黎培里被驱逐后，潜藏着的帝国主义分子竟肆无忌惮地对要求政府驱逐黎培里的教徒加上“反对神长”的宗教罪名，给予“绝罚”和“停领圣体”的宗教处分。这情况当时在上海天主教内最为严重。

面对反帝爱国运动遇到来自还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新的重大阻力，爱国的教徒更加坚定了把这一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他们站稳人民立场，坚决不向企图用“绝罚”和“停领圣体”的宗教处分使他们低头的所谓“神长”低头。特别是南京主教区的代主教李维光，在爱国教徒的支持下，完全不

把梵蒂冈的“摘神权”的非法处分放在眼里，理直气壮地照常在教学堂内举行弥撒和给教徒施行“圣事”。驱逐黎培里后，全国各地站在反帝爱国运动前列的天主教徒没有被“绝罚”、“摘神权”、“停领圣体”等宗教处分所吓倒，是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史上十分光荣的一页。

先觉悟人。为了帮助暂时因受蒙蔽而不敢走上反帝爱国道路的教徒提高爱国觉悟，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首先创办了对广大教徒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和协助政府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刊物——《广扬》。正如《人民日报》在题为“天津天主教革新运动的成就”的社论中所评价的：《广扬》“不仅教育了天津的教徒，而且教育了华北的广大教徒”。②《广扬》问世后不久，上海、南昌、贵阳、武汉、长沙等地天主教徒爱国团体也相继创办了性质相同的刊物，如《信鸽》、《爱国》、《会刊》、《晓明》、《新生》等。在1952年和1953年上半年，天主教内爱国先进分子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分子的罪行，驳斥他们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谬论，并以亲身的体会歌颂祖国各个方面的成就。有的神父写了自己对党的认识。如1952年7月1日出版的一期《广扬》上发表了天津市纪家庄天主堂本堂神父李德培（现天津天主教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写的《我对共产党认识的转变》一文。他说：“我过去就生活在反动统治圈内，对共产党无丝毫的认识。所听到的无非是反动派诬蔑共产党的无中生有的恶宣传，比如说共产党不但共产而且共妻，消灭伦理；说共产党要杀四十种人等等。所以对共产党常存着恐怖心理，怕共产党成功。”解放后，“看见共产党工作人员，廉洁朴素，事事求实际，所以全国内诸般的建设，一日千里的前进，从此就认识了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给人民造福的政府。及至《共同纲领》宣布了

信仰自由，我又体会到人民政府是普遍照顾一切的，不但在物质方面给人民谋幸福，即在信仰上也给人民以自由。”因此，他在文章最后表示“特向毛主席及共产党致以最高的敬礼”。这样的对党认识的转变在当时天主教人士中相当有代表性，在教徒中有一定的感染力。这些刊物还不断传递各地教徒参加爱国活动和在工作、生产岗位上作出贡献，以及充分享受着宗教信仰自由的信息，对在驱逐黎培里后继续推进反帝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3年3月和6月，继全国许多地方相继破获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数十起案件^②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先后破获多起帝国主义间谍破坏案。案件中主犯之一，就是秉承梵蒂冈和耶稣会“总会长”的意志，把上海天主教拖上对抗人民政权的绝路的格寿平，其他主犯是翟光华，斐有文(Thomas Lenari Philips, 美籍，上海君王堂神父)，葛怀仁、梅占元(Joseph Jean Deymier, 法籍，远东遣使会总视察)，田望霖(Alain De Terwangne, 比利时籍神父)、林仁(Clement Renir Kcns, 比利时籍神父)等。案件破获后，格寿平等“驱使少数落后的天主教徒，刺探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教机密，破坏土地改革和各种爱国运动，企图危害人民民主政权”^③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教徒们纷纷表示拥护政府逮捕格寿平等帝国主义分子的措施，并要求政府予以严惩。如上海知名天主教人士陆薇读在《解放日报》发表书面谈话说：“对政府这次英明的措施，我表示衷心拥护。”^④

在上海清除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为帮助教徒看清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政府举办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罪证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于

1953年6月18日起正式展出。^②许多教徒前往参观。有些教徒由于先受到教会内敌对势力的造谣宣传，在开始参观时还带着怀疑的眼光，后来看到一件件罪证，怀疑消除了，认识到天主教内确实有帝国主义分子。如有个懂法、英、拉丁等外语的教徒，“看了各种笔供的原文”，表示“不能不承认教会内是隐藏着帝国主义分子，瞒着教友做坏事”，他愤怒地责斥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不是“善牧”，而是“羊贼”，必须把他们从“基多的羊栈”^③中清除出去。^④除了上海教徒外，南京、松江、杭州、温州、苏州、常熟、扬州、江阴等地的教徒代表也来到上海参观展览会。他们在上海时，分别与上海教徒交谈，相互交流反帝斗争经验，回去后向各地教徒传达。事实证明，这个展览会起了广泛的教育作用。

在上海清除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同时，其他地方也开展了这一斗争。如徐州市军管会于1953年7月5日“下令将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邵轶欧驱逐出我国国境，并由军法处立即执行”。7月29日，徐州市政协“为号召全市各界人民为清除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而斗争，召开了第七次扩大会议”。徐州市天主教爱国会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任云嶺等在会上发言，“除代表全市爱国天主教徒对人民政府为保护祖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邵轶欧出中国国境表示热烈拥护和衷心感谢外，并表示要进一步提高觉悟，将反帝爱国运动继续开展下去”。^⑤又如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1953年8月25日破获帝国主义分子福寿康反革命间谍活动案。8月30日，广州各阶层天主教人士举行座谈会。座谈会开始，播放福寿康等的供词录音。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教徒，“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惩福犯，并保证团结广大教徒把反帝爱国运动推进一步”^⑥。

通过1953年全国各地的反帝斗争，爱国的天主教徒扬眉吐气。在反帝斗争取得辉煌胜利的基础上，有的地方开始成立了以“爱国会”为名的天主教爱国团体。如唐山市以张达五为首的爱国爱教的教徒，于1953年6月20日，召开了唐山市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大会。唐山市彭市长应邀参加大会，使教徒们深受鼓舞。大会通过宣言：“坚决站稳中国人民立场，肃清教内帝国主义分子，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②广州市天主教徒于1953年9月20日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广州市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以“进一步推动神长们教友们共同投入反帝爱国运动，走上新的道路”^③。郑州市天主教徒爱国会于1953年10月底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姜健文代表全市教徒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不但能把帝国主义分子肃清出去，并且能协助神长把教会广扬下去。”^④南京市教徒于1953年11月20和21两日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章程，正式成立天主教爱国会。李维光、孙持方、汪皓等神职人员、修女、教徒23人当选为爱国会委员。会议闭幕时，李维光代主教致词说：“反帝爱国是真理，真理是一定胜利的。我相信，我们今后的反帝爱国运动更会获得辉煌的胜利。让我们紧密的携起手来为贯彻反帝爱国运动而努力吧！”^⑤

在中国天主教反帝斗争的胜利面前，历史上曾支持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解放后对新中国又采取敌视政策的梵蒂冈，对中国人民和我国爱国的教徒更加仇恨了。1952年1月18日，教皇庇护十二曾发出《致中国天主教会通谕》，公然为被我国政府驱逐的帝国主义分子辩护，说他们是遭受了“冤枉”，他们的罪名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诬加”的，等等。1954年10月7日，他又发出《致中国总主教和其余教区首长并司铎及服膺宗座的信友通谕》。这第二个“通谕”比第一个“通谕”更加露

骨。庇护十二在第二个“通谕”中说：“在最近几年里，公教在你们国内，环境并没有改善，反之，变本加厉，对于圣座和忠于圣座的人，诬蔑攻击，不遗余力，代表我们驻华的宗座公使，乃遭驱逐，而且加增阴谋，企图陷害无识的人。”又说：“我们明知道你们大都忠于信仰，然而知道也有人，或出于好心，或迫于畏惧，或骗于邪说，最近尚加入了仇恨宗教的人——另外是仇恨天主基督所创立的教会的人——所发起的阴险的运动，服从他们的谬理。”还说：“至于那辈甘受虐待以忠于天主教会而异于常人的，我们再三恭贺他们，再三用慈父心肠激励他们。在他们所走的正路上，他们要勇敢无畏地前进。”看，庇护十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已到了什么程度！明明是黎培里干涉中国内政，明明是中国天主教内的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分子犯下了危害中国人民利益的罪行，他们受到我国国法的正义制裁是罪有应得，而庇护十二竟反口相诬，对中国人民和爱国的天主教徒进行如此恶毒的诽谤，这恰好又一次暴露了他敌视中国人民的真面目。这个梵蒂冈敌视新中国政策的制订人，把我国政府肃清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诬蔑为“阴谋”，把我国教徒的反帝爱国正义事业诬蔑为“阴险的运动”，把他们天经地义的爱人民中国的主张诬蔑为“邪说”、“谬理”，正好使人们看到：中国人民和爱国的天主教徒打在黎培里等帝国主义分子身上，痛在庇护十二的心上。庇护十二敌视新中国。在他的指授下，中国天主教内个别反革命分子进行叛国活动。庇护十二“恭贺”这些人，“激励”他们“勇敢无畏”地在反革命道路上走下去，也正好使人们看到：梵蒂冈是解放后中国天主教内不断出现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总根子。

梵蒂冈的第二个“通谕”偷偷地从海外发到了龚品梅等手里。通谕的原件是拉丁文。龚品梅拿到这个“通谕”后，看到

自己在格寿平幕后指挥下把上海天主教拖上反对人民政权的绝路的行动得到梵蒂冈的赞扬，因此在格寿平等案发被依法逮捕后，非但不悬崖勒马，而且干得更加卖力。举一个例子：当全国人民包括爱国的天主教徒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奋斗的时候，龚品梅与其同伙密谋，提出所谓“天国路线”，以同国家总路线相对抗。他定下的基调是：“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我们要提出天国路线来抵制总路线的宣传工作。”他命令上海各天主堂神父按照这个基调，利用“讲道”向教徒宣讲。

经过1953年反帝斗争后，上海等地天主教内还存在着如此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严重状况，不能不使人们感到肃清天主教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已刻不容缓。1955年9月8日，上海市公安机关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教徒的要求和协助下，破获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⑩同时，武汉等地也相继破获天主教内的反革命集团。

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靠天主教内不断涌现出来的爱国新生力量，耐心细致地做好争取、团结、教育教徒的工作，在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上，教徒团结面不断扩大。肃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和其他一些地方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搬掉了教徒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以上海为例，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破获后的二、三个月内，有近三万名教徒包括曾参加过“圣母军”或“教理小组”的青年教徒，分别参加了揭发和声讨这个反革命集团种种罪行的大小集会。在教会内长期受压的神父、修女们也纷纷站了起来。如张士琅、张家树、徐元荣、李思德等神父多次在教徒集会上发言，并带领上海75位神父发表《告神长教友书》，责斥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号召

教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他们说：“过去我们不能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现在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建设起来了。我们教友要用我们的能力，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把祖国建设好。”^①这一年的国庆节，许多过去不敢参加庆祝国庆游行的教徒，第一次参加了上海天主教界游行队伍，第一次举手热烈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上海各天主堂张灯结彩，挂上五星红旗，举行为祖国祈祷的大礼弥撒。弥撒中过去因反对黎培显等帝国主义分子而被“停领圣体”的教徒，“都领到圣体”^②。

通过1953年反帝斗争和1955年肃反斗争，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天主教的状况起了根本的变化。1955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愈来愈多的教徒走上爱国爱教一致的道路的基础上，更多的地方性天主教爱国会相继成立。1955年，地方性天主教爱国会已达200个左右，为成立全国性天主教爱国会和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创造了条件。

注 释

①拉丁原文见“Acta Apostolicae Sedis”1949年第334页。译文如下：

“命令

圣职部提出下列各问题：

1. 报名加入共产党或对该党加以赞助是合法的吗？
2. 发表宣传或阅读支持共产主义理论或其行为之书籍、杂志、报纸或传单，或在其上面写文章，是合法的吗？
3. 犯了上列1、2项行为的基督信徒，如其行为是明知而且自愿的，是否能领受圣事？
4. 信仰共产党唯物主义反基督理论的基督信徒，尤其是那些为这种

理论去辩护和宣传的人，是否无条件地要作为背教者受到特别保留于宗座的绝罚处分？

最可敬的神父们，为了保卫信仰和习惯，在征集了咨议员的意见后，于1949年6月28日第三次全体大会上，决定对以上问题作如下答复：

对第1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共产主义是唯物的，反基督的；虽然共产党的领袖们有时口头上说是不反对宗教，但事实上他们无论在理论上或行动上都显示出反对天主，反对真宗教，反对基督的教会。

对第2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此项权利是被禁止的。（参见《法典》第1399条）

对第3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根据一般圣事的原则，凡是不合的人，即拒绝其领受圣事。

对第4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

在同年同月30日那天，教皇庇护十二在其对圣职部所召集之例行会议中，报告他批准了此项决议，并命令将其公布，列于教廷档案。

1949年7月1日发自罗马

圣职部部长维高利带 (Petrus Vigorita) ”

②上海主教区的前身是“江南传教区”。第一任“江南宗座代牧”是耶稣会传教士年文思 (Borgniet)，以后是：郎怀仁 (Languillat)，倪怀纶 (Garnier)、苏继章 (Simon)、姚宗李 (Paris)。最后一个任上海主教的是耶稣会传教士惠济良。

③《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总主教致圣母军手册译者函》，《神职月刊》1949年5月号。

④“圣母军”的基层组织称“支会”，1个“支会”从几个“团员”开始，发展到20个“团员”时，即应分成两个“支会”，若干“支会”组成1个“区会”，若干“区会”组成一个“分会”，“分会”直属“圣母军总部”。

⑤《四川广元天主教徒发表宣言坚决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关系》，1950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⑥《归绥市天主教发表三自革新运动宣言》，1951年1月5日《人

民日报》。

⑦《中央文教委员会邀华北区天主教人士茶会》，1951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⑧《聂国屏报告筹备经过》，1951年4月8日《天津日报》。

⑨《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1951年1月13日《天津日报》。

⑩庆云《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195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

⑪《聂国屏报告筹备经过》，1951年4月8日《天津日报》。

⑫《南京溧水句容陶吴镇丹阳等地天主教徒发表响应爱国运动联合宣言》，1951年3月31日《新华日报》。

⑬195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披露了这一破坏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的文件。黎培里、华理往等为了逃避罪责，不署作者姓名，不写印刷和发行单位名称，也不署日期，但注拉丁字：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即“经教会批准”，印发这个“学习参考”。3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帝国主义分子破坏天主教自立爱国运动的铁证”，对该“学习参考”散布的论点进行了十分有力的批驳。

⑭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 (de Vienne) 在供词中承认：“我曾反对革新运动，亲笔起草‘天主教中国全体主教声明’，送给南京黎培里印发。”

⑮1951年5月24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竟写信给各区主教破坏天主教南京教区革新运动”的消息，并发表了题为“决不能容忍”的短评，并附：黎培里的信。黎原信为拉丁文。《人民日报》曾将黎拉丁文原信制版刊出。下面是拉丁文原信和中译文：

EXC. ME/REV. ME DOMINE

Hodie die 3^{ia} mensis Martii, ephemerides Nankinenses publicaverunt declarationem quandam quae dicitur a sacerdotibus Christianisque hujus Archidioecesis subsignatam fuisse Maximo dolore afficior atque festino Tecum communicare eam me inscio confectum fuisse et ipsam approbari non posse.

Spiritum Sanctum enixe deprecor ut omnibus fidelibus, praesertim universo clero, necessarias gratias illuminationis ac fortitudinis tribuat ad insidias adversariorum clare perspiciendas easque fortiter superandas pro honore Sanctae Matris Ecclesiae ac Summi Pontificis

Devotissimo Tuus in Christo servus

Riberi

“尊敬的主教阁下：

今天，3月31日，南京报纸登载了一篇称系由本总主教区的神父和教友们签署的宣言。我深为悲痛，并急速通知你，宣言制订时我未知悉，我也不能赞同此宣言。

我竭力祈求天主圣神，给一切教友们，尤其给全体神职班，恩赐必要的明悟与勇气，去明白地洞悉和勇敢地战胜敌人的诡计，为了慈母圣教会和教皇的尊荣。

基督内你的最忠诚的仆人

黎培里（签名）”

⑩鲁西良《“圣母军”在天津的罪恶活动》，1951年7月16日《解放日报》。

⑪《天主教徒纷纷致函柯市长要求将黎培里赶出中国去》，1951年5月27日《新华日报》。

⑫《震旦大学校长等170余人要求解散天主教教务协进会》，1951年6月16日《解放日报》。

⑬1951年6月16日《解放日报》。

⑭1951年7月13日《天津日报》社论：《取缔反动的秘密组织“圣母军”》。

⑮《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驱逐黎培里出境的命令》。

⑯天主教称一个神父在受“祝圣”时领受“神权”后就一直有“神权”。“搞神权”是对神父的一种宗教处分，即禁止受处分的神父使用“神权”，但不是剥夺“神权”。

⑳1951年4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天津天主教革新运动的成就”。

㉑例如：邢台、齐齐哈尔、献县和沈阳的天主教间谍案，广东梅县天主教美籍主教福尔德间谍活动案，南京天主教耶稣会美籍神父牧育才等反革命活动案，黄石天主教美籍神父苏良反革命活动案，辰谿天主教美籍神父翁明德通匪藏毒案，沅陵天主教美籍神父高尔飞反革命活动案，天津天主教法籍主教文贵宾反革命活动案，北京意籍神父马迪儒间谍活动案，等等。

㉒1953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肃清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

㉓《五位天主教徒发表书面或口头谈话》，1953年6月30日《解放日报》。

㉔这个展览会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办的，除揭露了上海和各地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大量历史和现行的罪行外，还介绍了马相伯等天主教徒的爱国事迹。

㉕天主教会自称为“基多的羊栈”。基多即基督。

㉖《教友踊跃参观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罪证展览会》，《信鸽》第34期。

㉗1953年7月30日《徐州工人报》。

㉘《广州破获帝国主义间谍案》，《信鸽》第40期。

㉙《唐山市教友成立爱国会》，《信鸽》第37期。

㉚《广州神长教友团结成一片组成爱国会筹委会》，《信鸽》第45期。

㉛《郑州市神长教友成立爱国会》，《信鸽》第45期。

㉜《南京市神长教友们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信鸽》第46期。

㉝1953年3月16、17两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个反革命叛国集团进行了公开审讯和宣判。首犯龚品梅被判处无期徒刑。1955年7月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龚品梅在服刑期间能遵守监规、认罪服法等悔改表现，依法裁定准予假释。

假释后，龚品梅住在徐家汇主教府内，受到了教会和张家树主教的

关怀、帮助。1987年12月中旬，上海市公安局书面建议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请减免对龚的剩余考验期，并恢复政治权利。法院组成合议庭，依法于1988年1月5日作出裁定，减免他剩余的假释考验期，并恢复政治权利。

1968年5月11日，龚乘飞机赴美国探亲。

⑦《上海天主教界出现了团结爱国新气象》，1955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

⑧同上。

八、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建立

解放后，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起步不迟，但建立全国性爱国组织，在我国几个主要宗教中却是最后一个，其原因主要就是上文中所讲的庇护十二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起了严重的破坏和阻挠作用。

天主教全国性爱国组织的名称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现在有些人对“爱国会”这个名称感到不大理解。他们问：难道天主教是主张不爱国的吗？为什么要成立“爱国会”？另外有种人，则自从中国天主教有识之士创导反帝爱国运动后，一直把这运动取得的重大胜利成果——爱国会视为眼中钉，造谣污蔑，企图损害这个天主教界爱国组织的形象。为了使人们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有所了解，下面将较详细地叙述它的建立过程。

走爱新中国的道路

天主教《教理问答》中把爱国列入该教“十诫”中的“第四诫”，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敌对势力借口新中国是无神论共产党领导的，散布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爱国爱教“有矛盾”等谬论，不准教徒爱新中国，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解放初，在上海等地一些教会内，爱国有“罪”，几乎连儿童教徒也知道。不可参加工会，不可带“红领巾”，不可参加“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游行，等等，这些规定不都是当时教会内有人曾向教徒宣布的吗？在旧中国，一些天主

堂挂法国旗、意国旗、美国旗等外国旗，抗战胜利后挂国民党旗。解放后，许多教堂一面隐藏着这些旗，同时拒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这都是事实。

披着天主教外衣的敌对势力利用“神权”，不准教徒爱新中国。在这情况下，教徒怎么办？这就是当时我国天主教徒面临的必须作出抉择的走什么道路问题。广大天主教徒是决不愿走叛国的绝路的。虽然，当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刚开展起来时，部分教徒由于对以“神长”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暂时还缺乏认识，错误地听信了这些“神长”的话，在一条条的禁令下，不敢拥护中国共产党，不敢靠拢人民政府，不敢参加爱国活动，但是随着新中国形势的发展，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随着党和政府耐心细致地根据教徒思想特点做好团结、教育工作，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随着天主教界反帝斗争的深入，愈来愈多的教徒从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的事实中，认识到共产党确实是为谋求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教徒也一视同仁，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热爱新中国之心油然而生。在爱国主义思想提高的基础上，他们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历史和披着天主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也逐渐有了认识。自1949年至1955年，中国天主教内爱国新生力量不断涌现。许多爱国的教徒和神职人员先后当上了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

1954年，全国各省、市第一届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相继举行，选出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天主教南京总主教区李维光代总主教，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天主教支会主席胡文耀教友、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副总经理、武汉市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童少生教友，光荣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①我国最高权力机构中

也有天主教界的代表，不但生动地体现了我国天主教徒和全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也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对天主教爱国人士的信任。接着，济南教区董文隆副主教被选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②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有这样高的政治地位，使教徒和神职人员深切体会到他们在新中国是有着光明前途的，从而更加激励自己要在爱新中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倡议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1953年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时，天主教界全国政协委员又增加了四川南充主教区主教王六成和上海主教区神父张士琅。北京主教区副主教李君武、上海主教区神父张家树、南京主教区神父康思诚、天水主教区代主教赵经农和知名爱国人士杨士达被选列席会议。我国领导人对他们参加会议很重视。“张士琅神父发言时，周总理及在场的委员都十分注意。”^③会议结束举行宴会时，张士琅与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同席。陈云是青浦人。张士琅曾在青浦一个天主堂主持教务。席间，陈云和张交谈，话题从青浦开始，张感到十分亲切。

就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天主教界参加会议的主教、神父、教徒，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的座谈会上，倡议成立中国天主教全国性的爱国组织。他们提出这个倡议后，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即着手进行“征求建立全国爱国组织的发起人，由发起人先举行一次预备会议”的工作。这一工作进展顺利。那次全国政协会议是1953年2月7日闭幕的。5个月之后，由37位天主教人士^④发起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了。这是解放后我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一，讨论和通过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发起书；第二，草拟和讨论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章程(草案)，第三，协商各地出席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人数；第四，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⑤会议历时9天。经过与会人士的共同努力，四项议题圆满成功。

周总理和天主教人士的第二次谈话

1957年7月26日，上述会议结束后的次日，周总理接见了出席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的各地主教、代主教、副主教、神父和教徒。总理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亲切谈话。现在时间已过去了30多年。在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经历了“左”的严重干扰之厝，重温周总理对天主教人士的这次谈话，使我们更加缅怀周总理，更加深切地感到周总理在处理我国宗教问题上树立了典范。

在清除了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后，我国教徒能不能自己办好教会？有些天主教人士缺乏信心。因此，周总理在谈话中说了两次“不要妄自菲薄”，鼓励天主教人士要有办好教会的信心。他用唐僧取经的例子说了这样一段话：“唐僧为了学佛和传佛，不避艰险，自己去印度学梵文，学印语。自译佛经回来传布，这倒是依靠自己力量来传教，因此，中国佛教就不需要许多外来僧侣来越俎代庖了，我想这是符合民族利益的。你们天主教人士不要妄自菲薄，该有信心办好教会，一定会办得好的。”^⑥

当时我国天主教内还有一个搞好团结的问题。周总理在谈话中教导天主教人士说：“首先是各宗教界内部之间的团结，教区与教区之间的团结，不要有门户之见，过去历史原因造成分裂，今天完全有条件改变。”又说：“教会内部也要反对宗派主义、宗派情绪，应该大家团结，办好教会。神职人员与教

友之间也应团结互助。不要你讨厌我不爱国，我埋怨你不爱教，意见分歧，各不相容。要从善意出发，搞好内部关系。因为内部分裂，什么事情也办不好。”^①了解当时我国天主教情况的人，都会感到周总理说的“不要你讨厌我不爱国，我埋怨你不爱教”这句话，正是给了天主教人士从思想上解决教会内部团结问题的一把钥匙。

这次谈话中，周总理关于宗教政策和宗教界风俗习惯的一段话，不但对天主教界，而且对其他宗教界都起了很大振奋作用。他说：“宗教信仰自由，我不仅在国内谈，而且在亚非会议上也不止一次的谈了这个问题。不论何种宗教，政府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至于风俗习惯，如宗教界（信基督的教）的一个星期休息一天的习惯，已经成为普通的风俗。宗教界提倡茹素守斋，对健康营养也有好处。宗教界提倡清心寡欲，反省修身，这对新社会提倡的检讨批判，勇于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也毫无冲突，对于整顿道德人心，也有帮助。因此宗教界不必灰心丧气，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因为对人民有利的事，就会保存下来。”^②

天主教人士聆听了周总理的谈话，都十分感动。如开封主教区代主教何春明在会议后撰文说：“蒙周总理在百忙中予以接见，殷殷垂询，诚恳之态度溢于言表，给到会之各位神长和教友以莫大之鼓舞和启发。”^③他们从周总理的亲切教导中获得了前进的新的动力，从而大大加快了成立全国性爱国组织的步伐。

皮漱石总主教的鲜明爱国立场

1946年梵蒂冈建立所谓中国天主教会“圣统制”，把中国天主教约140个主教区分属于20个总主教区。每个总主教区有

一个“总主教”。总主教在教会内的地位高于一般主教。解放前20个总主教区的总主教中17个是外国人，仅3个是中国人，即北京总主教区的田耕莘、南京总主教区的于斌、南昌总主教区的周济世。田、于在大陆即将全部解放前夕都去了美国。解放后，皮漱石^①受祝圣为主教，并做了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随着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全部外国人总主教都被驱逐。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后，皮漱石总主教态度终于明朗化。1956年11月20日，他应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的邀请，偕沈阳市天主教爱国会主任徐振江神父到北京。他“与筹备处的主教神父教友交换了有关大力开展反帝爱国爱教工作的意见，了解了筹备处的各项工作情况，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表示“非常满意”，并表示“要不辞劳苦的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筹备处的一切工作”。^②皮漱石以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地位最高的总主教身份表示鲜明的爱国立场，在神职人员和教徒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发起人会议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在筹备过程中，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300余件拥护信。这些信件表明：成立中国天主教全国性爱国组织是全国各地天主教人士的迫切要求。1957年2月12日至16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发起人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一会议的，除上次预备会议的37个发起人外，增加了皮漱石总主教、宗怀漠主教和胡文耀先生等22人。会议决定不再经过筹备委员会阶段，直接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并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改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处，为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进行筹备工作。

毛主席说：“可以团结起来了！”

1957年4月16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处副主任李君武、副主教、李德培神父和在筹各处工作的教徒汤履道、周健钟、连秋航、胡少甫，还有在北京的宗怀谟主教和北京主教区神父马文纯，应邀出席了周总理举行的欢迎苏联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酒会。这次酒会，毛主席亲自来了，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都到会。毛主席、朱副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在和到会人士握手时，和天主教人士也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讲了一句话说：“可以团结起来了！”^⑩话虽然只有一句，但意义十分重大。毛主席对天主教界的情况很了解。在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发展到即将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时，毛主席说这句话是对天主教界的深切关怀和最大鼓励。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正式成立

1957年6月，各项工作准备就绪，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空前的由中国教徒自己当家作主的“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首都北京召开。从6月17日到7月13日先举行预备会议。正式会议从7月15日开始，至8月2日闭幕。参加者有全国26个省市、100多个主教区的主教、代主教、副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徒代表241人。会议时间比较长，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一共50余天，这是因为代表们十分认真地讨论了两条道路问题、教会内的肃反问题、中国天主教徒反帝爱国运动问题、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宗教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宣告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在由150名委员组成的爱国会第一届委员会全体会议

上，皮漱石总主教当选为全国爱国会主席。

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对这个决议的内容，过去人们引用的，往往只是和梵蒂冈的政治、经济关系方面，宗教方面似乎不大被注意。现在，许多情况发生变化。笔者认为，对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政治和经济上决议是怎样说的，宗教上又是怎样说的，都应该根据历史的真实。

关于举世瞩目的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是这样说的：“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带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④在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上，决议是把政治与宗教清楚地加以区别的。

会议闭幕后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深入开展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社论中，关于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也是把梵蒂冈同我国政治上的敌对历史和中国天主教徒宗教上的信仰传统截然分开的。社论全文共分六段，其中四段都是论述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这四段中最后一段如下：

“中国天主教徒完全有权自办中国的天主教会。中国天主教会不但要同梵蒂冈割断一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而且要梵蒂冈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天主教会在宗教上应有的权利，不得任意干涉中国天主教的教务。只有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天主教才能够在不丧失爱国立场，不损害我国主权和人民利益，并且有利于教会本身教务的条件下，同梵蒂冈建立一定的宗教联系。”^①

《人民日报》社论的这一段十分重要，可以说是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关系问题上的准则，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

中国天主教全国性爱国组织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后改称“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为如实反映这一历史过程，本文在开头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名称，文中又用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这名称。从“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到“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这一字之改，表明中国天主教不但教徒，而且教会已都走在爱新中国的道路上。教徒是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教徒，教会也同样，这就是中国天主教成立全国性爱国组织的新貌。

注 释

①《李维光代总主教、胡文耀童少生两位教友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信鸽》第62期。

②我国天主教界代表首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是上海胡文耀先生、天津吴克斋先生应邀列席1951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补选了18名委员，胡文耀为其中之一。董文隆是胡文耀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的天主教界全国政协委员。

③张家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感想》，《信鸽》第100期。

④中国天主教爱国会37位发起人是：王文成（四川省南充主教区主教）、赵振声（河北省献县主教区主教）、易宣化（湖北省襄阳主教区主教）、李伯渔（陕西省周至主教区主教）、李维光（江苏省南京主教区代主教）、董文隆（山东省济南主教区副主教）、李君武（北京主教区副主教）、李德培（天津纪家庄天主堂神父）、杨士达（上海天主教徒）、

张士琅(上海主教区代主教)、胡钦明(江西省南昌主教区代主教)、杨高肇(湖南省常德主教区代主教)、何春明(河南省开封主教区代主教)、赵经农(甘肃省天水主教区代主教)、马文纯(北京市东堂神父)、徐振江(沈阳市天主堂神父)、汤愿道(上海天主教徒)、连秋航(济南天主教徒)、胡少甫(武汉天主教徒)、李耀宗(天津天主教徒)、高宗才(西安天主教徒)、王克谦(杭州市天主堂神父)、刘建仁(呼和浩特天主教代主教)、陈志雄(女,广州天主教徒)、贾振民(北京天主教徒)、林泉(福建省福州主教区代主教)、王聚祥(山东省兖州主教区代主教)、王良佐(四川省广元县天主堂神父)、曹道生(太原天主教徒)、张家树(上海天主教修道院理院神父)、李思德(上海市虹口天主堂神父)、周健钟(贵州天主教徒)、张骏声(河北省献县张家庄天主堂神父)、王其威(保定市天主堂神父)、康思诚(无锡市天主堂神父)、庞世宏(呼和浩特天主堂神父)、姚光裕(北京市北堂神父)。

⑤《在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会预备会议上王文成主教的开会词》,《信鸽》第109、110期。

⑥《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传达报告》(油印件)。

⑦同上。

⑧同上。

⑨何春明《在天主的降福下》,《信鸽》第111期。

⑩1978年5月16日去世。骨灰存八宝山革命公墓。

⑪《东北皮漱石总主教访问京津》,《广扬》1957年第1期。

⑫《毛主席鼓励我们说:“可以团结起来了!”》,《信鸽》第127期。

⑬《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决议》,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编:《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专辑》。

⑭1957年8月3日《人民日报》。

九、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周总理早在1950年就明确指出：“我们主张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的指挥就不行。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①“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这是从实际出发处理我国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也是中国天主教徒应有的办教主权。

历史上中国天主教曾受梵蒂冈的指挥。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又推行与新中国敌对的政策。这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给中国天主教会带来严重后果。1957年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把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列为中心议题，就是为了改变过去那种不正常状况，而使自己掌握办教的主权。这次会议后，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各地方性爱国会的带动下，神职人员、修女、教徒纷纷参加座谈会、学习会等自我教育的活动。大家把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付诸行动，取得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重大胜利。

对梵蒂冈历史真相的认识

天主教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在西方，特别是在中世纪，天主教曾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天主教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历史上教皇不仅在教皇国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而且把教权统治伸向西方各天主教国家。因此教皇有两重性，即他既是天主教的宗教首脑，但又是参与和干预政治、经济等活动

的一定意义上的世俗统治者。许多教皇和其他统治者一样，干下了许许多多非宗教的甚至违反天主教教义教规的丑事和坏事。对此，西方的史书包括教会人士写的史书都有记述。但在过去，大多数中国天主教徒对教皇和对梵蒂冈的了解是很不全面的。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徒对中世纪天主教史几乎一无所知。雍乾嘉道四朝禁教时期，天主教在中国已不绝如缕。上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大批来到中国，而这一时期，在西方却正是教皇的权势江河日下。为了挽救这一颓势，1869至1870年由教皇庇护第九召开的“梵蒂冈第一届公会议”制定了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中国天主教徒中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占大多数，知识分子教徒和中国神父、修女只占一小部分。“梵一会议”后，传教士常向中国天主教徒宣讲教皇“永无谬误”这一信条。因此，除了有较多天主教历史知识的神父、教徒对教皇和梵蒂冈的历史真相有一定的了解外，一般教徒就只知道教皇“永无谬误”，对他应绝对服从。加上许多缺乏文化知识的教徒对我国近现代史也茫然无所知，因此有必要帮助他们增加对教皇和梵蒂冈历史真相的认识。

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后，有些对梵蒂冈及其前身教皇国的历史有研究的神父、教徒自觉地负起了帮助大家认识教皇和梵蒂冈历史真相的重任。其中有的还挥毫撰文，在天主教爱国组织主办的刊物上发表。如上海天主教会的一位神父，从拉丁和法、德、英四种外文著作中搜集了可靠的材料，写了题为《从历史上看罗马教廷的本质》的长文，发表在拥有大量教徒读者的《信鸽》半月刊上。文章从五个方面：1. 自4世纪以来罗马宗座是各反动统治势力明争暗夺与压迫人民的工具，2. 教皇发动十字军东征的目的，3. 教皇设立残暴透顶的异端法庭，4. 19世纪以来教皇利用神权勾结列国暴君，敛

财欺民，破坏民族独立的罪行，5. 梵蒂冈反共纲领——“劳工通牒”的由来，让大家看到了梵蒂冈的历史真面目。另一位懂拉丁和英、法文的教徒，也从外文教会史书中搜集了许多关于教皇（如亚历山大六世等）丑闻的材料，写成文章发表。天津市天主教爱国组织主办的《广扬》，还编印了梵蒂冈在二次大战中支持德、意法西斯的小册子。事实教育了教徒，使他们克服了盲目性，对教皇和梵蒂冈的历史真相有了一定的认识。不少教徒这样说：“信天主教是信天主，不是信教皇；教皇是人，不是天主，是人就会错。”

在爱国先进分子的带动和帮助下，更多的教徒认识到割断同梵蒂冈政治、经济和组织上的联系，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为自选自圣主教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天主教会的基本体制是主教管理主教区。经过反帝斗争，控制我国各地天主教会领导权的帝国主义分子已被清除。但是这些帝国主义分子被驱逐出去后，仍继续挂着中国天主教一些主教区的主教头衔。^②我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当然不承认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是中国主教，他们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就是行使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权利，自选自圣主教。

成都主教区实现自选主教

中国天主教首先实现自选主教的主教区是四川省成都主教区。1957年12月16日，成都主教区代表会议在成都市隆重举行。会上，来自35个县、市的成都主教区100多名代表，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投票选出了李熙亭为成都主教区正权主教，唐俊、李道揆为副主教。李熙亭当选为主教后，当场指定王良佐、唐东初等四位神父为主教区谘议会议员，王良佐为议长。在谘议会作证下，李熙亭主教手按圣经，宣誓就任成都主教区正权主教。

他在誓词中说：“我自感德才菲薄，难当重任，惟群众的呼声即天主的声音，因此，自当挺身而出，肩负起教区职务。”^①

成都主教区神职人员和教徒选出李熙亭为正权主教，创立了中国天主教自选主教的第一个范例。正如王文成老主教在致李熙亭新主教的贺词中所说的：“成都教区这次自选主教是全川天主教会历史上的创举，并为其他没有主教的教区树立了光荣的旗帜。”也正如《四川日报》题为“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中的重大事件”的短评中所指出的：“这次成都教区自选主教的成功，为本省其他还没有主教的教区作了示范。”^②正因为这样，成都主教区自选主教的喜讯传出后，各地天主教人士和教徒莫不欢欣鼓舞。在不到3个月内，李熙亭主教先后收到各地的贺电、贺信达70件以上。

继成薄主教区自选主教后，自1958年2月至4月，又有宜宾、苏州、昆明、济南、广州、太原、南京、菏泽、汉口、武昌、杭州、永年、开封、西湾子、宣化、永平、益都、正定、周村主教区相继选出了王炬光、沈初鸣、孔令忠、董文隆、陈亦新、李德华、李雄光、李明月、董光清、袁文华、吴国焯、王守谦、何春明、潘少卿、常守彝、兰柏露、贾福善、刘安止、宗怀德为各自主教区的正权主教。

汉口武昌两主教区自选主教实现自圣

按照天主教的规定，新主教的主教神权须由有主教神权的主教在行祝圣礼中授予。中国天主教第一个为自选主教行祝圣礼的，是蒲圻主教区主教李道南。他在汉口、武昌两主教区全体神父分别于1958年3月18日、19日自选主教后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坚决表示要“亲自祝圣”这两个主教区的自选主教。这样，汉口、武昌两主教区在自选主教后，又有了自圣主教的条

件，决定自圣。

汉口、武昌两主教区的自选主教董光清、袁文华和神父、修女、修士、教徒，在自选主教并决定自圣后，本着从宗教上当信当行的原则通知了梵蒂冈。中国天主教人士这样做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56年上海主教区选出张士琅代主教后，当时的上海主教区谘议长徐元荣神父把此事函告梵蒂冈，但两次都遭到对方的回绝。1958年3月26日和29日，梵蒂冈先后回电报说，汉口、武昌两主教区自选主教是“无效的”、“无价值的”、“等于没有”，并表示“深为痛心”，还使用恐吓手段，以“超级绝罚”(Excommunicatio Specialissima reservata)⑥来威胁我国爱国的神职人员。汉口、武昌两主教区在宗教上尊重罗马教廷的做法竟然得到“超级绝罚”的威胁，这就使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更加看清楚梵蒂冈利用宗教上的“神权”以达到控制中国天主教为其反对新中国的政治目的效劳的真面目。4月9日，武汉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徒1000余人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对梵蒂冈的抗议书。他们在抗议书中写道：“罗马教廷无理否认我们的选举，并使用无耻的恐吓手段，企图使我们放弃合法的神圣权利，听从梵蒂冈反动政策的摆布，这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天主教的莫大耻辱，不能不激起我们无比的愤慨。我们武汉市全体神职人员、修士、修道⑦及教友一致反对罗马教廷这一非法措施，并提出严正抗议。”⑧会上，董光清、袁文华两位新主教和李道南老主教都发言表示：“决不为梵蒂冈的威胁所吓倒”，并表示“要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⑨

现在有些不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人，对在这以后中国天主教和梵蒂冈的关系感到惘然。他们问道：是天主教怎么能和梵蒂冈没有宗教上的关系呢？殊不知这状况正是梵蒂冈造成的，

替在梵蒂冈。

1958年4月13日，李道南主教祝圣董光清、袁文华两位新主教的典礼在汉口上海路天主堂隆重举行。内蒙的王学明，陕西的李伯渔，襄阳的易宣化三位主教，远道而来，在祝圣典礼中担任襄礼。“李道南主教把圣经放在新主教肩上，双手复在新主教的头上，并在新主教的头上手上敷上圣油，授予权杖、权戒。至此，两位新主教就有了管理自己教区教会的全部权力了。”^⑧

汉口、武昌两主教区自选又自圣主教，有力地表明：梵蒂冈不能任意摆布中国天主教了。为了祝贺胜利，吉林、甘肃、云南、辽宁、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四川、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湖北、内蒙和北京、上海的神职人员、教徒代表82人来到武汉，参加祝圣典礼。4月16日，他们在武汉集会，一致通过了对梵蒂冈的抗议书。抗议书说：“我们一致认为汉口、武昌两教区的神长教友，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尊严，为了教会和教友灵魂的好处，摆脱了罗马教廷反动控制，而自选自圣了主教，这是符合主旨的正义行动，也符合教会的传统精神，我们表示全力的支持，并对罗马教廷的阴谋破坏，一致表示愤怒谴责和严正的抗议。”又说：“中国神长教友，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了的。我们也知道，罗马教廷是不甘心失败的，它的破坏是多种多样的。当它看到连‘超级绝罚’也起不了作用的时候，又会采取其他办法来继续破坏”，“所以我们要百倍的提高警惕，站稳中国人民立场”，“不上它任何狡猾手段的当”。^⑨

汉口、武昌两主教区自圣主教后，河北省永年、永平、宣化、西湾子四主教区自选主教，于1958年4月20日，在献县张

庄总堂，由赵振声主教举行了祝圣典礼。同年6月1日，在济南洪家楼大教堂，皮漱石总主教祝圣了济南、菏泽、周村、益都四主教区的自选主教。

1958年5月至9月间，又有热河、洛阳、温州、贵阳、韶关、江门、惠州、福州、宁波、汾阳、保定、岳阳、宜昌、北京、蚌埠、长沙、衡阳、常德、澧县、兖州、南昌、余江、赣州主教区，相继选出了赵膺民、郝民掇、方志烈、陈原才、夏学谦、康召年、叶荫芸、林泉、舒其诤、高庸、王其威、李树仁、张鸣谦、姚光裕、周益斋、熊德澍、郭则谦、杨高坚、李震林、石麟阁、胡钦明、黄曙、陈独清为各自主教区的正权主教。在此期间实行自圣的，有贵阳、昆明、成都、保定、热河、蚌埠、兖州、南昌、余江、赣州等主教区的自选主教，主礼和襄礼的老主教有易宣化、王文成、段荫明、邓及州等。这样，在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后仅一年零二个月的时间，中国天主教已有40多位自选主教，其中近半数且已自圣，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痛斥庇护十二1958年的反动“通谕”

本世纪50年代末，梵蒂冈开始了适应时代的革新进程。教皇若皇二十三以后的几任教皇，对庇护十二的僵化政策有所改变。我们在下面要讲到底护十二1958年的反动“通谕”^⑩，不是不注意这一变化现象。历史应该如实地记录下来。

庇护十二对我国天主教徒不怕其“超级绝罚”的恫吓，一个又一个主教区自选自圣了主教，十分害怕。1958年9月上旬，他又发表“通谕”，攻击我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是“非法”的等等。这个反动“通谕”又一次成了我国教徒认识当时梵蒂冈敌视我国的反面教材。他们纷纷集会，痛斥这个反动“通

谕”，并通过了抗议书。如天津市天主教爱国会和神职人员在抗议书中指出：“梵蒂冈的反动‘通谕’，充满了歪曲污蔑、挑拨离间的恶言恶语，用尽仇恨咒骂、恶毒的心机，它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更坚定了与它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②四川乐山、五通、夹江、彭山等地神职人员和教徒在抗议书中揭发了过去窃据四川省各主教区主教职位的尚维善、彭道传、林茂德从事间谍活动的罪恶事实，着重指出：“梵蒂冈应负完全责任，梵蒂冈是我国人民和中国天主教的大罪人。”^③洛阳教区神职人员、修女、教徒在抗议书中说：“梵蒂冈的反动‘通谕’不会得到什么，所得到的是中国300万天主教友的严厉谴责和抗议。”^④韶关市神职人员、修女、教徒在抗议书中说：

“我们韶关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的全体委员与教友，是永不会被梵蒂冈吓倒的。我们按照天主第四诫的规定，坚决实行自选自圣爱国爱教的神职人员当主教。”又说：“我们向梵蒂冈提出严重抗议，绝不允许梵蒂冈再利用宗教作幌子来干涉我国的内政。”^⑤

走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上

我国教徒向梵蒂冈提出抗议，大长了我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志气。在梵蒂冈发出攻击我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的反动“通谕”后，我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的壮举继续发展着。1958年10月4日，汉中主教区选出了李圣学主教，并于次年3月26日，在周至主教座堂由李伯渔主教举行了祝圣典礼。1959年5月下旬，吉林主教区自选自圣了王维民主教。同年7月26日，皮漱石总主教祝圣了北京主教区自选主教姚光焘。这次北京主教区的祝圣典礼有一个特点，就是根据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规定了祝圣主教礼仪中“典礼开始”、“宣誓”、

“考问”三个仪式的内容，并规定：进行这三个仪式时必须用中文，不用拉丁文，开创了祝圣主教礼仪部分改用中文的范例。8月13日，自选自圣主教董光清，在汉阳显正街天主堂，祝圣了汉阳、宜昌主教区自选主教涂世华、张鸣谦。11月15日，南京、苏州、海门、徐州教区自选主教李维光、沈初鸣、郁成才、钱余荣的祝圣典礼，在南京石鼓路天主堂隆重举行，主礼是皮漱石总主教，襄礼是赵振声主教和周益斋主教。1960年4月下旬，上海市天主教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宣告成立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并选出了张家树为上海主教区正权主教。4月27日，祝圣仪式在徐家汇天主堂举行，皮漱石总主教主持祝圣，李维光主教、赵振声主教担任襄礼。同时受祝圣的，有杭州、温州、宁波主教区的自选主教。

我国天主教数十个主教区自选自圣主教，标志着我国天主教已是我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我国天主教成为我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利益。正因为如此，自成都主教区自选主教后，各主教区自选自圣主教，都向当地政府报喜，邀请首长参加祝圣观礼和参加庆祝会。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应邀参加，并接见、宴请自选自圣主教和主持祝圣的主教等。教会和政府之间出现了可喜的融洽气氛。

在自选自圣主教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1962年1月，在首都北京举行了中国天主教第二次全国性会议。中国天主教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取名“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这第二次全国性会议改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代表会议”。

出席“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代表会议”的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主教、神父、修女、教徒代表共256人，比

第一届代表会议有所增加，反映了天主教界团结面的扩大。中国天主教爱国组织的名称从“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改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就是这次会议决定的。会议在回顾、总结了第一届代表会议以来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助各教区集中力量办好一所神学院，培养热爱祖国并有高深宗教造诣的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开展搜集、整理、综合、研究中国天主教文史资料的工作”等新任务。^⑥

会议闭幕后，开封、韶关、惠阳、太原、汾阳、福州、正定7个主教区还没有祝圣的自选主教，于1月21日在北京南堂由皮漱石总主教祝圣。至此，中国天主教一些已没有主教的主教区，大都有了自选自圣的新主教。

1962年以后，我国天主教界为完成爱国会第二届代表会议提出的任务而努力着。十分可惜的是：正当我国天主教徒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上迈开大步前进的时候，“左”的路线对各项工作包括对宗教工作的严重干扰，极大地损害了我国教徒的这一正义事业，挫伤了他们爱国爱教的积极性。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作较详细的论述。

注 释

①《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74页。

②1985年，梵蒂冈作出姿态，让还挂着中国某某主教区主教头衔的那些被我国政府所驱逐的外国人辞去这种“虚有”的头衔。

③《天主教成都教区选出中国人当主教》，1957年12月18日《四川日报》。

④1957年12月18日《四川日报》。

⑤“超级绝罚”也可译作“最特别保留的绝罚”。教皇称这种“绝罚”唯有他能“赦免”。

⑥ “修道”即修女。

⑦ 《武汉神长教友千人大会愤怒抗议罗马教廷无耻阴谋》，《信鸽》第151、152期。

⑧ 同上。

⑨ 《汉口武昌教区自圣主教》，《信鸽》第151、152期。

⑩ 《中国天主教23个省、市、自治区代表在武汉集会严正抗议罗马教廷的阴谋破坏》，1958年4月18日《长江日报》。

⑪ 这《通谕》所署日期是1958年6月29日，发表日期则是1958年9月8日。

《法新社梵蒂冈城1958年9月8日电》报导了“通谕”的如下内容：

“梵蒂冈说，中国天主教徒得到选举自己主教的权利，授与了教会外‘一些教士’的主教圣职，它感到痛心和‘正当的愤怒’。

“通谕说，这种权利只属于教会，授与和接受圣职的人将被教廷开除出教会。

“梵蒂冈说，‘非法’授予主教圣职的主教区并没有空缺。只是它的主教不是被逐，被禁，就是被阻止履行职务。”

⑫ 《痛斥梵蒂冈的反动〈通谕〉，各地神长教友通过抗议书》，《信鸽》第164期。

⑬ 同上。

⑭ 同上。

⑮ 《韶关市天主教友集会痛斥梵蒂冈的反动通谕》，《信鸽》第162、163期。

⑯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代表会议决议》，《信鸽》第198期。

十、深刻的教训

我国天主教从长期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变成由我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是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处理我国宗教问题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大事。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党始终十分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对信教群众，党深深懂得必须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他们的宗教感情，而绝不可因为自己主张唯物论而强迫他们放弃宗教信仰。中国人民不分宗教信仰，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共同团结，这是党团结宗教徒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相当一部分宗教徒，包括天主教徒，对共产党主张唯物论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怀疑的。宗教信仰自由明文写在《共同纲领》上，为什么他们还会有怀疑呢？对不少天主教徒来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天主教内的敌对分子继续制造并散布着共产党是要“灭教”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暂时”的，是“假”的等等谣言，他们受了这些谣言的蛊惑和影响；二是他们一时还分不清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和依法惩办暗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区别。有些天主教徒也认识到要反对帝国主义，但对教会内以“神长”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分子却存在着一些糊涂思想。他们把反对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错误地看成就是

“反对宗教”。由于党和政府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的争取、教育、团结工作，许多教徒才逐渐消除了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怀疑，逐渐相信了这个政策。举一个例子：1953年上海开展反对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时，原毓锭治疗院有个知识分子教徒思想上有对立情绪。她说：无神论“必然要消灭”有神论。因此，她把反帝爱国运动看成是共产党“反对”、“消灭”天主教的“必然斗争”，目的是为了要教徒“脱离宗教”。她不承认天主教内有帝国主义分子。但后来她改变了态度，不但承认天主教内有帝国主义分子，并且控诉了他们。这个知识分子教徒是怎么从有对立情绪转变到起来控诉的呢？原来除了医院的党组织开诚布公地根据她的思想特点帮助她提高认识外，还认真尊重她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天主教徒的主要宗教生活是早上到教堂望弥撒。有时望弥撒的时间快到了，她还睡着，没有醒。和她住在同宿舍的党、团员就叫醒她，还问她是否去望弥撒？她想不到党、团员会关心她过宗教生活，非常感动。事实使她认识到了：党不是像她所认为的是要教徒“脱离宗教”。她的思想开始动了，终于从本来“准备被开除，准备殉教”转变为“下定决心，控诉帝国主义分子”。

解放初的实践证明：一些原来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缺乏信任感的教徒，正是从党和政府认真贯彻这一政策的各项具体事实中逐渐产生了信任感的。他们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共产党主张唯物论但也确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也认识到清除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正是为了保护正当的宗教信仰，从而冲破了梵蒂冈设置的障碍，走上了爱新中国的道路。

我国天主教徒走上爱新中国的道路，这就使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教徒确实享受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信神和不信神是

一种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在爱国的共同基础上，教徒和共产党是完全能够合作的。这对企图利用所谓有神、无神来挑拨教徒与人民之间的团结的敌对势力是最有力的回击，同时在国际上能促进世界教徒和中国人民、中国教徒之间的团结。

解放时中国天主教徒约有300万，由于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好争取、团结、教育教徒的工作，也由于我国天主教界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愈来愈多的教徒走上了爱国爱教一致的道路。但是，我国天主教界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有些教徒对走爱国爱教一致的道路还缺乏认识。党和政府对宗教的工作，应该不断总结经验，更好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好地做争取、团结、教育工作，不断扩大教徒的团结面，以有利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惜，正是在这个重要时刻，和各条战线越来越受“左”的干扰一样，党和政府对宗教的工作也受到了“左”的严重干扰。如限制正常的宗教活动，甚至企图用批判宗教的方法使教徒放弃宗教信仰，等等。但所有这些，都还是局部现象。在1962年以前，从有的负责宗教工作的同志的讲话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仍在理论上得到维护。例如，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上，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肖贤法作关于宗教政策问题的报告时曾说了如下一段话：“共产党人自己不相信宗教，那末是否允许别人信仰宗教呢？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我们不反对别人信仰宗教。这是因为，第一，人民群众要信仰宗教，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是他们的公民权利。第二，我们非常清楚的了解，群众的思想信仰，是存在于脑子里的东西，反对也是反对不了的，相反还会引起反感和不满。思想问题，是不能靠行政命令来解决的。毛主席说：‘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就是这个道理。第三，在我们国家里，信仰宗教的群众很多，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历来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对待问题的，如果对群众的信仰采用强制手段，不让他们信仰宗教，那就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是主观主义了，就会引起信仰宗教的群众的很大不满，就会影响人民内部的团结，就不利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以，在能否自由地信仰宗教这个问题上，大家尽可以放心。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①60年代初，从中央到地方，不少主管宗教事务的政府部门仍贯彻执行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64年“四清运动”后，宗教工作进一步转向，在更大的范围内限制宗教活动。如1965年“圣诞节”，上海天主堂也已没有“半夜弥撒”，仅12月25日早上有弥撒。有个女教徒到所在地的天主堂望“半夜弥撒”，看见门关着。她敲门，没有人出来开门，只听到门房内有人说，回去睡吧！夜里不睡好，白天会影响生产。这个女教徒气得转身就走，连早上的“圣诞弥撒”也不来望了。

十年动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给教徒也带来了灾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彻底破坏了，宗教成了“革命”的对象。许多教堂一夜之间被砸得“稀巴烂”，宗教经书和用品被焚烧；许多天主教人士包括知名的爱国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批斗；不少教徒被抄家，甚至坐牢；在工厂、医院、学校等单位工作的教徒普遍受到歧视，矮人一截……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破坏的。但在江青反革命集团没有被粉碎之前，教徒是不可能认识到政策是他们破坏的。当时教徒想到的是解放前和解放初有人说共产党要“灭教”是说“对”了。50年代在事实的教育下，他们

逐渐消除了对宗教政策的怀疑，相信了宗教政策，十年动乱中的遭遇又使他们从相信宗教政策退回到不相信宗教政策。宗教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教徒相信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党就心连心，不相信这个政策，和党就心离心。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极大地损害了党在教徒中的威信。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企图用行政命令消灭宗教，但宗教决不是用行政命令所能消灭的。宗教包括许多东西，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教堂、圣经、十字架、弥撒用具以及教徒常用的念珠、圣牌、圣像、经本等只是宗教中看得见的东西。十年动乱中教堂等没有了，一些虔诚教徒把宗教信仰藏到了自己的心中。教徒心中的宗教信仰，是看不见的。教徒有宗教信仰，就要过宗教生活。那末在教堂已经没有，他们已不能到教堂过宗教生活后又是怎样过宗教生活的呢？前几年，笔者曾访问过上海、北京的一些虔诚教徒。据他们自己说，当时他们用“神望弥撒”、“神领圣体”、“发真心痛悔”和“默念经文”等方法过着宗教生活。所谓“神望弥撒”、“神领圣体”，就是他们在心里想着“望弥撒”，想着“领圣体”。天主教徒相信，在无法“望弥撒”、“领圣体”的情况下，“神望弥撒”、“神领圣体”和到教堂“望弥撒”、“领圣体”的“功劳”是一样的。“发真心痛悔”也同样，在无神父，不能向神父告“罪”的情况下，它和向神父告“罪”一样，能获得“罪的赦免”。天主教徒常口诵“早课”、“晚课”等经文。十年动乱中，有些虔诚教徒怕自己口诵经文被发现后挨批斗，或者在无人看见的地方口诵经文，或者在即使有人看见的地方不动口不出声地在脑子里想着念经文。这样地在脑子里想着念经文，他们叫做“默念”。到教堂“望弥撒”、“领圣

体”、向神父告“罪”和口诵经文等是看得见的，“神望弥撒”、“神领圣体”、“发真心痛悔”、“默念经文”等是看不见的。教徒把宗教信仰深深地藏在心中，用“神望弥撒”、“神领圣体”、“发真心痛悔”、“默念经文”等方法过宗教生活，就是看得见的宗教没有了，但看不见的宗教仍存在着。这种看不见的宗教，决非用行政命令所能消灭的。

推行“左”的政策的人认为对宗教的批判可使教徒放弃信仰，其实，笃信宗教的教徒对批判宗教一般只会产生反感，而且有些教徒当时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利，把这种反感也藏在心里，甚至表面上不再暴露自己是教徒。总之，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企图一举消灭宗教，并且认为宗教“已经消灭”，其实宗教根本没有被消灭。拿天主教徒来说，他们一般都没有放弃信仰，而且有的在心里信得更加坚定。我们应该认真吸取50年代后期起和十年动乱中企图用行政命令限制和消灭宗教造成政治上恶果的历史教训。

注 释

①肖贤法《在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宗教政策问题的报告（提纲）》。

十一、我国天主教界正沿着50年代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党的一项长期的根本政策。企图用行政命令消灭宗教，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这一政策的粗暴破坏。“四人帮”被粉碎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了这一个长期的根本政策。为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做了许多工作。我国天主教又出现了可喜的新气象。

党和政府对天主教工作的恢复

十年动乱中，政府宗教工作部门被取消，从事宗教工作的干部大都也到了其他工作岗位。恢复对宗教的工作，无疑应首先恢复中央和地方的宗教工作部门。

1979年初，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上海等地宗教事务局已恢复。当时面临的问题成堆。拿天主教来说，一方面全国和地方性爱国组织还没有恢复活动，各地天主堂还没有开政，神父、修女等教会人士还在劳动，不少人还戴着各种被错误地戴上的“帽子”。另一方面有的地方，个别仍坚持敌对立场，妄想变天复辟的刑满释放分子却又以“神长”面目出现在有些对爱国爱教一政性缺乏认识的教徒中，并已和企图重新控制我国天主教的外国势力接上关系，他们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已重申但有待落实的空子，进行着对我国天主教的分裂活动。以上海为

例：十年动乱中，天主教会人士按性别分层住在仅有的一幢四层楼大楼内，从事制伞的加工劳动。“四人帮”粉碎后，他们仍在劳动，而个别刑满释放分子从劳改地回到家里后，打着梵蒂冈的旗号，蒙蔽群众，制造谣言，而且已经把触角伸进那幢大楼。因此，党和政府对宗教的工作刚恢复时，真是千头万绪，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为了迅速开展工作，政府宗教工作部门从领导同志到一般干部满腔热情地做好联系宗教界人士的工作，各宗教的爱国力量先后重新组织起来了，天主教全国和地方性爱国组织也先后恢复活动，各地教会大力恢复教务活动。如1979年1月11日，上海统战和宗教工作部门邀请宗教界人士集会。次日《解放日报》作了如下报道：“上海市宗教界停止活动十多年后在市政协礼堂第一次举行集会。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800多名爱国人士同仇敌忾揭批了林彪、‘四人帮’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党的宗教政策，残酷迫害宗教界人士的反革命罪行。市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在会上重申了党的宗教政策，郑重宣布彻底推倒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强加在广大宗教界爱国人士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对受迫害的人员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提出要在经济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之后，《解放日报》又报道了2月1日“上海市宗教局举行宗教界春节联欢茶话会，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50余名爱国人士应邀出席”的消息。党和政府对天主教的工作开展起来了，天主教爱国会和教会也开始恢复活动。如北京天主教会于1979年7月23日选出了傅铁山主教，接替已病故的姚光裕主教，并于12月21日隆重地举行了新主教的祝圣典礼。

全国和一些地方性天主教爱国会相继恢复活动后，主管宗教的政府部门，在天主教爱国会的配合下，为贯彻政策，积极

支持教会开放教堂，大力协助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平反天主教方面的冤假错案。当时要做好这两件事，都很不容易。拿开放教堂来说，有的教堂已被某些单位占用。这些被占用的教堂要开放，一要占用单位让出，二要修理。由于占用单位有的是工厂，有的是仓库等，要它们让出存在着不少困难；加上有的干部对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他们从本单位利益出发，认为教堂已经派别的用场，何必再恢复，因此阻力也不小。党和政府下决心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有些占用单位的领导和干部反复做政策教育的工作，并采取措施，解决占用单位让出后的用房问题，分批把一些急需开放的教堂还给了教会。教会派专人投入修葺教堂的工作，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社会各有关部门给了教会很大帮助。如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原是哥特式大教堂，1966年8月至9月间，教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遗迹”，“砸烂”得空无所有，徒具四壁，两个大钟楼也被削平了，之后教用作堆放果品的仓库。这样用了十多年，被损的地方更多了。1979年经过有关各方多次协商后，采取“边让出、边修理、边开放”的办法，逐步还给教会。这年的“圣诞节”，教会把占用单位先让出的“更衣所”用作临时小教堂。次年“圣诞节”，占用单位已全部让出，教堂修理一新，但还缺两个钟楼。教会领导人一度从经济考虑，认为钟楼不修，虽有损观瞻，但无碍于使用，打算不修了。上海市宗教事务局领导同志获悉后，抓紧做好恢复教会房屋包租政策的落实工作，并把这情况告诉上海天主教会领导人，教会感到经济来源有保证，又重新决定修造新钟楼。1982年“圣诞节”前，两个新钟楼重新接好，耗资24万元，教堂恢复了宏伟的哥特式原貌，使广大教徒深为感动。

再拿平反天主教方面的冤假错案来说，50年代党和政府对

天主教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失误。如肃反中有扩大化，把有些教徒特别是有些青年教徒的思想认识问题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反右中天主教也有一些人被错划为“右派”。十年动乱中：不少教徒被抄家；神父、修女几乎统统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在医院、学校等单位中工作的知识分子教徒被错误地审查，并在“结论”中塞进了诬陷不实之词；在工厂等单位中工作的教徒普遍地受歧视，如有的教徒工作很好，群众评为先进，但报上去后，领导一看是教徒，就拉下来，总之，许多教徒仅仅因为是教徒而在单位里矮人一截，抬不起头。各地党的统战部门和主管宗教的政府部门恢复后，把很大力量用在做好协助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复查平反天主教方面冤假错案的工作上，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并合情合理地解决他们的生活、工作安排、待遇等问题。在这一工作中，许多宗教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干部为落实政策和关怀教徒的主动精神和热情，是感人肺腑的。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原上海第二医学院，前身是震旦大学）党委统战部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看到了复查平反教徒中冤假错案的迫切性后，多方奔走，帮助解决了二医系统和虽然不属于二医但当时在这个学校读书的许多教徒的问题。其中有个震旦附中毕业后到震旦大学解剖室工作、震旦接办后成了二医职员教徒，1958年第二次被捕，判刑七年，送到了江西一个劳改农场，刑满后又强迫留场劳改。1979年他鼓起勇气，向上海中级法院和二医提出申诉。二医领导调查了他的案情后，尽全力帮助解决了他的平反、户口从江西调回上海、返校复职、增加工资等问题。这个教徒经历了20多年的坎坷，现在重新回到二医已是50出头的人了，还没有结婚。1984年2月，他结婚，二医又给他解决了住房问题。他通过一系列切身问题的解决，感到了党给

自己送来的温暖。在一次和人交谈中，他说：过去我说过共产党是“魔鬼”是错的，反对党和对抗政府是错的。他开始从远离党改变为亲近党，常流露出对关心他的党员干部，对党和政府，对天主教爱国会的感激心情。现在他工作十分积极，份内份外的事，都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竭尽所能地做好，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又如上海静安区有位有外语专长的50年代青年教徒，头上有三顶“帽子”，其中一顶是她自己不知道的“内定反革命”，二十多年中受了不少委屈和折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她带来了希望。她提出了申诉。但是在复查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当初定她为“内定反革命”的机构早已撤销。上海市宗教事务局、静安区区委统战部和区宗教科干部，为了使复查工作能进行下去，把情况反映到北京和上海有关领导部门。后来，上海市委办公厅请示了领导，专门指定有关部门的一位领导同志负责处理这件事。1981年7月，政府给她作出了全部平反、改正的结论。同时她的工作问题，也根据她的专长，安排在上海第二工大外语教研室，评定讲师职称后，又提升为教研室副主任，发挥了她的作用。像这样落实政策的事例，还有许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许多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已失去信任感的教徒，看到教堂开放、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的事实，逐渐恢复了对这一政策的信任感。各地天主堂开放后，一些已10多年、甚至20多年未能到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的教徒，在教堂开放能望到弥撒后，激动得流下热泪。他们想不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会重新恢复，自己还会望到弥撒。他们对有关部门以及天主教爱国会协助教会开放教堂由衷地表示感激。特别是有些50年代还不敢靠拢爱国会，认为靠拢爱国会要“失落信仰”的教徒，看到爱国会对开放教堂、协助全面落实政策出了很多力，消除了过去的误解，

开始靠拢了爱国会，天主教界的爱国队伍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壮大了！

跟上80年代新形势

1980年5月22日至30日，和第二届代表会议相隔18年之久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徒代表198人，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出席了会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是解放后我国天主教爱国史上又一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确定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今后的任务是：

“一、团结神长教友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听从耶稣的训诲，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贡献一切力量。”

“二、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协助教会办好荣主教灵事业，同时效法耶稣纯洁圣殿的榜样，反对任何外来势力对我国教会的干涉和控制，警惕并制止极少数坏人，假借宗教名义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及进行非法违法活动，巩固和发展30年来反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

“三、继续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帮助神长教友过好宗教生活，实事求是地向有关部门反映落实情况 and 存在的问题，争取使必须解决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同时还必须向神长教友广泛地进行爱国守法教育，要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自觉地遵守国家政策法规，做天主的好儿女、国家的好公民。”

“四、加强与国际天主教人士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独立自主自

办教会的方针，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①

当中国人民在开放、改革的前进道路上迈开大步之际，我国天主教界确定以上四项任务，是决心跟上形势的爱国表现。政策的贯彻落实，把天主教界的积极因素又大大地调动起来了！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教务委员会的成立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组成的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②，它不是教务机构。中国天主教自50年代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后，全国数十个教区相继自选自圣主教，需要建立全国性的教务机构，以促进和协助各地神职人员和教徒办好教会。有鉴于此，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召开第三届代表会议之前，协助成立了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筹备组。这个筹备组在1980年5月中旬邀请主教14人、神父11人、教徒11人举行座谈会，就召开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成立全国性教务机构和主教团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和研究。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闭幕后的次日，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开幕。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教徒207人出席。会议圆满地完成了成立全国性教务机构——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任务，并通过了《关于筹办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的决议》。

中国天主教主教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教务，其成员不但有主教、神父，且有修女、教徒。修女、教徒参与教务管理，是我国天主教的创举。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阐明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③。我国天主教这两个领导机构的成立，是教会内修团结统一的有力保证。

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任和主教团团长是知名爱国人士

张家树主教。1988年2月25日，这位为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中国天主教领袖病故。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宗怀德主教兼任教务委员会代主任和主教团代团长。

反对梵蒂冈对邓以明的非法任命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短短一年半时间，由于政策落实，我国教徒又沿着50年代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是值得人们高兴的。但也有不高兴的人。如现任罗马教皇，他就很不高兴。1981年6月6日，他无视我国教会主权，竟非法任命以治病为由，到了香港不回的邓以明^④为广州“总主教”。我国教徒为捍卫教会主权，坚决反对这一非法任命。6月11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负责人杨高坚主教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罗马教廷一贯敌视中国人民，解放以后反对新中国，采取种种颠覆破坏活动，我国神长教友，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尊严，保卫教会纯洁，坚决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这是完全符合吾主耶稣创立教会和宗徒传教的传统精神的。这次罗马教廷任命邓以明为广东省大主教是非法的，我们表示坚决反对。”^⑤这一声明发表后，迅速引起了全国各地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强烈反响。在一个多月中，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先后举行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常委（扩大）联席会议或神职人员教徒代表会议，坚决拥护和支持杨高坚主教的声明。广州市天主教爱国会和广州主教区召开的联席会议，还一致通过决议，“撤销邓以明广州教区牧职和广州市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职务。”^⑥7月15日至18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常委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常委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谴责梵蒂冈的决

议和《告全国神长教友书》。

从《告全国神长教友书》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天主教反对梵蒂冈非法任命邓以明为广州“总主教”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天主教理所当然的正义行动。该书说：“主教的选任，对于一个国家的利益与教友的政治生活和信仰生活关系很大，任何政府都不容许背叛本国利益的人窃据圣教会的职务，为此许多国家曾先后与罗马教廷订有协定，如德国、奥国、法国、普鲁士、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海地、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等许多国家与罗马教廷所订的协定或条约中规定，国家有推荐主教之权或委任之前当向政府征求意见；有的规定，主教就职时须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今天罗马教廷背着中国政府和教会，非法委任邓以明为广东省大主教，不仅违背了耶稣创立教会和宗徒时代的传统精神，而且是无视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罗马教廷这种罪恶行径是对我国内政和我国教会主权的粗暴干涉。这是中国人民包括神长教友所不能容忍的。”①

我国天主教三个全国性组织带领广大教徒，与企图重新支配我国天主教的梵蒂冈以坚决抵制，是80年代初我国天主教令人瞩目的大事，也是继50年代反帝爱国运动胜利后取得的又一新胜利。在这胜利基础上，我国天主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进一步发展。1981年7月24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宗怀德主教在北京南堂为南京、苏州、天水、大荔、沈阳五主教区自选主教行祝圣礼；9月27日，在广州石室堂为江门、汕头两主教区自选主教行祝圣礼；12月28日，又在北京南堂为西安、太原两主教区自选主教行祝圣礼。同年12月20日，常守彝主教在唐山市天主堂为唐山、衡水两主教区自选主教行祝圣礼。1980年至1988年，我国天主教又自选自圣了30多位新主教。

开办神哲学院

50年代末各地修道院停办后至80年代的20多年间，没有年轻的新神父，我国天主教中神父年龄老化、后继无人的问题相当突出。1982年，在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天主教人士共同努力下，一个三省一市天主教会联合开办的修道院，在天主教朝圣地佘山正式办起来了。之后，其他地方性和全国性的修院相继开办。名称有的叫修院，有的叫神学院或神哲学院。如北京神哲学院，东北三省区的沈阳神学院、中国天主教神学院、两广两湖和河南五省区的武昌花园山修院、四川和云贵三省区的成都修院、河北省神学院。1984年，佘山修院又扩大成为华东六省一市天主教的联合修院。这些新开办的修院，在教学和内容上，和过去的修院相比，有很大改进。如过去一般要学习拉丁3年、哲学2年、神学4年，现在全部学习过程缩短至5年左右。对拉丁，只要求学会诵念拉丁经文，加设英语课程。神哲学教材，过去都是传统的拉丁课本，现在是中国神父自己新编写的教材。总的要求是培养“德才兼备、爱国爱教”的中国神父。

1987年，上述各修院加上内蒙、院西、山西、山东等地的各修院的在院修生已达600多人。最早入修院的青年修生已成为神父。如1981年入北京神哲学院学习的3个青年修生，已于1986年12月22日在南堂由傅铁山主教祝圣成为神父。

出版经书和刊物

我国天主教恢复教务活动后，最早出版发行的经书，是经上海天主教主教张家树批准的《早晚课》、《弥撒规程》、《圣母玫瑰经》、《圣路善功》、《四样经》和《教理问答》

等。1986年又出版了《四福音》。我国天主教还没有重新开办自己的印刷厂。这些经书的印刷是靠社会上的帮助。如《四福音》第1版30万册，都是上海新华印刷厂承印的。除上海外，北京、山西等地天主教会也出版了经书。天主教徒过宗教生活，手中一般常拿两件东西：1. 经本，2. 念珠。现在许多教徒都已重新有了这两件宗教用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恢复活动后，即从1980年起，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联合出版名为《中国天主教》的不定期期刊。截至1988年12月，已出了25期。该刊物内容广泛，主要任务是：

“号召全国神长教友团结起来，为祖国四化建设多做贡献；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方针，办好天主教会；促进国际天主教人士的友好交往，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⑩

上海天主教会恢复的“光启社”，自1985年12月起出版《天主教研究资料汇编》。现已出版12辑。从1至12辑的内容看，关于国外天主教资料占相当部分，是我国教徒读者了解世界天主教状况的一个窗口。

习仲勋副委员长的讲话

为交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以来抵制外国势力企图重新支配中国天主教的新经验，巩固和发展取得的新成果，1983年4月15日至26日在北京先后举行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扩大）会议，以及两会委员（扩大）联席会议。会议正值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和武汉等地自选自圣主教25周年。4月23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大会。万里代总理^⑪、习仲勋副委员长、杨静仁部长等亲临会场，亲切地接见了与会全体神职

人员、修女和教徒，并一起照了相。习仲勋副委员长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25年来，中国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天主教由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变为中国天主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是天主教界的光荣。25年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广大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支持下，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显著。现在广大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爱国、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已为广大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所接受，并涌现出一大批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爱国神职人员。在主教团成员中，有罗马教廷在旧中国时期祝圣的老主教，也有25年来自选自圣的主教。他们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共同为中国天主教的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反对罗马教廷的干涉和破坏，推进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业的斗争中，站起来的中国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表现出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教会主权的严正立场。”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主教爱国会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广大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参加四化建设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不少的人还评为先进模范人物。”还说：“以上所讲的天主教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得来不易的。我们应当珍惜它，并加以总结，以便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克服困难，继续前进。”^⑩ 习仲勋副委员长是天主教爱国人士较熟悉的中央领导人。他曾于1957年代表国务院支持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会人士听了他这次讲话，感到格外鼓舞。在充分肯定天主教界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习仲勋副委员长在讲话中还向他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希望和要求：一、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上奋勇前进；二、要继续协助

政府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三、要进一步团结广大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积极参加四化建设；四、要进一步办好教务。这是从我国现状出发的，是80年代摆在我国教徒面前的新任务。

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扩大）联席会议以来，天主教爱国人士和广大教徒不辜负党和政府对他们的期望，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为自己的光荣责职。如1983年5月光荣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郑州市天主教徒姜健文，参加六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后，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办的刊物——《中国天主教》上发表文章说：“在这次大会上，我聆听了新选出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感受颇深。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短短的5年中，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宗教政策和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天主教会内的冤假错案已得到平反和纠正，教堂恢复开放，神长教友能愉快地过宗教生活。在这个人民心情舒畅，政治局面安定团结，到处呈现出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下，深感我们天主教友的责任重大。我们是中国人民，祖国的强弱盛衰和我们每个教友息息相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祖国独立富强了，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了，我们教友才有安定的生活，我们才有权办理自己的教会，这是广大神长教友所共同感受到的。”又说：“爱教必首先爱国。现在，我们处在长治久安的和平建设时期，我们的神长教友更应当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新的贡献。”文章还说：“3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

义能够救中国’，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个道理的。”^⑩这些话说出了80年代有振兴中华之志的爱国天主教徒的心声。

当前，^⑪全国和地方的天主教爱国会都把推动和鼓舞教徒为两个文明建设多作贡献列为主要任务。如1984年6月7日至9日，无锡市天主教爱国会召开了“天主教友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交流会”；9月11日，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召开了“上海市天主教界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9月24日和25日，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召开了“南京市天主教友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交流会”；11月6日和7日，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召开了“先进教友经验交流会”；1985年2月11日和12日，重庆市天主教爱国会召开了“重庆市天主教界为四化建设服务交流会”；9月12日至15日，在南京举行了“江苏省天主教友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12月10日至13日，长春市天主教爱国会召开了“长春市天主教友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等等。从这些会上介绍的教徒先进事迹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改革，开放，对广大教徒是有吸引力的。教徒有宗教信仰，向往死后“上天堂”，但也关心现世生活，关心社会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切身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少教徒劳动致富，生产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加热爱了。如江阴陆桥大队一百多户都是天主教徒，原是一个落后的生产队，现在一跃而为先进集体，户户增加收入。他们从自己得到的切身利益体会到：“广大天主教友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教友获得幸福的源泉”。^⑫

1986年11月18日至29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

代表们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一致认为这个《决议》精神同我天主教爱国守法、行善避恶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表示坚决拥护，并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作出我们更多的贡献。”^④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道德是多层次的，除最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外，其他道德，只要不是虚假的道德，都不失其为道德的一个层次。我国天主教徒实践他们教义、信仰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是应予欢迎的。近几年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办的刊物《中国天主教》经常报道天主教徒在社会上做的好事。举一个平常的例子：198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位35岁的在我国某中学任英语教师的名叫安娜的法国妇女，到山西文化古城平遥观光游览。盛夏酷暑，她因气温过高而中暑，躺在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围观的旅客中没有人出来相助。这时有王姓、刘姓两教徒进车站候车，一见这情况，便毫不犹豫地帮助把这位外国女教师送医院抢救。刘走出候车室去叫车，巧遇一辆县检察院的小轿车。他向司机说明情况，征得同意后，即同王一起，把病人抬上车，急送医院。因抢救及时，法国女教师的病情很快好转。

天主教徒中知识分子不少。如上海、北京等地天主教知识分子中有医学、外语等方面的教授和专家。为了服务于社会，上海天主教成立了知识分子联谊会。参加联谊会的医师已多次开展为病人服务的活动。联谊会还办了外语班、康复院等。北京天主教创办了相伯学校，开设了英语、法语、日语、拉丁语及出国人员强化外语班等。这个学校开办以来，在社会上已获得很好的声誉。

从解放初许多天主教徒由于受当时的教皇庇护推行敌视新中国政策的影响，不敢靠拢党和政府，不敢参加爱国运

动，到今天80年代末，在中国天主教全国和各地方爱国会的带动下，愈来愈多的教徒走上以参加两个文明建设为中心内容的爱国道路，这是党和政府总结解放以来对宗教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取得的巨大成功。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将长期存在，其原因，有历史的原因、认识的原因，也有一定的社会的原因。历史的原因是：有些教徒信教是由于历史的因袭，如父母信教，子女也信教。认识的原因是：在教徒看来，“天地万物有神创造和主宰着”，有的知识分子教徒还认为宇宙存在着非科学能解释的“奥秘”，他们不因为科学发达和自己也有一定的科学水平而不信神。一定的社会的原因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某些宗教赖以存在的土壤。宗教不是哪个人想要它不存在而就不会存在。我们应该从这个客观规律性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将长期存在的原因。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将长期存在，而且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有所发展。为了更好地团结信教群众，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党和国家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团结全体人民群众，调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因素。实践证明：教徒能够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也能够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已见诸许多教徒的行动。有的教徒信教，但也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事实。可以断言，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好地贯彻，我国天主教徒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主义觉悟必将更加提高，必将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和对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更多的贡献。

注 释

①《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决议》，《中国天主教》第1期。

②《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章程》。

③《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章程》。

④邓以明，耶稣会士。1951年梵蒂冈教廷委任他为“广州署理主教”。1958年因犯有反革命罪行被依法逮捕。1980年获释后回到广州教会。不久，在梵蒂冈策动下，以治病为词骗取准许去香港。随同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作“亚洲之行”的梵蒂冈国务卿卡萨罗利，代表若望保禄二世去香港探望邓时，两人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邓按卡萨罗利的调子发表谈话。1981年4月28日，他又按梵蒂冈的安排，去梵蒂冈“述职”，30日抵达梵蒂冈。若望保禄二世当天即“接见”他，互赠戒指，并摄影留念。6月6日，若望保禄二世无视我国天主教会主权，“宣布委任邓以明主教为广州教区的总主教”。邓现居香港。

⑤《关于罗马教廷委任邓以明为广东省大主教的声明》，《中国天主教》第3期。

⑥1981年6月23日《广州日报》。

⑦《告神长教友书》，《中国天主教》第3期。

⑧《编者的话》，《中国天主教》第1期。

⑨时赵紫阳总理出国访问，万里暂代总理。

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在天主教庆祝爱国会和自圣主教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要点》，《中国天主教》第7期。

⑪姜健文《我荣幸地参加了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天主教》第8期。

⑫《南京市隆重召开天主教友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交流会》，《中国天主教》第11期。

⑬《团结的会议 爱国的会议 前进的会议 ——中国天主教“西会”代表会议纪实》，《中国天主教》1987年第1期。

结 束 语

天主教自明末传入中国，至今已有400年历史。在这400年中，中国天主教的状况在各不同时期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能简单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

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天主教的主要状况是：由于当时中国是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国家，来到中国的外国传教士虽然有外国的背景，但不仅不可能形成像鸦片战争后那样支配中国天主教会的外国势力，而且他们自己都必须服从中国政府，遵守中国国法。这一时期，以利玛竇为代表的外国传教士得以在中国居留和传教，一是随风随俗，使天主教适应当时中国的国情；二是结交上层人士；三是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为中国朝廷服务的科学家。至于中国教徒方面，他们从传教士手中受洗信教，主要是在思想认识上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因此，不可把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天主教的状况和鸦片战争后看成是一个样子。

鸦片战争后，中国失去了独立和主权完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天主教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西方国家各天主教修会和外方传教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政治上站在侵略中国的他们本国一边，他们中不少人直接为他们本国侵略中国的利益服务，天主教被利用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是这一时期中国天主教的主要状况。但是我们也不可把有的传教士所做的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事一笔抹煞。如有的传教士在教会学校中教中国学生学习外语，学习数理化，学习西医，学习西

乐、西洋绘画等，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人才。有的传教士为旧社会无钱求医的贫苦病人施医施药，这客观上是做了好事，至于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后信天主教的教徒，也必须作具体分析。我国近代史上，教徒中为帝国主义侵略效劳的“二毛子”，确实有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鸦片战争后，原来不信天主教而信天主教的人，可以说年年有，但入教的原因不一。其中许多人迫于生活，从教会得到一些物质利益，如受到救济，找到工作，等等。但他们仍主要以劳动为生。从19世纪40年代至本世纪40年代，中国天主教徒发展到约300万。这约300万天主教徒中，大多数是农、渔、牧民，其他劳动群众，从事教育和医务等工作的知识分子，中产工商业者。这些教徒在教会内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在宗教和思想方面的特点是：信教虔诚，宗教感情浓厚，思想较闭塞，较保守，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缺乏认识，并盲目服从外国传教士，但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

解放初，党和政府在对天主教的工作中，把披着天主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同广大教徒严格区别开来，坚定不移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靠天主教内涌现出来的爱国先进分子，争取、团结、教育广大教徒，终于把外国势力控制、利用中国天主教的局面扭转了过来。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教徒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是团结教徒的宝贵经验。爱国不分先后。自50年代至80年代教徒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天主教徒是爱国的，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天主教当前的新状况。

教徒爱国主义思想的提高，会导致他们对过去所受的思想影响有所反思。天主教是一个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宗教。它积累的思想十分庞杂，并涉及政治、社会领域。除了圣经、圣传和

信条外，它还有维护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一整套政治、社会主张。共产主义产生后，1891年良十三的《劳工通谕》，1931年庇护十一的《四十年通谕》，几乎是所有受过教会传统教育的教徒都知道的纲领性反共文件。60年代起，教皇保禄六世制订“东方政策”，提出和共产党“对话”，但不能不指出的是，教皇历来谴责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各项文件没有一件被撤销过。因此，对受到那些文件影响的天主教徒来说，把天主教信仰和教会的政治、社会主张加以区分，是十分重要的。今天中国天主教徒正是这样做了。在拥护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问题上，他们已摒弃了教会内那些为维护反动剥削阶级利益的政治、社会主张。他们根据天主教“爱主爱人”的精神，表示了拥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爱国立场。他们的实践也已经证明，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天主教信仰是不相悖的。

中国天主教徒保持纯正的宗教信仰，在政治、社会问题上，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一方面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同时为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这就是当前他们所说的“爱国爱教”内容。“爱国爱教”是教徒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前进的动力。“左”的思想对教徒爱教颇不以为然，认为教徒不爱教，才能爱国。这完全是脱离教徒的实际。实际状况是：教徒过去由于受蒙蔽，爱国观念较淡薄，但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们提高了爱国觉悟，会从爱国观念较淡薄，只知爱教，转为走上爱国爱教相一致的道路。“左”要教徒不爱教，恰恰使他们对爱国产生疑虑。

在过去旧社会，一些受被压迫被剥削之苦的教徒只能寄希望于死后得到幸福。解放后在旧社会受苦的教徒也同样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掘了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徒生活在新社会中。他们从亲眼看到的祖国日益繁荣富强的

事实，从自己得到的切身利益，对社会主义祖国产生热爱，但他们一般仍保持宗教信仰。许多教徒通过家庭关系，把宗教信仰传给下一代。今天中国天主教徒的主要部分，就是这些老教教和他们的信教子女（从近几年来天主教受洗的新教徒的情况看，原来与天主教完全无缘而受洗入教的新教徒，为数很少）。这些解放前的老教徒和他们的信教子女，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同时又希望死后“上天堂”。这样的教徒和一般人民群众的主要不同点是：一、过宗教生活，二、奉行他们认为好的宗教道德。从教堂开放以来北京、上海等地天主教徒过宗教生活的情况看，他们主要是“主日”和“圣诞节”等几个大节日到教堂望弥撒，领“圣事”。可见，宗教生活只占这些教徒全部时间的很小一部分。许多在生产、工作岗位上的教徒的主要精力是用于生产、工作上。教徒奉行他们认为好的宗教道德的情况，主要是他们所说的“爱人”、“宽恕”、“牺牲”等。不少教徒乐于助人，不与人计较，肯忍让，肯吃亏，不拿非分的东西，特别是在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不做见不得人的事，等等。当然这样说，不是说教徒比其他人都好，更不是说教徒中没有不好的人，没有干坏事的人。教徒中不讲道德的人，表里不一的人，假仁假义的人，甚至用心险恶的人，也是有的。宗教道德，从总体上说，是教义、信条的延伸，但有些宗教道德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中公认为的美德。因此，对宗教道德不应笼统地一概否定，而须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像当前我国天主教徒，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参加两个文明建设，奉行“爱人”、“宽恕”、“牺牲”等宗教道德，是好事。宗教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确是不同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教徒放弃他们认为好的宗教道德而奉行共产主义道德。既然是教徒，他们必然以奉行他们认为好的宗教道德来反映他们的道德风貌。只

要他们的道德行为对社会有利而无害，就不应排斥。

从近几年来天主教界积极开展与海外天主教人士的友好交往活动看，他们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增进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保卫世界和平所起的作用，也是值得重视的。

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宗怀德主教在1986年11月举行的全国爱国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的材料，在1982年至1986年的四、五年内，我国天主教人士曾接待了前来我国访问旅游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天主教人士，其中有国王、王后、总统、首相、议长、部长，还接待了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印度等国的大主教和主教以及港、澳的主教、副主教等；我国天主教人士也参加了一些国际会议，访问了欧、美、亚三大洲的一些国家和香港。

在世界范围内，天主教徒的人数几乎比其他各个宗教的人数更多。据称，全世界天主教徒已起过8亿，教近9亿。其中在东南亚，在北美，在西欧等地的华裔、华侨天主教徒为数不少。再拿台湾、香港、澳门来说，台湾从前天主教徒是不多的，大陆解放时那里的天主教徒约有一万，现在已达29万人。香港天主教在大陆解放后的30多年中也有很大发展，教徒现约27万人。澳门是历史上天主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澳门天主教徒人数不如台、港，约2万人，但天主教在澳门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国天主教人士本着平等友好、互相尊重、互不干涉的原则，积极开展与世界天主教徒，华裔、华侨中的天主教徒，台、港、澳天主教徒友好交往的活动，显然这也是我国天主教界的一项重要爱国表现。

至于中国天主教同梵蒂冈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国内和国际上不少人教关注的问题。50年代中国天主教徒开展爱国运动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是割断政治、经济的联系。在宗教上，

上海主教区选出代理主教和汉口、武昌两主教区自选主教后，曾都通知梵蒂冈，而后者出于对新中国的敌视加以拒绝。这是有案可查的事实。现在三十年过去了，各方面都有变化。中梵关系包括我国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和我国天主教同梵蒂冈教廷宗教上的关系。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看来问题不会长期停滞在过去已发生的状况；解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国方面，1988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在我国天主教界庆祝自选自圣主教30周年大会上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一、梵蒂冈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二、梵蒂冈不得干涉我国内政，包括不干涉我国的宗教事务。梵蒂冈是否会这样做？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天主教徒将拭目以待。

总之，解放30多年来，中国天主教已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并在继续变化中，中国天主教人士和教徒有很大进步，并在继续进步中。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天主教有新的认识。今天由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中国天主教已不是过去为外国势力所控制、利用的天主教。当然问题还有。中国天主教过去受外国势力控制、利用的时期很长，外国势力的影响很深。少数神职人员和教徒，由于过去所受的影响，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正义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彻底消除这些影响，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国天主教徒决不可因为已取得重大成就而稍有松懈，要继续努力，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坚持自办教会和为两个文明建设，为实现祖国统一，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后 记

台湾、香港、澳门天主教原是中国天主教的一部分。历史上天主教传入这几个地方和传入后的发展等情况，有和大陆相类似的，又有不相同的。大陆解放后，这几个地方的天主教更有它们各自的状况。在教会组织方面，台湾天主教会 有 自称“中华民国主教团”的教会组织，香港天主教主教是一位红衣主教，澳门天主教主教过去一直是葡国人，新近才有了澳门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个华籍主教。鉴于1997年和1999年我国收回香港主权和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都将实行“一国两制”，本书对这几个地方的天主教问题不多议论，以示区别。

版权归作者所有

天主教在线
www.cccn.org